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2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58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46000册

ISBN 7-80023-003-1 /K·56

书号 11310·47 定价 1.5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来往的一组电报
.....(1)
- 张闻天关于长征和统一战线的六篇文稿..... (20)
- 附：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献
——评介张闻天的六篇文稿..... 张培森 (60)

回 忆 录

-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上).....黄克诚 (68)
- 回忆湘南起义.....赵 镕 (116)
- 红军长征以后.....袁血卒 (131)

人 物 介 绍

- 红军长征中的任弼时.....章学新 (145)

专 题 资 料

- 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成立及其活动
.....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165)

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妇女组 (188)

大 事 记

西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吴序光 (209)

考 证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几个问题的调查和

考证.....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234)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来往的一组电报

编者按：这组电报是研究中央分局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情况的重要资料，是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提供的。这次发表，只对个别文字作些校正，加了标点，余均保持原貌。文中错字改正加“（）”号，漏字增补加“〔〕”号，无法辨认的字代以“□”。

项英致朱德电*

朱：

（一）目前敌人正进行大举清剿，江西于十二月开始，闽与赣南元月进行。其清剿方式继续筑单线碉堡，分割我苏区成许多小块，集中相当兵力分开清剿，以企图各个击破我军。其战术以扼要堵击，分进合剿，夜行夜袭，轻装

* 此件原无时间，估计为1935年1月上旬。

跟进，〔并〕组织民团、编保甲配合清剿。

(二)北敌以八、十四、九十四、九十八四个师清剿江西军区，由博〔生〕经东徐至招携，由君埠经黄钧、小元〔至〕东关寨，由东韶至苦竹镜山，纵横封锁线早已完成。首先清剿君、黄以南一带、苦竹南北地区及宜、乐。目前继续构筑〔由〕钧(君)埠至中村、南坑、由黄陂至小布、由引水经大金竹至石马、由东韶至南团线碉堡，集中四个师清剿江西军区所在地。敌对兴北以守势，首先巩固兴于线两侧，已将南塘至江口、江口至于都碉堡线筑成。并因受我军扰，敌增筑社富经杰村至江背洞线，现正筑于水头至马安石万至〔与〕杰村衔接。并由六师协同清剿胜利苏区。

(三)长胜指(至)瑞金以至门岭线敌由四、八、八十九师接防。三、十两师已调回福建。元月三日起，以四个团企图构筑由武阳经草田、九堡、官仓、瑞林寨线〔碉〕堡，八十九师以一部进占株市筑碉堡。闽敌九师调泉州、十师调龙岩、三师调连城、八师调姑陶守备，另一部在上杭的〔旧〕县新坊。三十六师以两个团分为(向)汀、古、四都清剿。三州敌向水口浓田前进。钟匪占小兰英角四线。

(四)卢敌于上月进占宁清归三城及寻乌等地并派队袭击安远。

(五)赣南之敌已加一团，早已进占水南，筑碉掩护河道，以作将来沿河筑碉基点。粤敌以一师已回赣南，返(并)以一团进占长洛、江口；第二师以一团向长安、油山一带清剿，另以一团进占塘村仁风乱石，有进占畚岭小溪的可能；独四师以两团分驻安、寻城，有一团向天心一带清剿。

但粵敌仍用远袭不筑封锁线。

(六)目前的形势〔是〕敌人在南北清剿，然后集结兵力向我中区合击。关于我们的行动与位置另电告。

项 英

项英致朱德、周恩来电*

朱、周：

(一)目前敌六十七与七十九两师于十六日构筑曲洋至车头堡线〔碉堡〕，将胜利与我截断，并在梓、桥、银、葛等地继续筑堡，更小分割清剿。

(二)粵敌一、二师与独立四师各一部约共五个团，分驻天心、水东、仁风、□分、长洛、小溪清剿，另有两团向赣县清剿。

(三)武阳至官仓、瑞林封锁线已筑成。

(四)二十四师在渡头附近向李坊进攻六十七师，筑堡之一团，因侦察不够，敌堡垒已大部筑成，加以兵力布置错误，未将敌消灭，自己伤亡四百余，干部占多数。现已移小密进行整理。

(五)十六团又遭粵敌袭击受损失。三、十一两团已移

* 此件原无时间，估计为1935年1月中旬。

赣南黎村与上坪一带。

(六)伤病员除〔非〕分散,〔否则〕处置困难。

(七)中区①与赣南的部队除独立营外约有一万三、四千人,长短枪约五千上下,但战斗力除二十四师外都不强。

(八)敌如继续〔筑〕堡分割我基本地区与封锁会昌河,〔我则〕机动范围甚小。

(九)我们〔的〕行动方针与总的行动方针应如何,请你们详细指示。

项 英

项英致博古、朱德、周恩来电*

博、朱、周:

(甲)根据目前敌人清剿的计划与战术,我们对于各地的布置与指示:

1. 坚持在敌人新的封锁线内领导武装与群众,反敌人清剿。
2. 积极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来抵制与吸引敌人。
3. 运用游击区域斗争方式:公开的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联系配合。

① 即中央苏区简称。

* 此件原无时间,估计为1935年1月。

4. 严厉镇压地主富农活动，消灭其反动武装，捕杀叛徒，〔打倒〕民团与反动办事处，使反动统治无法维持。

5. 各地应集中主力打击与消灭敌人分散部队，避免与优势之敌决战；灵活地转移〔和〕隐蔽目标，打破敌之袭击、包围与进击；在狭小地区被敌之大兵包周与清剿时，以一部军〔队进行〕游击战争，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主力则伏击、穿插边区或白区，〔在此〕打圈子，保持有生力量。

6. 积极发展，迷惑敌人，疲惫敌人，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对于地方指导必须采取武装巡视指导方式，大部分派去加强地方武装与群众斗争领导。

（乙）目前江西军区率二团转向公万苏区穿插，因技术不好被敌发觉，敌人已四周逼近，正在设法穿插中。其派到新淦、宜黄游击队，关系不好，情况不明。

（丙）福建则靠闽赣交界派一部队向武南平蕉一带挺进游击。

（丁）赣南正在组织挺进队向兴龙、寻安交界一带活动。雄信一带有发展，正向南山活动。不过粤敌正在清剿这一区域。

（戊）中区目前主要保持洛口以至花桥一带河流与赣南密切联系，主力则活动于两岸来打击敌人，首先给粤赣敌打击，然后可以大力对付北敌，这样来保证在目前坚持与敌人斗争。如敌人大力完成会至于沿河封锁线，则活动暂时转移河□地区。

（己）关于我们的行动与方针请电示。

项 英

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 综合报告*

二十二日电二十六日才收到。

(甲)目前部队分布如下：

(一)十六团在珠〔兰〕与洛口之间，独立七团在下坝稳村、黄沙一带，瑞〔金〕西江独立营在九堡、下宋、梅坑一带，瑞西独立营在寨下面，保卫大队在段屋、中村之间。

(二)赣南四团及军区警卫营在潭头附近之龙口，于都独立营在新陂、罗江，独三团在小溪、畚岭间活动，十四团及登贤独立团在仁风乱石间。独立团近遭损失，见敌而解散，已宣布解散，分离（属）于二十四师及赣南团。会昌独立营在珠〔兰〕河南活动。

(三)十五团近被粤敌追剿，前日退至高排以东，现在整理仍令其回原地。

(四)三（二）十四师与□团为机动部队，现转至赣南洛村配合三团打击粤敌。

(五)福建之十九团现活动于三都濯田间，独六团在小兰之北，现全向武平与平蕉地域挺进游击。

(六)闽赣军区及十七、十八两团在宁、汀、石、瑞之

* 这是项英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间活动，十二团在中畲、罗元、塘坊一带。

(七)江西因电台未出详情不知。

(八)杨赣一分区及十三团近被粤敌搜剿，情况不清。

(乙) 部队情况：

(一)由于医院归队工作有成绩，中区的师团在数量上相当充分，独三、七、十一、十六团各有三个营，赣南团二个营，十四团五个连，十五团两个营也大大改变，但巩固工作差。病员不断增加。逃亡与投敌虽减少，还未完全消灭，二十四师近三月来减员达二千七、八百人，正大力克服。

(二)干部已大改换，但独立指挥能力差，对战术的了解与运用特别差，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尤以对粤敌为最。

(三)部队行军力量一般不强，二十四师最差，每次行军落伍常一二百人，以六团最强。一般的动作不迅速，攻击精神还未大大提高，顽强性还不强。

(四)游击主义已在部队中生长，我们已很好地注意，正在斗争中克服。

(五)部队的斗争情绪还好，战斗力除二十四师以三团较强，十四、十六两团最差。

(六)独立师团的子弹平均每人约五十发以上，手榴弹一般的每人两个到三个，平均梭标占二分之一。

(七)游击部队在数量上有大的扩大，除基干部队外都进行，均以女的占多数。独立营有相当充实，比较游击队积极些。大多数游击队还不能穿袭封锁线。在中区肃清山上反动武装有成绩，福建与江西都差。

(丙) 地区给养问题:

(一) 目前借谷因敌进占均分发群众, 遂大多数被敌强迫交出, 现中区及赣南所存之谷, 只能维持部队机关至三月半上下, 以后地小成问题。

(二) 国票惊人跌价, 目前依靠群众动员方不成问题, 二月以后整个经费发生困难。

(三) 文件还□买□冬衣被已解决。筹款来源太少, 现金成问题。

(丁) 群众斗争:

(一) 中长九区域较好, 特别对地主、富农斗争, 只有段屋旨侯逃跑多。赣南较差, 但对红军和苏维埃还是特别拥护, 卖油给红军, 保护伤病员, 积极参加游击队。反动派用红军跑了、红军消灭了、或利用野战军落伍开小差分子回来欺骗群众。

(二) 江西对于群众动员差。闽赣除极少数地方外, 一切工作均坍台。万太一带是在恢复中。福建群众好, 但领导差。

(三) 兴万泰的群众仍坚持斗争。

(四) 被占区的群众斗争没有大的发动, 大都秘密工作。当敌占后, 不是回到苏区就是无消息。这由于我们正(现)在〔还〕不能在新的环境运用新的工作方式继续领导斗争。

(戊) 对党的工作:

(一) 中区各区自开展反退却逃跑的斗争, 工作上有所转变, 对于野战军出动与粉碎敌人清剿、发展游击战争做了相当之动员工作, 扩大游击队获得了有(很)大的成绩。但灵活的去开展游击战斗很差。

(二)支部工作没有很好的转变，一切工作还是继续以前的突击方式。

(三)地方党最大的弱点〔是〕不能适应环境来转变〔和〕改善工作与方式，对于游击战争领导差，只注意动员工作。

(四)干部打(家)属与接敌区域的投敌现象还存在，我们正开展反叛徒斗争，但各地还〔未〕造成群众的斗争，只是采用行政手段解决。

(五)福建因省存(委)领导机关以左倾空话代替实际工作，因此放松了反对清剿的具体领导与布置，影响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敌人占领某区，〔其〕工作即解体。

(六)闽赣党的领导更弱，特别是群众斗争发展〔差〕，当着敌人进攻时，各地工作除少数武装与工作人员外大部无形取消，太宁、宁化、汀东均是带着一部分武装上山打□最近正在纠正中。

(七)江西博、洛^①地区由于事先动员与具体布置工作缺乏，当敌清剿中(时)许多遭受损失。最近情况不明。

(八)赣〔南〕地区大部分成为游击区域，完整区不过五、六个，党的工作比以前没有大的进步。

(九)分局曾派李鹤鸣到兴、万、泰去传达和巡视，敌经于都封锁后完全隔断；又曾派人穿插封锁线，过(到)福建检查工作；并调钟循仁随长胜营穿〔插〕至石太^②〔为〕闽赣书记，现已到达；阮啸仙调赣南任书记；直属各个县，准

① “博”指博生县。“洛”指洛口。

② “石”指石城县。“太”指太雷县。1934年10月间这两个县合并成立“石太县”。

备调赖昌祚回任特委书记。

(十)团与工会没有很好〔开展〕本身工作,工会更差,苏维埃〔政府〕也仅只办点公事,对于群众的号召与领导差。

(己)湘赣很早因电油缺乏与我们失了联络。湘鄂赣曾派林瑞生到湘赣,找中央报告工作。据湘赣转告,十六师只剩一千余人,由彦刚率领在湘鄂边活动,准备转回原地恢复工作,近状完全不知。

(庚)我们报告共数千字。此间情形略已述及,致(请)中央及军委速给我们指示。

项 英

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①

项英致中央、军委电

中央与军委:

(甲)粤敌有企图以三个团配合瑞会之右路向我围攻提议。

(乙)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

(丙)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

^① 此件无年、月,估计为1935年1月27日。

全国布置总方针。也□援故荷约一七团会合方针增援的现身极不妥当。①

(丁)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项

四日一时②

中央分局致中央电

中央：

(一) 根据目前形势确定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两个意见：

(1) 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都集中过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了，尚成问题。

(2) 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饶和浦、闽赣。分区(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

(二) 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

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分区(局)

五日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件无年、月，估计为1935年2月4日。

③ 此件无年、月，估计为1935年2月5日。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 中央分局电

(万万火急) 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 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 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 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 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二月五日①

① 此系1935年2月5日。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

中央分局各同志：

(甲)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的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牵制。最后各地红军胜利，全国群众斗争与中区的斗争配合起来，将必然恢复苏区，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与围剿。目前形势是国民党的统治进〔一步〕动摇与破产，蒋介石在五次战争中是削〔弱〕了，军阀间的冲突正在发展。全国革命斗争是继续增〔长〕不是低落。部分的苏区与红军虽受到暂时的损失，但红军主义(力)存在，新的胜利在我们面前。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从(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对〕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

(乙)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一)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势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

(二)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

(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斗，将给中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发展。依野战军及红十军的经验，如你们以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

(四)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

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份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要能独立存在。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

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

(六)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重要地位。

(七)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

同志们！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岭，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希望你们讨论这一指示。

中 央

二月十三日①

项英致博古、朱德、周恩来电

博、朱、周：

(一)北敌及八十九师之一部于七、八、九三日急占云(于)会沿河地区，企图将我封锁于北岸。但我们前几日已移至河南。

(二)已遵中央指示布置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与龙、上、崇、寻、安、武、蕉、福建间。但来电较迟，情况紧迫，

① 此系1935年2月13日。

部队分布于地方工作不免仓忙。

(三)我们已执行中央指示并彻底检查了工作与错误。

(四)我们俟各部队出发后率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但目前情形河水阻隔，而且地域不大，□基础小。独〔立〕团辗转较困难，必要□□仍相当分散行动。

(五)以后请令电台注意与我们联络，否则易失联系。

项

十九日□□时三十分①

项英致朱德、周恩来、洛甫电

朱、周、洛甫：

(甲)我们为了加强各地领导，派潭秋到福建饶和浦并建立白区工作；汪随队到寻安平；张〔覃〕莲到闽赣负恢复江西工作；王随队到兴龙。但潭(覃)莲当敌封锁会于河时，他们当由白鹅入小密未北转，是否能穿福建还成问题②。

(乙)挺进部队一部已出发，一部准备继续出击。但时间紧

① 此件无年、月，估计为1935年2月19日。

② “潭秋”即陈潭秋；“饶和浦”即饶平、平和和漳浦县；“汪”即汪金祥；“寻安平”即江西寻乌县、安远县和广东平远县；“莲”即李才莲；“王”即王孚善，当时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兴龙”即广东省兴宁县和龙川县；“覃”即毛泽覃。

迫，地区狭小，赣南与福建、粤赣边区及远游部队均散布不开。

(丙)我们展(辗)转地区隔河流太多，南部因粤敌将群众围住，大村庄除南寻一部，其他我们均无一点工作。南北敌人堵夹、春天河道〔辗〕转以及粮食均困难。向闽西有河流与封锁，独立团不易转移与穿插，只能随几百人部队行动。

(丁)贺随□到湘粤赣边指挥工作。我们与陈在分局准备转向武福^①。

(戊)我们在展(辗)转中无相当时间立足，携带电台行动时有被击危险，将来与中央及各地联系更成问题。

(己)福建现地域很狭小，敌人正在进行清剿，饶和浦消息断绝，仅知〔独〕九团正被敌清剿中。

(庚)赣南目前仅剩禾丰、黎村两个全区，北敌正限期清剿瑞金西岗(江)与瑞万等县。

(辛)白区工作已派人随挺进队出发，如潭(覃)发出厌^②，该项工作指导又成问题，因分局游击行动，困(很)难指导这一工作。□对闽浙赣三十日^③中央能直接指导最好。□□中央对我们还有指示否？因我们一二日后要行动，以后联络甚困难。

项

二十一日^④

① “贺”即贺昌；“陈”即陈毅。

② 原文如此。

③ “日”似为师。

④ 此件原无年、月，估计为1935年2月21日。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

项英同志并转中央分局：在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行动前必须将行动的任务及目前的形势在干部中、在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解释与动员。在时间上许可时，应尽可能地给部队以相当休息训练与补充的时间。（二）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任何笨重的东西、行李都不应拿，以便利于迅速地运动。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三）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十人。（四）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到被占领区域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蔽在群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五）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游击队携带的多余的干部，应留给地方党加强他们的领导。（六）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七）必须周密地建立秘密的交通网。（八）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

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书记处

二十三日①

① 此系1935年2月23日。

张闻天关于长征和统一战线的六篇文章

编者按：这组新发表的张闻天同志关于长征和统一战线六篇文章，是《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提供、编辑的。为保持文稿的原貌，他们对原稿只作了少量文字和史实的校正。现刊登于此，供研究参考。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血战，在全世界全中国民众前面，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是不能战胜的无敌的力量。一切飞机大炮与新式武器，一切碉楼堡垒与封锁线，都不能阻止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的发展。苏维埃的种子，现在正随着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的行动，广泛的散布到浙西皖南与辽远的湘西黔

* 本文是张闻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撰写的署名社论，最初刊载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版的该报第二三九期。

北。中央苏区，半桥高虎垴的堡垒战，给了敌人以五六千的杀伤；温坊的夜战，消灭了敌人五个团，给了北线与东线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四川，红四方面军以英勇无敌的反攻，恢复了过去所有退出的苏区，给了刘湘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战争，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的伟大，更勇敢的更大胆的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为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在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在日本并吞半个中国，在全中国经济毁灭与水旱灾荒普遍发展的情形之下，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与一切革命民众，都加速度的离开国民党，而走向苏维埃！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斗争，大大的锻炼了与坚强了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给了我们的党以最丰富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这特别表现在，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保卫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的主力红军尽量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也采取了堡垒战，尽量在我们自己堡垒的前面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半桥高虎垴的战斗是这种堡垒战的最好的模范。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

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的派出,就是为了这一积极的任务,而不但是为了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四川红四方面军就是这样取得了空前胜利。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如鄂豫皖苏区就是由于这种转移,保持了实力,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至于到处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突击,也同样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

在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放松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造成有利于我们基本任务的完成的每一机会。同福建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的订立,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极大的成功。虽是由于“人民革命政府”可怜的迅速的失败,使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但这种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某些条件上同敌人妥协的斗争方式,我们并不放弃。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去利用这种机会的。

至于在白色区域,我们的党怎样开展着反日反帝的群众运动,领导了群众的有着明确的斗争纲领的“中国民众武装自卫委员会”、满洲的人民革命军与游击战争,怎样领导着工人的罢工示威,农民的抢粮分粮、抗捐抗税、夺取土

地的斗争与暴动，以及兵士的哗变等等，来响应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的行动，帮助我们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是谁都明了的。白色区域的一切群众的斗争，是同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行动最紧密的联系着的。

正因为我们的党学会了并正在学习如何采取一切同敌人斗争的方式来保卫苏区、粉碎“围剿”，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列宁的党是忠实于列宁的如下指示的：

“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见《斗争》40期）^①

^① 列宁：《游击战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2—673页。

忠实于列宁主义的我们的党承认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一切斗争方式。它不是抽象的去背诵口号或政治决议，而是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党还在战斗中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样艺术的辩证的去运用与驾驭各种斗争方式。列宁说：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左派幼稚病》，100页）^①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由于各个战线上的环境与敌我力量分配的不相同，而免不了要采取各种斗争的方式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革命战争与干涉的中国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250页。

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工农的民主革命——洛甫注）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见《民族革命问题》18页）^①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的胜利。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但这种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们内部崩溃解体，不能动摇我们的整个战线，而且也不能阻止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会在我们队伍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6页。

内产生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动摇，那些机械论者企图把一切复杂的实生活放到他们的公式中去。他们要求我们的党采取他们的一种抽象的公式与万应良药：或者是保卫苏区，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拚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或者是放弃苏区，放弃苏维埃的革命，而退却逃跑。运用一切方式来保卫苏区，象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这些机械论者所不了解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拚命主义，或者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是这些机械论者所找到的仅有的出路。然而这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显然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斗争方式，必定要是对于敌人最有损害，对于我们最有利益的。我们敌视一切抽象的公式与万应的药方。

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常常拿整个国内战争的某一方面，来断定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拿一个战线上的胜败来断定整个战线上的命运。他们看到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要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而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旦革命遇到阻碍或停滞，而不能在明天就得到胜利，那这些“革命家”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示了他们相反的一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到敌我两方相持的局面，或为了取得军事上政治上更有利的条件，而转移地区或缩短

战线时，他们立刻就会叫喊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与反革命的胜利，而走到灰心绝望中去。这些机会主义者追随着某些斗争的结果而兴高采烈，而悲观失望，他们看不到斗争的各个方面，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他们完全不了解如何灵活的运用一切斗争方式去制胜万恶的敌人。

布尔什维克的党必须同各种各样这类机会主义做斗争，来教育我们全党同志与广大群众，如何依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指示来完成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历史任务。列宁说：

“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应当参加这个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个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他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根据实际经验实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见《斗争》41期）^①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来的国内战争中已经大大的锻炼了自己，教育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不能战胜不能动摇的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坚强的领导者。但是，它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与获得，中国苏维埃革命伟大的历史任务的解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

^①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2页。

之下，以最大的坚决与勇敢，在各个战线上去同敌人作战，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继续在斗争中去学习活泼自如的运用一切斗争方式，去打击敌人，去制敌人于死命。

高举苏维埃的旗帜，以顽强守备、坚决进攻、猛烈追击、活泼机动的我们一、三军团的精神，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血战！在这一血战中，我们会胜利，我们能够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的加强了我们对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的消灭敌人。因为这一会合：

一、大大的提高了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与胜利信心；

二、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

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 本文最初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在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之前，于6月25日单篇印行。

这一会合虽是在松、理、懋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的地区，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了整理休息的机会，尤其是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但红军主力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这种地形虽便利于我们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而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敌人现在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内。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在东面则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以及他所指挥的二十七个团，则正在平武、松潘一线筑工前进。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甚至在我们西面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的发展。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不能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

于我们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可能，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可能，使这一可能变成实际，而不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取去了我们这种可能，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于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的地区。

为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用最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克服一切粮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难，坚决消灭当前的敌人，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是我们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唯一的意志与唯一的决心！这是我们野战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的作战，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如何能取得这一战役的完全胜利！

在这一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连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没有建立苏区根据地以前，战争不能不带有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性质。但这种游击战争的性质，由于我们到达了原定地区，由于我们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所以同过去我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不能不有质量上的不同。以整个时期看来，我们过去

的战略方针放在到达一定的地区上，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原定的地区，同四方面军已经取得了会合，因此，寻求决战的胜利，成了目前我们最中心的任务。这种胜利的可能，由于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而更其增加了。我们现在还处在从完全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地区内。关于深入赤化的任务，却落在一部分红军、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肩膀上。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做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的估计，与过分的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的动员

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前面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但只有我们的艰苦奋斗与同敌人残酷的血战，才能取得胜利！

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

* 本文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时写的，原载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前敌委员会和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3期（1935年9月28日出版）。原标题后有括弧注明为“读报笔记”。

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月下可维持两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命运，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七月廿九日社论《论陕乱》）

山西老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见七月二十三日《大公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猴小

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摄，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见八月一日《大公报》）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日有这样的记载：

“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复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泰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从反动报纸上看来，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该地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昔在升平之际，犹复跳梁出没，近年国家多故，共匪乃据险发展其意志。于是时而猖獗，时而敛迹，行动诡秘，声东击西，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击此则彼窜，击彼则此逃。遇大军则化整为零，隐匿深山，遇小军则啸聚猛扑，施其淫威。”

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

军做斗争。七月二十七日起在西安所召集的“西北剿匪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一切这些是徒然的，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八月二十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

反动统治消灭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

普遍的水灾，国民经济的崩溃与破灭，帝国主义者、豪绅地主与官僚军阀的残酷剥削是造成陕甘以至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

《大公报》的统计：“陕西全省九十二县，灾区的占三分之二，灾民约达二百余万，均辗转流离无法谋生，诚为空前浩劫。”（七月七日）今年陕西省水灾的惨状是我们不能用言语所能形容的。

在邻近陕西省之山西省情形也不见佳，阎锡山在七月二十九日纪念周报告中曾叹息的说：

“山西自身，为国民经济崩溃之身。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室九空，十村九困。在此情形下，邪说乱言

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土地制度给共党露下一个大空隙，故共党于国家独制枪炮军火之下而犹能突占城镇，组织政府，抵抗国军。且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数十倍以上的民力，数百倍以上的财力，数千倍以上的械弹补充，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今日山西共祸业已临头，确非十六年之景象可比。

“现社会对于共产党露有大空隙，已如上述。山西除露有此大空隙以外，而有十室九穷农村破产之坏现状，再加上左倾学说及失了统驭的教育，大家想想虽无外来之赤化势力，就是本省的赤化势力，是不是要一天大于一天。无论何人不敢说不是一天大于一天。既是一天大于一天，总有发生危险之一日，今更加以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党之火焰甚大，共产党之火焰愈高，而坏人之火焰亦愈高，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七月三十一日《大公报》）

事实即是如此明显，就是反动统治中最顽固最封建的代表阎锡山也不能不有如此悲痛的自白。

反革命的头子蒋介石对于全中国革命运动也不能不有这样的估计，他在给各省军阀的电报中公开的说：

“现在国步维艰，欲救危亡而剿匪实为当务之急。凡为军人均应激发天良迅完任务，乃查数月以来，各方剿匪成绩，不但毫无进展，致贼势益张，零匪蜂起，潜滋极大，隐患堪虞。”（这是□□□于七月二十八日转给他的部下的蒋介石的“删□□参蓉电”，这次我们在缴获敌人材料中检

得的。)

这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自白证明：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

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够能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 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察哈尔事件中，日本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下列的通牒：（一）解散与撤销华北的党政机关，立即将河北省政府南迁；（二）将驻扎于华北的中国军队扫数南调，进剿“共匪”（日方认为可以编为‘华北国’之部队者除外）；（三）中国政府绝对禁止一切反日排满之行动，违者处以严刑，此禁令须立即明令颁布全中国；（四）将进剿与取缔反日排满之不力者与杀害白胡二社长（按：白胡二人系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出版），署名洛甫。

汉奸报主笔^①，与国民党争夺卖国权，而为法西斯蒂所暗杀）之直接间接负责者于学忠（省府主席）、张庭谔（津市长）曾扩情（军分会政训处长）、蒋孝先（中央宪兵团长）等逮捕惩办，并驱逐其出华北境界；（五）彻底禁止与取缔一切反日排满之言论与书籍等（这些条文系根据我们最近所得材料）。

日本的这些要求，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努力奋斗是早已完全实现的了。然而这不但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而且更加刺激了他的贪心。同时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②的战争所引起的国际风云，更为日本造成了大胆进攻的有利环境。尤其是中央红军一部的到达陕甘，陕甘红军的伟大胜利，西北革命运动大踏步的前进，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先发制人，以防止“赤祸的蔓延”。

新的条件现在又提出了（条件见中央宣言）。这些条件的目的，不但在并吞整个华北，而且在并吞全中国。蒋介石国民党自然又会为了这些条件的完全实现而努力奋斗。

这些条件的提出，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最具体的表现。这些条件的接受，是蒋介石最后成为日本一个帝国主义的工具体，而宣告“以夷制夷”的外交把戏的最后放弃，也是法西斯蒂的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最后破产。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必然要进一步的加深，国民党军阀内部的冲突必然有新的的发展，尤其最重要的，

① 白系白逾桓是当时天津的《振报》社社长，胡系胡思溥是《国权报》社社长。

②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全中国民众抗日反蒋的斗争，必然要大大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将迅速转变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现在除了用白色恐怖镇压与屠杀抗日反蒋的革命群众与领袖外，更在用尽一切方法和缓这一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处处装做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给蒋介石甘心卖国的一切罪恶做掩盖。他在某种限度内赞助其他军阀的反蒋运动，利用一切其他军阀，使他们提出“反蒋不反日”，“联日反蒋”与先“反蒋后反日”，来和缓群众的反日斗争，并且使这些军阀也成为他自己的工具。而这些军阀也利用群众的反蒋情绪，同卖国贼蒋介石采取对立的态度，以争取民心，以维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且同样的勾结日本。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处处防止反蒋战争的爆发，各派军阀也惧怕这一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对于各派军阀，目前都是不利的，这一战争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是有利的，并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到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是这一原因，说明西南军阀的反蒋运动，结果只是发了一些通电了事。至于蒋介石方面也装腔作势，表示接受卖国条件是在日本高压之下，是由于不得已的苦衷，并且尽量把卖国的责任推到他的走狗汪精卫身上。这次国民党六中全会，汪精卫受刺，而蒋介石无恙者，其原因亦在此。

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其他反蒋军阀的这种阴谋，必须在全中国民众的前面彻底揭破。必须指出，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与汉奸。因此，抗日必须反蒋，反蒋必须抗日，这样来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并使这

—运动直接转变到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不论这种不满的来源与动机有着怎样的不同。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而我们目前在准备与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方面的主要弱点，也就在这里。我们的同志，一般的会背诵党中央所提出的反日六大纲领，但是如何使这一纲领具体化，如何抓住每一具体事变，来发动与组织这一斗争，则往往表示无能。我们的同志都不反对在反日运动中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然而在实际上则往往惧怕使用，把运动束缚在狭窄的范围内。

党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弱点，利用一切事变，一切方法，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抗日的斗争，把抗日斗争同反蒋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党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派别内部的一切矛盾，来达到反蒋的目的。党决不拒绝同任何反蒋的军阀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反蒋战争的首先爆发，使这一战争转变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党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下层基本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然而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与力量，并不失时机的经过上层的统一战线，

以夺取对方的下层群众。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大拍卖，使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更为紧迫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到达西北，更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到来，而且在这一战争中将要以工农红军为主力。中国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战员必须清楚的了解他们所负担的伟大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即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更加努力的扩大与巩固自己，加强自己军事的政治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消灭当前的……张学良、蒋介石的部队，以肃清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道路。我们相信中国工农红军是能够负担起这一任务的！

然而如果以为只要红军的力量，即足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是小孩幼稚的思想。红军在目前的与未来的战争中，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只有这样，红军才可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中领导者的地位，使民族革命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

满洲反日的整个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由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使当时发生的许多伟大事变，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以开展伟大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给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现在比满洲失陷后更伟大的事变正在展开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必能以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去迎接这一伟大的事变，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 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报 告

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紧了。其原因是：（一）日本本国的经济恐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它侵占东三省，使经济恐慌稍有缓和。一九三四年大半年恐慌厉害，它便企图以占领中国来解决它本国的问题。（二）西欧风云变化，如意大利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种形势便利于日本的侵略。（三）蒋介石的投降。（四）中央红军到达西北，使它不能不企图迅速占领中国。（五）苏联经济建设及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帝国主义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苏联。

二、察哈尔事件后日本的新进攻和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在察哈尔事件中所提的条件（续《斗争》第74期察哈尔一文中所列的几个条件），是要将河北、山东等五省完全占领，蒋介石对于日本所提出之条件完全接受。但即使这些条件实现，日本仍不满足，所以又提出八个条件。这八个

* 本文是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标题是编者拟的。

条件就不仅要侵占五省，而且要占领其它重要省份，沿海各省变成非武装区域（条件见中共中央宣言所引）。这八个条件更进一步表明，日本要将侵略势力伸入到沿海各省以至全中国。上海一个水兵被中国人打死，日本便在四川路闸北大规模示威。在天津，日本兵胡闹，日本军官到处活动，企图实现这些条件。河北战区已宣布独立，华北宋哲元等想逐步实现沿海军队撤退，国民党部撤消。日本的侵略没有丝毫放松，只有一步加紧一步。国民党的态度很明显，蒋介石是日本最忠实的走狗。日本与蒋介石之间，表面上有分歧，蒋在五全大会上的发言，说无论日本怎样，他总要以和平对待，并说中国被人侵占，是由于中国人民不争气。蒋介石是要完全实现这八个条件。他们表面上做些把戏，日本要这样做，蒋介石不要这样做，实际上他是接受这八个条件。据重光发言，南京方面开始就怎样实现这个条件同日本谈判。国民党听到殷汝耕独立后也满不在乎。日本在开始提到时，就采取示威，威吓蒋介石。对广东的反蒋运动，日本加以控制，使反蒋战争不爆发。五全大会把汪精卫打伤，又同广东谈判，表明一方面敷衍其他派别，另一方面是实现日本的条件。蒋介石始终是哈巴狗，南京政府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基本上一定要执行日本的条件。

三、日本的侵略使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关系恶化。日美关系是大家知道的。九一八事变时，美国执行史汀生政策，日本以为美国只是口头上讲一讲。实际上美国是非常痛心的。它的唯一行动是扩大军备，如海军演习，大大巩固自

己部队，做实力的准备。

日英美关系的发展现在也到了要做实际准备的时候。英国在华北之势力由于日本占领华北而受到损失。日英谈判是想彼此互相默契，但日本总是要独占中国，不许英国染指。英国发起四国借款，日本说中国不需要，说加拿大、澳洲、印度，你也不许我日本染指。英国看到在中国势力快完了，派爵士来谈判。日本说中国是我们的，你承认后再谈判。李滋罗斯爵士提议，借五千金磅给中国，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日本大声抗议，说中国的事别国不要管。关于现金集中，分三区进行。英国最后采取一着是控制中国经济，但因中国抗议，不会有大的成功。英帝国主义想瓜分中国，日本要独占。英国现在因西欧事件，只有让步，别无其他出路，它不敢以武装对待。英美想阻止日本的企图，但没有方法能加以阻止。广东政府反蒋，但不能爆发战争，或许因群众之反蒋，有战争之可能，但也不是绝对的。虽然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加紧，但无法阻止日本侵略之加紧，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日本之侵略。

四、在目前形势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仅有工农群众、大学教授以及某些派别的资本家，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人反对日本侵略不满意。广大阶层参加到民族战线中，许多人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加广泛。在我们这方面，这一次胜利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使我们取得了新的围攻前的过渡时期。

在参加反日斗争的阶层一天天扩大的情况下，我们目

前要利用统一战线，争取广大阶层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动员广大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扩大统一战线。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

我们提出了六大纲领，现在要很好利用这个纲领。我们还不善于将它具体化并使其实现。过去有过这种机会，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如抵制日货，群众有此要求，我们就争取加以领导，工作就从这里开始。而组织抗日同盟军，也就是群众武装。过去我们只是宣传六大纲领，现在我们要具体实现它，把民族运动具体化于当地情形，这样来实现六大纲领。过去抵制日货我们不参加，组织义勇军不募捐。我们总是处在狭隘的范围内，因而也不能领导群众到最高阶段。现在则要求我们更广泛的利用统一战线，要募捐。要加入义勇军，在实施决定上要具体化，要在广大群众斗争中争取领导权。

按照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的队伍结成反日反蒋的同盟。三大条件过去实现过，现在在日本侵略下，这种形势更有可能。这样的军阀是很多的，因为日本的进攻，士兵的革命化，中、下层军官动摇的也多，因此这个可能还是有的。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采取主动联合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未做过。须知目前我们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很大，可以争取群众，分裂军阀。不要等人家来找，怕动摇自己立场，怕沾污我们的清白。我们的救国宣言可以吸收更广大的阶层，团结更广大的群众。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是革命时期，我

们有很大力量，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可以争取民族战争中的领导权。这现在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反蒋反日。但在谈判时，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只反日不反蒋，反日反张学良，或者反蒋不反日，我们说也可以。某一部队打蒋介石，就必然反对日本。开始是在某一具体环境中的群众行动，然后将它逐步领导到反日反蒋运动。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坚决同关门主义作斗争。不是我们工农红军一定要同他打，而是动员红军去起民族革命的核心作用。

目前是检查决定执行及巩固我们的部队，发展扩大陕甘苏区，执行目前的中心任务——争取抗日的阵地。

总 结

一、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团结起来向革命进攻，小资产阶级消极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力量散了些。在这些条件下，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形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在军阀中也有分化，有的动摇、中立或对我们同情，我们有着坚强的苏维埃、红军及广大的群众拥护，党的力量也比以前加强了。在全国提出的两条道路问题更清楚的提到群众的前面。这样，就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这个策略是可以实现的，抗日反蒋必须很好的运用这一策略。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机会主义，不相信自己力量，最阻碍我们工作的是关门主义，使我们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关门主义是右倾另一种的表现，即不相信自己力量。不打破关门主义就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统一战线的行动在开始时往往与我们的纲领不相合，但如果我们去领导，可以造成很大的群众运动，如请愿、抵制日货等等，可以将它变成为革命运动。

二、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例如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对军阀也只有拿纲领去影响他。过去对十九路军的工作犯了很大的错误，没有实际的配合其行动。

三、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如何？有时从上层开始，然后争取广大的群众到反日战线上来。上层下层的工作都真正要干，不能象满洲事变中那样站在旁边去揭破军阀欺骗。

四、要反对主要敌人。广泛统一战线问题放在全党的前面，看我们是不是能解决这一问题。满洲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五、最后应巩固自己的力量——苏维埃与红军，进一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周围，教育同志教育群众成为反日的先锋，并争取领导权。

拥护苏维埃政府与 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占领华北，蒋介石出卖华北与中国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蒋介石的卖国，显然的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斗争的群众的与社会的基础。现在不但更多的更落后部分工人、农民、士兵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甚至许多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以及某些军阀官僚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革命，或直接参加斗争。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宣言，就是要团集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要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哪一个社会团体，哪一个武装队伍，愿意去抗日反蒋的，那我们可以同他们联合行动，可以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

* 本文为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而作，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76期（1935年12月5日出版），署名洛甫。

个宣言是不取消一九三三年一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但联合行动的范围，却是大大的扩张了。现在我们不但愿意同任何武装队伍，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同所有抗日反蒋的人民、社会团体、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因此这个宣言，是在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入的情形之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所采取的新的步骤。

这个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有些人，甚至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认为这一宣言又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借此以取得民心的。难道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真的想同他过去认为反革命的派别，与军阀官僚等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不成。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一切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采取恶意中伤的帝国主义者与汉奸卖国贼，常常这样宣传，以减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与主张，在全中国人民心胸中所产生的伟大影响与意义。这种恶意的中伤的宣传，影响到了真正同情于革命的或自己是革命分子，甚至影响到

了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宣言的发表，不但是为了要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同时即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应在宣言发表之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人家来找我们，同我们谈判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而且还要主动的积极的到处去活动，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奋斗。不论是过去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或是过去是坚决反对我们的政治派别，只要他现在在抗日反蒋上同我们有共同之点，那我们可以完全不念旧恶，同他们联合一起。就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的个别的法西斯蒂分子，一旦觉悟到中国人民非团结一致，急起抗日，不足以图存在，并愿意脱离卖国的法西斯蒂组织的时候，那我们也决不拒绝他们参加这一运动的，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利益，我们欢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蒋的运动中来。即是对于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也是如此。不论是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们即可以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我们并不否认而且根据一切过去世界的与中国革命史的经验，我们预先已经知道，在目前愿意参加抗日反蒋的“同盟军”内部，正因为内部成份的复杂，所以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个人团体、派别与武装队伍，他们参加斗争，各有他们的动机与立场。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有的会在

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有的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而且我们知道，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基本群众，依然是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乡村与城市的贫民、士兵群众，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但我们决不因为这个缘故，而拒绝他们一切那些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与动摇的、与不可靠的。正象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如果同情于我们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那我们虽是知道他们这种同情有着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与动机，然而我们决不因此而拒绝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因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在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欢迎一切愿意最后忠实于民族革命的最优秀的革命家，不论他们的出身是资本家或是军阀，这些人应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就是那些最坏的家伙，他们参加抗日反蒋的斗争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一时的另一反革命的目的，但是他们的参加必是削弱了反革命方面的总的力量，客观上依然是帮助了革命。革命的群众的领袖，不但应该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且应该知道如何去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每一矛盾，以促进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把反动统治内部或把所有军阀都看做清一色的东西，看的是一个透明的结晶体，这实是一种最错误的观点；或者象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左派幼稚病”⁹⁸

页) ①

所以不论谁，只要他愿意同我们联合，我们就胜利了。这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主张的胜利。

同时要使得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拥护，那单靠宣传煽动是不行的。列宁同志说得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连取得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励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左派幼稚病”96页）②

问题是很明显的。现在是全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时候，而几千万几万万群众，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没有在我们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他们的觉悟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还在各种各样政治思想与政治派别的影响之下，他们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8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247页。

还团集在各种名称的政治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之内，或者他们是反动武装内的一分子，要争取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了解共产党主张的正确，那单靠宣传煽动，单靠在思想上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武断宣传是不够的。这里就要靠着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就要善于寻找过渡到或趋向于我们的基本主张的实现的多种形式与方法。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一主张，即是目前争取抗日反蒋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只要谁愿意在那些条件之下向我们联合，那就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胜利。因为在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中，群众最容易看到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假的抗日的，谁是勇敢坚决的民族英雄，谁是动摇消极的坏蛋。在实际行动中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经验，会了解到过去他们领袖的政治的面目，把他们的领袖所说的所做的同我们共产党所说的所做的来一个比较，而最后抛弃欺骗他们的领袖们，团集到我们领导之下。因为在那些联合的组织内，我们更有可能把我们的积极主张，传达到被其他的人、其他的社会团体、其他的政治派别的领袖们所自己“鼓动”起来的群众中去，而取得我们自己主张的胜利。

完全可能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中我们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的代表占着极少数的位置。这对于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在那里完全有宣传我们全部主张的自由，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在每一时期内的行动纲领，可以公开的批评一切动摇不彻底与叛变的企图，而我相信只有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纲领与批评，

是始终如一与唯一正确的。因此我们必然会取得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护，实现我们的全部主张，我们主张的最后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以苏维埃政府与军委的这一宣言，是为了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而同时也即是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在我们手里的具体步骤。这也就是怎样去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模范例子。

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关门主义者往往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不论在何种具体环境下，关门主义者就是只有那一套法宝，一切合乎他那一套的，就是好的；一切不合乎他那一套的，就是要不得的。因此，他的活动范围就非常狭窄，同时他的活动方式也只能限于抽象的共产主义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的宣传鼓动。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

党曾经同意与赞助民族武装自卫会所提出的基本纲领，目的是通过这些纲领团结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周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这些纲领一到了关门主义者的手里，就变成死气沉沉的教条，变成了只是宣传鼓动的资料。对于过去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也是如此。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

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

列宁同志说：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也要善于在这些群众接近和转到新立场上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没有完全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解决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末，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解决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左派幼稚病”97页）^①

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如此的不整齐，群众斗争的方式与方法是如此之复杂，发动斗争的要求是如此的不相同，只有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与法宝，而投身到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同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条件的联合与妥协，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

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由于群众觉悟程度的低落，与改良主义者的领导，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时，群众要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

求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去讥笑群众的愚蠢与落后，表示自己的清高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这一请愿运动，使群众以他们自己的皮肉去了解请愿的无用，消除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懂得共产党所说的关于国民党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话的正确，并且把这一请愿变为直接的群众示威与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比如，群众一开始并不赞成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作为对日作战经费的宣传，¹而要求抵制日货。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说这一口号不是共产党的口号而拒绝参加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这种运动，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到运动中来。由这种运动转变到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是最容易不过的。这样，抵制日货变成了实现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的口号的最好桥梁。

不论斗争开始时群众抗日反蒋的要求是怎样的平凡，不论斗争开始时的领导者是怎样一个反革命的坏蛋，我们的同志都应该积极的去领导群众，在一定条件下同领导者联合，真正为这一平凡的要求的实现而斗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表示我们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真正肯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揭破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欺骗与叛变的行为，这样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

一切这些例子都是在说明：想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我们的教条之内，处处符合于我们的法宝，这实是一种最可笑的儿童的幼稚思想，这种思想，除了使自己同群众脱离

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左”的关门主义者实际上表示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是不相信的，他们不但惧怕群众，而且惧怕反革命分子。他们怕一到群众中去，就会同流合污，失去了自己共产主义的清高与纯洁。他们怕一同反革命分子接触，立刻会受他欺骗与愚弄，而遭受惨败，他们把反革命分子描写得五头六臂，神通广大，绝对不应该同他讲一句话，更不该同他妥协以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只有在自己同志的范围内，只有同少数先进分子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再背诵其共产主义的符咒，关门主义者方觉得有恃而无恐。所以这种关门主义，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分别的。

必须在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教育我们的同志去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不但是下层的，而且也可以是上层的。不论是下层的或是上层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反对目前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取得党对于最大多数基本群众的领导权。

以为下层统一战线或是上层统一战线就是取消或削弱党的组织，放弃或模糊党的主张的这种观点，只是充分表示出对于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完全不了解。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取消或削弱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党在任何时候，都不但不放弃或模糊自己的主张。而且统一战线的策略正是为得要使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使他们为了党的主张的实现而斗争。一

一切以取消党的组织、放弃党的主张来作为换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的企图，应该受到党的最严厉的打击！

现在是革命与战争的时期，特别是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广大中国人民卷入革命思潮，造成了我们党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从我们自己的力量方面说来，我们也“今非昔比”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创造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所不能战胜的坚强的铁的红军，建立了广大的中国苏维埃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已经是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因素。他在全中国人民中间，有着极大的影响与威信，他是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惊心动魄、日夜不安的巨大的力量，正因为这个力量的存在，使我们更容易的实现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且我们的党也已经不是幼稚的党了。我们的党在长期的困苦奋斗的过程中，已经有着极丰富的革命的经验。因此在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中，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的去取得自己的胜利。

当然我们还要虚心的学习。更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学习怎样从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转变到统一战线另一种形式，怎样经过一些必要的过渡的环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革命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这就要求我们以最高度无产阶级的政治的警觉性，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情况，而提出各种不同的策略。党的战略方针在一个时期内是不变的。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策略，则应该是变化无穷的，只有“把极端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热忱同必要的纵横捭阖的手段

曲直进退之才能融合起来”（列宁）我们才能始终同群众在一起，率领群众进入新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向敌人坚决进攻，一举而扑灭之，以取得决战的最后胜利。

附：

在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献

——评介张闻天的六篇文稿

张 培 森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当年和毛泽东共同处于伟大事变中心的张闻天，他当时的思想和作用过去鲜为人知。随着《张闻天选集》和《遵义会议文献》的出版，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时人们也要求能读到他更多的文稿。现在，《中共党史资料》新发表张闻天关于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六篇文稿，相信这不仅有助于人们研究张闻天当时的思想和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这段历史转折时期的深入研究，也是有益的。本文就这批文献的形成背景及其价值作一点简要评介，不对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写于长征出发前夕，是为从思想上动员红军转移，刊载于《红色中华》上的一篇著名社论。陈云、董必武、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回忆或记叙长征时都提到过它，董必武在一九三六年《长征纪事》中称此文为“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

今天看来，这篇社论特别可贵之处是它确实提出了对后来长征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例如，文章在论述转移的必要时，提出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战略思想。又如，文章在端正人们对转移前途的认识时，以战略的眼光特别强调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此过程中，革命往往“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能〕遭受部分的挫折。”并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再如，文章实际上还说到转移的战略的目的：“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

这篇文章自然不可避免地还保存某些“左”倾时代的痕迹，但是文章提出的上述思想以及它对战争中“拚命主义”和“只要采取进攻”方式的尖锐批评，表明它在战略思想上是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军事思想相对立的，成为迄今少有的一份长征出发前提出正确战略思想的历史文献。张闻天此时能提出这些思想并非偶然，这是他在“左”倾中央内部同博古早就发生原则分歧，特别是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发生军事方针问题争论的一个必然发展。同时，这一文献也说明，张闻天在长征中能转到毛泽东正确主张一边来，是早有思想基础的。作为原来“左”倾中央一位主要负责人，此时写出这篇文章，就不仅具有张闻天个人思想转变的意义，而且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表明，从错误中学习的我们党正在孕育着新的转机。总之，无论从军史和党

史来说，这都是一份值得研究的历史文献。

《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写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同中央刚刚暴露分歧的时刻。当时中央几次致电张国焘，提出要趁敌胡宗南主力未到川北战略要地之前，沿岷江北上攻占松潘，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道。而张国焘则强调种种困难，认为不宜沿江北上打松潘，主张向西或向南行进。针对这一情况，张闻天于六月二十四日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全面论述了中央提出的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提出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强调这是“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文章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指名地尖锐批评这实际上是“要避免战争”，并将“变为无止境的逃跑”。文章并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在中央同张国焘右倾分裂的整个斗争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始终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他的这篇文章就是这个鲜明立场的很早的一个表现。文章写于中央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六月二十六日）之前，是迄今找到的长征中最早的系统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目标和明确批评逃跑主义的历史文献。虽然由于张国焘的延误而致使红军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然而这篇文章所阐述的红军长征落脚区域的战略方向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

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地区后所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如果说上述一文是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设想的一篇历史文献，那么这篇读报笔记则是最早勾画出中央关于长征落脚陕北意向的一幅。

中央关于长征落脚于陕北的正式决定，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据许多老同志回忆，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到达哈达铺，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了陕北尚存大片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这时，他们便已经初步作出了决定。而张闻天的这篇读报笔记就是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写的，它集中汇集了白区报纸上这方面的信息，阐述了中央决策的意向。它不仅是老同志们的上述回忆的一个有力的印证，同时也反映出这个重大的中央决策是集中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集体战略思想作出的。笔记详细摘引了天津《大公报》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后指出：红军应该同活动在陕北及陕甘之交的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以完成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文章实际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标下重点在陕甘的最早设想。

特别要看到是，笔记对于“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而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它所

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实践证明，这正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客观的基础，而后来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离不开这个客观基础的。

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三篇文献，是迄今能够找到的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负责人最早而又比较系统地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最早提出将统一战线问题置于党的战略考虑的中心。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就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时中央抵达陕北还不足一个月，毛泽东还在前线领导直罗镇战役，作为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就在上述文章中这样明确地提出今后党的战略中心问题，这显然对于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顺利制定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迅速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根据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策略原则，提出了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主张。《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一文指出：“集中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张闻天的上述三篇文章正是从这一基本策略原则的高度上阐述了灵活运用广泛

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主张。这些主张包括：不但要开展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要“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不仅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可以扩大到“过去是坚决反对我们的政治派别”以及“过去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而且在具体谈判中要灵活，“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在联合同盟者的过程中，要“采取主动”，“主动的积极的到处活动”；领导群众斗争“要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在深入群众的斗争中，“取得我们的领导权”；“巩固我们的部队，发展扩大陕甘苏区”，以“争取抗日的阵地”；等等。

第三，结合历史教训，号召全党反对关门主义。张闻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在提出战略中心问题的同时，还说到过去“满洲反日（按：指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斗争）的整个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广泛统一战线问题是放在全党的前面，看我们是不是解决这一问题，满洲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这里所说的历史教训主要就是“左”倾路线时期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而张闻天初到陕北就能从全局高度上提出“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这个重大历史教训是很不容易的。

张闻天在《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一文中，还对关门主义作了尖锐的批评，文章说：“关门主义者往往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不论在何种具体环境下，关门主义者就是只有那一套法宝。

一切合乎他那一套的，就是好的，一切不合乎于他那一套的，就是要不得的。”而“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这里实际批评到关门主义的要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必然要严重障碍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此，文章明确号召：“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与法宝”，“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张闻天同志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曾经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但是他确实又是在实践中较早地觉察并逐步有所转变的领导人，如果拿上述文章内容同一九三二年他用“歌特”笔名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以及一九三三年发表的《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两文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上述思想正是他过去转变过程中的反“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总之，如上述这样早的、系统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要文章和讲话，是红军落脚陕北后所仅见的。尽管这些文献还带有转变过程初期一些不可避免的“左”倾痕迹和不够精当的地方，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们所提出的关于党的战略中心的转移和新的策略路线的基本思想，都是已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前线回复张闻天的一份电文中，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所提出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口号与纲领。由此可见，在不久后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并起草了会议的决议，都不是偶然的。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瓦窑堡会

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党的策略路线转变的标志。而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在这一历史转变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上）

黄克诚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之一，它是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组建的红五军为基础编成的。红三军团自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湘鄂赣边地区组建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吴起镇会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正式取消红三军团番号，前后历时五年又五个月。这期间，历经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跋涉万水千山长征到达陕北，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故此，我对红三军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每当回忆起当年戎马倥偬、艰难曲折的岁月，激动的心情就难以自己。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望无垠、绝少人迹的雪山草地，仿佛就在眼前；无数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一个个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所有这些，都令我终生难忘。今天，就个人记忆所及，将我在红三军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追记于后，谨供党史、军史界参考，并以此缅怀为革命捐躯的先烈。

囿于我在红三军团只担负过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全面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事隔已久，手头又缺乏历史资料查考，因此，在我的回忆中，片面、漏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恳望熟悉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不吝指正。

一 初到红三军团

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失败之后，我离开湖南，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二九年初在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又几经周折，我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请求，终获批准。中央军委原拟派我到广西红七军工作。后来，临时接到一个情报，得知国民党有一批武器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准备截夺这批武器，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指示，立即奔赴鄂南。

一九三〇年二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乘轮船赴鄂南。与我同行的还有三名原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工作过的下级军官，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两个是步兵连连长。他们都是我在北伐军工作时办的教导队的学员，经我动员愿意随我去参加红军。我们到武汉后，那个迫击炮连长表示不愿继续同我们走，便自行回家了。我和两个步兵连长（一名刘玉生，一名张高寿）在汉口乘轮船到武穴镇渡口，再雇划子渡江，到了阳新县大王店鄂南特委所在地接上了关系。当时红五军已离开阳新到了江西活动，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到四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从

江西回来，驻在龙港。我们三个人便被派到第五纵队工作。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没过几天，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至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并动员部队准备攻打平江县城。纪念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地主武装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就撤回到长寿街。

打完平江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江西开进。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红五军将修水县城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修水县城。这次战斗中，第五纵队担任主攻，我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在战斗中爬城。

打开修水之后，红五军即撤回到湖北阳新、三溪口一带。这里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当地群众对红军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非常亲热，使我们深受感动。彭德怀同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赞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太好了！”（记得当地特委的负责人一个叫吴致民，一个叫鲁连，还有一个忘了名字，人们都称呼他刘瞎子。在特委工作的

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很优秀的同志。后来，这批同志几乎全部损失掉了，绝大多数是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的。非常可惜！)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纵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即第一、第三、第五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实行，政委吴溉之

第三纵队司令员郭炳生，政委张纯清

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邓乾元

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该支队各个大队指挥员分别是：

第五大队长刘××，政委李修文

第六大队长黄英特，政委罗怀远

第七大队长吴桂桥，政委曹其灿

第八大队长陈桂，政委刘辉宵

机枪大队长叶长庚，政委甘渭汉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进攻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武器，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受了很大伤亡，乃于黄昏时撤出战斗，伤员全部被群众抢救下来。在这次战斗中，刘瑜负了重伤，被抬下来时，伤口已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气力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差，他被抬走后不久，终因流血过多而

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红军指战员正是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打起仗来总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阳新作战之后，第三纵队到赣北瑞昌一带游击，打土豪，筹款，约半个月时间又返回到阳新县境。这时，第一、第五纵队攻克大冶县城和黄石港。在黄石港，红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对打了一阵。后来蒋介石派飞机前来轰炸，我军即撤回根据地内。

一九三〇年六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刘仁八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原来的第一、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五军，原来的第五纵队改编为第八军。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第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邓乾元。后来李灿去上海治病，由何长工代理第八军军长。

二 参加打长沙

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

的大城市的盲动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大都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我自湘南失败，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队伍几乎被打光了。朱德和陈毅同志收拢了南昌起义余下的部队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去攻打县城，结果纷纷遭到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的一连部队。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

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们俩一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我们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而是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坏。于六月底、七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了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多营及地方挨户团武装。部队打开岳州城，我这个湖南人，这时才第一次登上岳阳楼。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平江城。嗣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

部队的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际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会上又发表了反对盲目攻打中心城市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我发表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我已不适宜作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当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尚未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部署，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近平江。何键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其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处之晋坑就敌。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隐蔽，待机歼敌。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快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击溃。

晋坑战斗开始不久，支队长黄云桥就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我逼进。我是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已沾满了汗水，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再看周围，遍是撕杀拚搏的人群，已无法进行联络。情况紧急，容不得多作思考，我便迎着向我逼近的这支队伍走过去，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我作射击姿势。我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道：“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我开了火。我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我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皮包已不见了。我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没有中弹。敌人那么多支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没有打中；我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也没有大伤，实属侥幸。警卫员在山顶上见我倒地滚下山去，以为我中弹牺牲，就只身跑回去报告了部队。我一个人在山脚下，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我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到公路上许多人在奔跑。我恍惚看见奔跑的人佩带着红袖标，才断定是自己人。我便上了公路，设法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原来敌军已被我击溃，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我随部队一气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两三个团遭遇。我军乃采取猛打猛冲的战法，将该敌冲垮，歼灭其

大部，溃敌掉头向长沙奔逃，我军继续尾敌猛追。待追到梨梨市，彭德怀同志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城下，乘势猛攻长沙城。长沙守敌凭借坚固城防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向我扫射。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在攻城战斗中，遭到很大伤亡，渐渐感到不支，并有撤退之势。这时，彭德怀同志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拆掉浮桥，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才将部队稳住，继续组织攻城。长沙守敌以为我攻城受挫后准备撤退，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该敌出城不久，我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其歼灭大部，残敌掉头向城里溃逃。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旋即占领长沙城，何键率其余部退守岳麓山。我军攻克长沙城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长沙之战，我军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出色。当时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而敌人前后共投入兵力达两万余，结果被我各个击破，仅俘敌即达四五千，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装备甚众。此役我军之所以能够获胜，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红军作战勇敢，一往直前；二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果断，义无反顾。

部队在长沙城里驻扎下来之后，我上街配了两付眼镜。两天之后，即奉命与黄云桥同志率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出城七十华里，进抵易家湾一线，担负向南警戒任务，以防御敌人由湘潭方向反攻长沙。

我军占领长沙后，打开了监狱，放出来大批被敌人关

押的革命同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人出狱之后，大多都参加了红军，以后都成为我军的骨干。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官兵加入红军队伍，红三军团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当时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城市政策，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要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这时，躲藏在城里的敌何键部溃兵和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趁机作乱，企图搞暴动，当即被我镇压了下去。

我军在长沙城里停留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敌人已集结完兵力，开始反攻长沙。敌人来势很猛，我军不敢恋战，乃趁夜晚撤出城去。由于部队在撤退时比较仓促，不得已丢弃了大批物资装备，刚吸收进来的俘虏兵也趁慌乱之际逃掉了不少。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还不足，如果打开长沙之后，达到了扩军筹款的目的，不等敌人反攻就及时撤离，当不至于受此损失。

红三军团经晋坑、金井和长沙之役，牺牲了相当一批干部和战士。支队以上指挥员牺牲的尚记得有：陈毅安、何时达、于兆龙、李鶚、郭一清等。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即向平江挺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同志要率红八军单独行动，彭德怀同志对此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

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种盲动观点对部队影响很大。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同志只好不准他带兵了，过了不久，邓乾元同志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部队到了长寿街以后，就开始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指挥，彭德怀同志决定将五、八军混编，取消了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四个师。红五军编了第一、第三两个师，红八军编了第四、第六两个师。整编后红三军团的战斗序列是：

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第五军军长邓萍(兼)，政治委员张纯清。

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袁国平(兼)

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

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谢翰文

第四师师长卢匿才，政治委员石恒中

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

由于我屡次发表“右倾”主张，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将我由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长寿街整编之后，即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南下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原在闽西及闽赣边界一带活动。为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向南昌挺进，准备相机攻打南昌、九江。当红一军团部队进

抵南昌附近时，毛泽东同志发现敌坚城固守，我若强攻，必遭不测。于是，毛泽东同志说服了红一军团的同志放弃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转而向湖南运动，以支援红三军团与湘敌何键部作战。当红三军团被迫自长沙撤退以后，敌何键部戴斗垣旅追击红三军团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墩一线。此时，恰好红一军团已自南昌附近推进到万载以西的黄茅。红一军团乘敌戴旅立足未稳，即挥师自黄茅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全歼，敌旅长戴斗垣被击毙。文家市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进至浏阳东北之永和，与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时间约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红一、三军团会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云卿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岳彬（后叛变）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辖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行动目标。八月底，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三军团进抵长沙近郊，以红一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南门任务，红三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东门任务。这时获悉长沙守敌已增至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敌情变化，

毛泽东同志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边而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十六字诀是“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至九月三日，敌何键部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攻击我军侧背。当该敌在猴子石一带滩头刚一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沙守敌一直坚守不出。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作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在此期间，红一、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匡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同志接任第四师师长。鉴于长沙久攻不克，经毛泽东同志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乃于九月十二日撤长沙之围，部队转移至醴陵、萍乡一带。不久，红一、三军团分头行动。红三军团进至江西之袁州（今宜春县）、分宜、新余一线，继之又推进到临江、上高一线，进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款等工作。第四师第三团在这一带打了个大土豪，从地窖里挖出来六千多块银元和几十两黄金。直到敌人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红三军团才渡过赣江，撤到宁都县之黄陂、小布一线，准备进行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离开醴陵、萍乡之后，会同黄公略同志的红

三军攻打吉安城。吉安守敌是蒋介石收编的原陕西地方部队一个师，师长名邓英。邓师见红军势大，未敢抵抗，即弃城而逃。红一军团遂于十月四日占领吉安城。

毛泽东同志在吉安城里搜集到大批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结束，冯、阎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毛泽东同志从这一形势中判断，蒋介石解决了冯、阎之后，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判断。毛泽东同志还鉴于红一方面军久攻长沙未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的事实，意识到目前红军去夺取敌人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问题。从而，开始对中央制定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发生了怀疑，认为这个计划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还感到，在蒋介石正集结重兵，即将对苏区和红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若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果断地主张主力红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中，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依托根据地同敌人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方针。

“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央的方针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我虽然非常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但由于我曾极力反对攻打长沙而被视为“右倾”，党内的一些会议已不准我参加，我也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长沙曾经被红三军团打开过，一些力主攻打中心城市的同志，以此来证实中央的方针和计划是完全

可以实现的。这样，我只好沉默不语。

在这期间，中央曾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返湘再攻长沙，以执行中央夺取武汉的计划。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周以栗同志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同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农讲所工作过，与毛泽东同志很熟悉。毛泽东同志就找周以栗同志反复交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终于将周以栗说服，使周以栗同志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耐心说服了与会大多数同志，放弃攻打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但红三军团的一些同志仍坚持主张去攻打南昌、九江，以便会攻武汉。这样一来，峡江会议未能作出决议。方面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继续作说服工作，以统一全军的思想。后来会议在罗坊继续召开，最后作出了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打南昌、九江的意见，决定红一、三军团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三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立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

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就张辉赞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赞任前敌总指挥。敌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原是谭延闿的老湘军，鲁涤平、张辉赞、谭道源均系谭延闿的老部下。谭延闿死后，所部即由鲁涤平统率，归服蒋介石。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三军团于十二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隐蔽集结，待机歼敌。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张辉赞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十时许，对该敌发起总攻。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敌第十八师两个旅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赞。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溃逃。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人丧魂落魄，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进攻，将敌军全部驱出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广昌、宁都、乐安、永丰、南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

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赞戴了高帽子游街，旋即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割下来，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直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在军事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所以称为“AB团”，当时的说法是因为“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之后，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曾发现有关于“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负责干部，总前委因此认为对赣西南党的组织需要进行审查。于是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搞肃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大肆捕人，几天时间，就在省行委、省苏、特委机关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旋即开始刑讯

逼供，苦打成招之后，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特委以及江西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一些负责人也先后被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坏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同志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放出被抓捕审查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革命。从而，使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进一步升格。

由于肃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我的看法是，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尤其缺乏肃反的经验。在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行动，作为中央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矛盾。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

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同志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即将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建立以来到当时为止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调到第四师任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原师政治委员石恒中同志患病住进后方医院。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休整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个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培养部队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同志就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以后，便被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

我在第四师工作了近两个月，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我被调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师原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我从东韶牵着一匹马，驼着行李用具，独自径直来到第三师驻地招携镇（在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处）。第三师师长彭遨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第三师在乐安县打土豪、筹款、扩军，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当时的乐安县委书记邱觉，是个小知识分子。县苏维埃主席邱子俊，是个

工农干部。我住在招携镇期间，与他们常有来往，彼此很谈得来。我们部队离开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两个人，据说他们两个人都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四、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间的龙冈、古龙冈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部都驻在这一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派项英同志自上海带领一部分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因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周恩来同志直到是年十二月底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到这一年的三、四月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业已形成，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已陆续进至苏区周围。当时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问题上，曾发生了争论。苏区中央局曾在古龙冈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离开苏区，打到外线去作战。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离开苏区，力主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待将敌军主力歼灭于苏区

之内后，再适时转入反攻。项英同志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作战指挥上，毛泽东同志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进行。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了二十万兵力，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南昌指挥。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并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出动的部队计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五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李松年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胡祖玉的第五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等北方杂牌部队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等部。敌军各部集结部署就绪以后，即兵分数路向我步步筑堡推进。敌在以富田为中心的一路，自东固至富田之间，部署了公秉藩、王金钰、郭华宗三个师，分别由富田、泰和、吉水出发，向东固方向齐头并进。敌另一路由陈铭枢（驻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进至兴国、崇贤一线。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提前集结在东固一带隐蔽待机，决定以相对优势兵力歼灭富田至东固一线的敌三个师，而以红十二军一部监视和牵制敌第十九路军。

此时，红三军团已取消了五、八两个军部，直辖第一、

第三、第四、第六四个师。各师的主官分别是：

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

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黄克诚

第四师师长黄云桥，政治委员石恒中

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

至五月中旬，敌军各部均未发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去向，亦未受到任何抵抗，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继续向我根据地纵深推进。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开始脱离其富田坚固阵地，向东固前进，为我歼灭该敌造成有利时机。我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乃于五月十四日晚八时，下达首歼该敌的军事训令，我军各参战部队迅即进入准备攻击阵地待敌。从富田到东固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十六日上午，当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正行进在半路时，我集结在东固一带的红军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红一军团的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的第六十四师攻击敌中路的王金钰第四十七师，红三军团的四个师攻击敌南路的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猛打猛冲的特长，经过激战，很快将敌人压垮，旋即将敌分割包围后歼灭。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四个团全部被我红三军团歼灭，公秉藩被活捉，后混入俘虏中逃跑。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亦被我红一军团歼灭其大部，残敌向富田方向逃窜。敌北路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见势不妙，掉头溜走。彭遨和我率第三师迂回二百余华里，于十九日赶到富田，兜住该敌一个尾部，歼灭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接着，我军乘胜向北运动，经吉水进至永丰县境内的藤田一线。守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未敢抵抗，望风而逃，未能将其抓住。五月二十一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达歼灭位于永丰中村之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的军事训令，我军迅即挥师向南，经沙溪于翌日进到中村一线。敌第二十七师一部正在这一带山上构筑阵地。当即由红三军团主攻，第三师为前锋，红一军团兜敌后路打包抄，旋歼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继之，我军东向攻打广昌城，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广昌守敌是胡祖玉的第五师，胡祖玉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我侦察部队击毙，该敌即弃城溃逃，我军遂于二十七日占领广昌城。

我军继续乘胜向东挺进，进至福建建宁县境，攻打建宁城。六月一日，由红三军团主攻，红一军团打包抄，经半日激战，将建宁守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四个团几乎全歼，只一小部逃掉，俘敌三千余。攻打建宁城时，我第三师指挥所进抵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我师指挥所扫过来。我由于视力不好，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见敌人机枪要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向一处掩体后面，笑着对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付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大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遨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人就被报销了。

我军攻克建宁城之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三军团前进至黎川一线驻防。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五月中旬歼敌王金钰、公秉藩所部开始，至六月一日攻克建宁城，我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七百里，连战皆捷，歼敌三万余，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装备。尤其是打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时，该两部敌之全部武器装备，悉被我缴获。我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五、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三十万，由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指挥，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归咎于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用命。因此，第三次“围剿”中主要使用其嫡系部队参战。第三次“围剿”中敌投入的部队计有：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该师系蒋介石在浙江收编的北洋军阀周凤岐所部，军官均由黄埔学生担任），卫立煌的第十师（该师的基础系蒋介石在安徽收编的湖南叶开鑫所部），毛炳文的第八师，蒋鼎文的第

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两个师。此外，还有在第二次“围剿”中，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和重创的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原师长王金钰已被解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等部。此次“围剿”，敌人兵力多，来势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在苏区内横冲直撞，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敌人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行进中每两个师为一路，紧紧靠拢，相互策应，使我不容易一口吃掉它。

红一方面军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连续苦战之后，未及充分休整补充，即于七月上旬离开闽西及赣东，绕道千余里，经建宁、泰宁、将乐，转移至宁化，再进至宁都、瑞金、于都边界之壬田，抓紧时间休息了两天，并与李明瑞、葛耀山率领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来正式归入红三军团建制。此时，在“富田事变”中拉走的江西第二十军也回到了中央苏区，该军番号被取消，部队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大增，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开始准备在富田一线兜敌军的尾部打，首求突破一点，尔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我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我再乘隙打其可打者。七月三十一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富田开进。红三军团自平安寨出发，穿过敌军间的空隙地带，昼伏夜行，通过兴国全境，进至泰和、万安边界

的山上埋伏起来。这时，我军的行动可能被敌察觉，敌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已先我赶至富田。方面军首长遂改变原计划，率领部队于八月四日折返高兴圩地区集中，另寻歼敌机会。八月五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通过了敌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至兴国莲塘，抓住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八月七日，我红三军团立即向该敌发起攻击。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之时，林彪率生力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红四军的攻势凶猛异常，一个猛攻，就将敌人压垮，纷纷溃退，我军即尾敌猛追。敌第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爬山的本领远不如红军。该敌被追到永丰的良村时，已精疲力竭，旋被我军压迫到一条沟里，大部就歼，敌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就在良村。我军歼灭了敌第四十七师后，立即又向敌第五十四发起猛攻，歼其师部及两个旅。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莲塘、良村战斗，俘敌达七千余。我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莲塘战斗中负重伤，不久即牺牲，由团长侯中英接任师长。

良村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乘胜向黄陂挺进，于八月十一日攻克黄陂，歼守敌毛炳文第八师一个多旅，俘敌旅长曾志远以下三千余。至此，蒋介石用来参加“围剿”的军队已损失近三个师，而红军则愈战愈勇，情绪更加高涨。

敌人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集中其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向东边包抄过来。八月十五日夜，我军主力又从敌人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西返兴国崇贤镇以北之枫边地区隐蔽休整。自七月初开始反第三次“围剿”

以来，我们除了在平安寨休息了两三天外，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在山地、树林里行军打仗，部队已相当疲劳，这时才得到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我从平安寨到达泰和、万安边界地区以后，就没有草鞋穿了，只好打赤脚跑路。往常，我身上总有战士们送给的一两双草鞋备用。这一段时间，由于每天行军打仗，战士们也没有机会打草鞋了，我自己更顾不上打。因此，直到进入枫边地区，我打赤脚跑了二十多天的路。起初赤脚跑路，感到脚板痛疼难忍，尤其害怕茅草茬、树茬和荆棘刺扎脚。后来，脚板皮磨厚了，什么都不怕了，在碎石子路上和树林里可以行走如飞。那时红军行军打仗，经常要奔跑。记得从莲塘到良村的路上，敌人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敌机就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我们既要追击敌人，还要设法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由于红军没有对空射击武器，敌人的飞机疯狂得很，在离地面只有几百米的低空盘旋，追逐杀伤我军。即使部队伏在地面不动，敌机也完全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投弹扫射的命中率比较高，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往往可以毁掉我们一个连。这样，我们只好以快速奔跑来躲避敌机。一次，我眼见一颗炸弹在我的头顶上落下来，我赶忙向前奔跑躲避。谁知，当我跑出去约四五十米远的时候，这颗炸弹就落地了，但不是落在我原先的位置，而是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我刚刚跑到的地方，就落在我的脚下。我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这次可逃不掉了。事有凑巧，这颗炸弹落地之后竟没有爆炸，实属侥幸。

我们在枫边地区休息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大家都穿上

了草鞋，部队又继续向西进至兴国以西之均村地区休整待机。及至敌人发觉我军去向，再掉头向西时，我军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时间。而敌人则是东跑西奔，疲于奔命，饥渴沮丧，被拖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收兵退却。后来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敌指挥官纷纷抱怨：“肥者拖瘦，瘦者拖垮、拖死。”九月七日，我红三军团乘敌人退却之机，在兴国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独立旅，俘敌团长王铭以下三千余。接着，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互相配合，在高兴圩同蒋、蔡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比较强硬的部队，因此，这一仗是啃硬骨头。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伤亡都很大。这对我们红军来说，算是一次不利的战斗。红军作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我有利的就打，于我不利的就不打，不能同敌人拼消耗。因为我们不仅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要靠打胜仗来装备壮大红军。胜负难分的战斗，显然对红军不利。我参军作战以来，亲眼目睹了两次伤亡惨重的战斗：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攻打汀泗桥之役，战场上的尸体横倒竖卧，比比皆是；再一次就是高兴圩之役，满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浸透。此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伤亡更重。红三军团第四师代师长邹平（师长黄云桥生病未参加战斗）于此役牺牲。高兴圩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因减员太多，即将所辖的四个师缩编为三个师，原第四师编散，原第六师改为第二师。

我军撤离高兴圩之后，进至崇贤与东固之间的方石岭，

于九月十五日将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全歼。方矿岭战斗一开始，我军一个猛攻，就将敌第五十二师冲垮，该敌抱头溃逃。我军尾敌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固附近的一座山底下，将该敌全部缴械，俘敌师长韩德勤、旅长张忠颐以下万余人。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意留下的就放走，并发给路费。敌师长韩德勤装扮成士兵，混在俘虏堆里，领了路费被放掉了。该师全军覆没以后，番号仍然保留。后蒋介石又从第十一、第十四师各抽一个旅，重新成立第五十二师，由李明任师长。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该师再次被我全歼，李明被击伤后毙命。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心腹大将，同属于蒋介石嫡系。真是冤家路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工作时，又与韩德勤相逢。当时韩任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苏北，不思抗日，专同新四军搞“磨擦”，不断向新四军进攻挑衅。后韩部顽军被新四军一举全歼，韩德勤再次当了俘虏。韩被俘后，开始还充硬汉，不开口讲话，不吃不喝，搞绝食。后来经过我们作工作，他才开口讲话，也不绝食了。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把他释放，并发还了部分人枪。韩德勤回去以后，就被蒋介石撤职了。

方石岭战斗打完，第三次反“围剿”即告结束。敌人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之后，较长时间没有再来进攻。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除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之外，莲塘、黄陂、方石岭三次战斗，都打了胜仗。这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红军的声威大振，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奉命从兴国出发，向瑞金集中。当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在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中，不幸中弹牺牲，使红军损失了一位著名的将领。为了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红军步兵学校亦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黄公略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的巨幅挽联上写的挽词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红一方面军在瑞金集结休整了三天时间，便分散各地去开展群众工作，打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搞筹款、扩军，以便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区还没有完全形成联结成一片的根据地。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只有兴国、永丰、吉水、吉安、赣县、泰和、万安、宁都等部分地区，其他多为游击区，而城市多被敌人占据。在中央苏区境内，尚有不少白色据点割据。一个时期以来，红军忙于对付蒋介石的大规模“围剿”，到处转战，还顾不上集中力量去联结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估计敌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大可能凑齐兵力发动新的“围剿”；这就为我们集中力

量建设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主张集中力量敲掉中央苏区境内的白色据点，尽快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一块完整的巩固的根据地，以利于今后的发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红一方面军作了相应的部署，并立即分头行动执行。红一军团在北线，以石城为中心，活动于广昌、石城、宁都（宁都城尚为敌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一带地区；红三军团在南线，活动于瑞金的南部地区、于都的大部地区以及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一带，并尽可能向三南（龙南、定南、金南）地区发展。红三军团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师置于筠门岭一线，第二师置于安远一线，第三师置于于都、会昌、瑞金三县交界处的西江镇一线，红七军（已正式归红三军团建制）置于寻乌一线。我们第三师到了西江镇地区后，我即与彭遨同志确定全师以连为单位，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每个连包一个乡，深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以西江镇为中心，建立了西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我们在该地区活动了三四个月时间，将境内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掉，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

在此，还要补述一件事情。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前，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派说客到中央苏区，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蒋介石看到派大军进行“围剿”，不但没有剿灭红军，自己反而连吃败仗，被红军消灭了不少有生力量。于是，便施展阴谋手段，妄图通过策反红军高级将领，使红军内部发生分裂，不战自乱，借以达到瓦解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

石派黄公略的异母哥哥到中央苏区来策反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红三军团开至江西黎川一线，第三师驻扎在硝石。黄公略的这个哥哥奉蒋介石之命，自临川经南城到了黎川，刚一踏入硝石我第三师防地，就被哨兵查获。此人被带到师部后，即表明身份，自称是黄公略将军的哥哥，要面见彭总指挥有要事相告。我立即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报告说：“有个黄某人现在到了我的师部，要求见你，我看来者不善。”彭德怀同志听完我的报告后说：“知道了，你立即派人把他给我送来。”我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嘱咐，派人把他送进黎川城。彭德怀同志在黎川城与此人见面之后，先是盛情款待，宴以酒席。彭德怀单独作陪，频频劝酒，虚与委蛇，以探明其真实来意。待此人有了几分酒意，便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德怀的意图和盘托出。之后，彭德怀同志便将此人送进一间空房子里住下，派人看管起来。第二天彭德怀打电话告诉我和彭邀，说那个黄某人已押送第三师师部，待此人到后，就把他宰掉，把脑袋割下来，交给他的勤务兵带给蒋介石交命。过了不大功夫，黄某人即被押来师部，我们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吩咐，将他处死，砍下头颅，用石灰腌起来，盛在一个篮子里，交给他的勤务兵带走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蒋介石派说客来策反红军高级将领的事情了。

六、参加赣洲、水口、乐宜诸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暴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如果我们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等口号和主张。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又受到“左”的干扰。同时，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以致丧失和贻误了利用大好形势推进革命的有利时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名中革

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毛泽东同志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免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给了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起初，毛泽东同志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生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莫可奈何，他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

临时中央一大批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就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同志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报、《红星》报、《斗争周刊》等上面，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批判文章才没有直接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同志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把毛泽东同志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

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同志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崑，早年曾与朱德同志同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我军参加攻打赣州城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

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同志。我原来是在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而被撤了职。第二次肃反时，我接受了前

一次的沉痛教训，已经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当时肃反委员会给第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抓起来审讯。我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我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以前说是地主、富农叛变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你们要抓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指挥员，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连政委，一个名叫石文祥，是井冈山上”小鬼，原来是当号兵的；另一个名叫曾彬农，是个农民出身的同志。这两个人都是我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连政委，表现很不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但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这两个人，我一看硬顶也无济于事，便让他俩暂时上山去躲起来。肃反委员会找不到这两个人，也就没有办法了。石文祥和曾彬农在山上躲藏了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每天派人给他俩送饭，打起仗来就派人把他俩叫回来，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他俩明知上面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仍是勇敢地冲锋陷阵。这样，我越加坚信他们不是反革命，决心保护他们。但是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非常可惜！我也因此而被怀疑有问题，或说我是AB团，或说我是托陈取消派，于是决定将我抓起来审查。幸好彭德怀同志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同志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抓我，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我是“AB团”和“托派”的证据来，只好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同志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抓、杀

呢？这样，我才幸免被杀头，但兵是不能带了，被撤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我没有事情可干了，彭德怀同志就让我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面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有所纠正，就派我到第一师任政治委员。我刚到第一师工作不久，就赶上打赣州。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地。攻打赣州的战役，由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五六个独立师担任游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二月四日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扫除了敌外围工事，迅速分兵向赣州城垣推进。当时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城西门以西是章水河，正面是城墙，第一师部队就摆在城墙与章水河之间。攻城的方法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首次进攻由于爆破未成功而受挫，我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赣州战役开始之前，我就对此次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意见。待抵达赣州城下，我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越发感到这个仗打不得。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我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的建议，但未获批准。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于是，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位于城东门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冲起的砖石泥土飞到半

空足有一百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我突击部队，一支二百余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城墙被炸倒之后，守敌一个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量。我军重新组织突击部队进攻时，战机已失，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我再次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此后，又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攻城，均未奏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大。这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达遂川以后，继续南进，并架设浮桥渡江。我军发现敌援兵进抵赣州附近时，即派出一支部队，用“火船”去烧敌军的浮桥和渡船，以阻止敌援兵渡江。红军战士非常勇敢，驾驶小船直冲敌阵，快接近敌人时，即将煤油浇在船上点燃，驾船的战士跳下船往回游。敌人组织密集火力向我射击，驾船的战士纷纷中弹落水。其实，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河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即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连浮桥也没有烧着。敌第十一师一部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了守城兵力。另一部分路包抄我军侧后，并向飞机场进击。我见敌援兵已进城，并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分割包抄之势。在此情况下，我军攻城已无望；且我军久战而疲，减员不断增加，若继续滞留城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直接向彭德怀同志建议撤围，并批评他是半立三路线。但彭依旧不予理采。

敌第十一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人从洞口出城，突然向我军发起反攻，城外敌援兵也乘机向我进攻，内外夹击，使我军

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夜里出击。当时我在师指挥所里，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我一到打仗的时候，就睡不稳觉，心里总放心不下。过半夜以后，我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估计是敌人开始进攻了。我立即把侯中英唤醒，告诉他敌人开始出击了，让他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指挥部队。侯中英睡着了不想起来，我硬是将他拖起来，他才跑出去看部队。我仍放心不下，就带着通讯排长和通讯班，离开师指挥所，走出一百多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所，并立即架线与军团司令部联系。电话接通后，我向军团部报告说，情况相当紧急，应立即下令部队撤退突围。接电话的是军团参谋长邓萍，他告诉我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知道敌人已打到我们附近来了。情况已相当危险，我只好采取机动措施，先让师参谋长(是个大胖子，走路很困难，忘其姓名)和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然后，我让通讯排长去通知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敌人就到了那里。我望见原来的师指挥所火起，就带领通讯班离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路上碰到一个连政治委员带着部队仓惶往后撤退，我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带队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这个连就在原地散开，阻击敌人，坚持了一阵子，赢得了一些时间，但该连不久就全部壮烈牺牲。我继续往前走，发现军团部原来派在第二师和第三师之间负责联络任务的特务团一个营还在原地

未动，我就让他们赶快撤走，留在这里等于白白送死。营长姚喆因未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不敢撤走。我对他说，你赶快带领部队撤走，一切由我负责。这样，姚喆才带领全营撤出险地。我带着通讯班继续去寻找其他被打散的部队，黑夜中辨不清方向，误入南门外敌人的飞机场，迎面碰见机场守军向我们大声喝问：“哪一部分？”我随口说了声“是一师的”。敌人误以为我们是罗卓英的第十一师的，就没有细问。我趁他们尚未察觉的当儿，迅速通过机场，到了南关外，恰巧碰见侯中英同志正在那里指挥部队撤退。我说应该与第二师联系一下，他说他还要到前边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我只好自己赶到第二师指挥所，见到师长郭炳生之后，就建议他指挥部队撤离。郭炳生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能撤离。因为郭炳生曾是我的上级，他不肯撤，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转回南关外去找侯中英同志。但找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侯中英的踪影。后来才得知侯中英同志已被俘。此时，我的四周都是敌人。在靠近河边的一座城楼上，敌人的两挺机枪正对着街面猛扫，我们的部队已被打散，失去了指挥建制，乱跑一气。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必须设法马上撤离。于是，我带领通讯班的几名战士钻进临街一家店铺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子跳了出去，一气跑到城南的山上，才得以脱险。我在南山上迅速将零散部队收拢起来，就地坚守。这时，敌人开始从南街向外攻击前进，我指挥部队将敌人击退。不久，敌人再次组织冲锋，恰好红五军团及时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我们才重新收拢部队，撤出战斗。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巨大伤亡，红三军团损失在三千人以上，我们第一师损失掉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达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赣州城高且固，三面环水，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敌。待敌人半夜里从城内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临战于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离险境，遂导致重大损失。我当时自作主张地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一部分部队免遭损失。虽然是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撤退，但由于我事前曾几次提出过撤退的建议，而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的处置亦属恰当，因此，事后上边并没有追究我。

毛泽东同志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口号下，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消灭白色据点，逐步扩大巩固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我军在久攻赣州未克，被迫撤围之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多数同志不赞成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东西

两路分兵，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江口会议之后，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进至赣江以西的上犹、崇义，继而进至湘南的汝城、桂东、茶陵一带活动。东路军入闽后，首取漳州，十九日，于漳州外围歼敌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主力两个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飞机两架。二十日占领漳州城。西路军于过赣江之前，在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下，在田村召开会议，对我进行批判。说我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又说我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和反对“左”的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我不服，在会上与他们争论。部队出发过赣江向西运动后，一路走，一路批判我，我就同他们争吵了一路。这一次虽然对我批判得很严厉，但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撤职。不久红三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番号，由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委，调我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春圃（江华）；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徐策。红三军团所辖之红七军军长是张锡龙，政治委员张纯清。红七军在上犹地区收编了一批地方武装，编了第十九、第二十两个师，分别由李显、龙云任师长。

我随邓萍、贺昌同志率红五军到了茶陵、莲花、永新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本想收编一些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部队，但收获不大。继之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上犹地区。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接到命令，要同东路军会合，解决进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粤敌，并相机攻夺赣江流

域中心城市。于是，两路军即回师赣南，向南康、大余开进。行军途中，我同贺昌同志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同他争吵。部队宿营后继续争吵，吵得很厉害，但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了谁。我对贺昌同志说要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同志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南康向大余集结之敌四个团，溃敌退守大余。三日，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之敌。八日至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水口战役。在南雄以东之水口地区击溃由信丰撤退及由南雄增援之敌十个团。粤军的战斗力比较强，同粤军作战是硬碰硬，不符合我军历来坚持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原则。加之这次作战我军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遂使水口之役打成了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我们自己还受到一些伤亡。这对红军作战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于八月八日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宜黄之敌第二十七师，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在江西、闽西两军区所属地方部队配合下，红一军团于八月十七日攻占乐安，全歼守敌一个多旅。红三军团于八月二十日攻占宜黄，歼守敌近

两个旅。乐宜之役我军共歼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敌五千余，缴枪四千余，并击落敌机一架。毛泽东同志已于八月八日被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宜战役重大胜利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去攻打中心城市，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使我军保持了战略主动。当时我军已在大山里行动了个把月时间，没有得到休整，加之当地山高林密，气候潮湿，瘴气弥漫，部队中烂脚病大量发生，行走很困难。于是，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邓萍同志回到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同志调到中央工作，我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系统的批判。会议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指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还指责毛泽东同志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的方法指挥战争，等等。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这次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再次

被免除，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由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集中对我进行批判。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出席了广昌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广昌会议之后，我即被撤销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调我到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又把我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设在广昌，我在教导营工作了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谢振华同志当时在教导营学习，记得他那时候才十五六岁。教导营营长名叫张翼，后来叛变投敌。

一九三二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回来之后，就把我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我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样，我又从后方回到前方，与贺昌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们俩重新相处之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天吵架，他骂我一通，我回敬他一番，无非是他批我右倾，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情需要追述。

第一件事情是在水口战役之后，部队向乐安、宜黄开进途中，我与曾希圣同志邂逅相遇，才知道他已经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当时他在中革军委当作战科长。我们俩自上海分手之后，这是首次相逢，彼此都感到格外亲热。曾希圣同志向我谈了一些白区工作情况之后说，现在情报工作很难搞，他准备下功夫解决密码破译问题。我听了之后，

非常赞成他的想法，并鼓励他下决心干出个名堂来。曾希圣是高等师范毕业生，数学基础很扎实，又在中央军委搞过一段秘密工作，现在要搞密码破译还是很有条件的。此后不久，他果然把密码破译搞成功了，他是红军中搞密码破译的创始人，对当时红军作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全靠曾希圣破译敌台的密码来获取情报。如果没有这项工作，红军在长征中将会增加更大的困难。因此，曾希圣同志这个功劳是值得记述的。

第二件事情是在一九三二年秋，红三军团发生了郭炳生叛变事件。郭曾参加过平江暴动。乐宜战役后，部队决定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当时郭炳生任第二师师长，趁部队撤退转移之机，他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奔国民党。第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同志闻讯后，立即前去追赶，把那个团追了回来。师特务连是郭的老部下，又多系湘潭同乡，便跟随郭一起跑掉了。郭炳生叛变以后，蒋介石委任了他一个第七师师长的头衔，其实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几个兵。当时，国民党利用郭炳生叛变这件事大作文章，到处散发传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当时确有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一个是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为上校参议。舒适原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团副，后来他参加红军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舒适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素质，又当过红军的高级干部，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红军的情况和材料，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解放战

争时期，舒适先在东北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后来当了杜聿明的参谋长。他在徐州“剿总”任参谋长时，改名舒适存。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聿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他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不久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

（待续）

回忆湘南起义

赵 镕

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南昌起义揭开了我党武装斗争的序幕。继南昌起义以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起义等数十起武装起义，是我党武装斗争开始时期的一次高潮。朱德同志领导和指挥湘南起义时，我是他的书记长，日日夜夜相随在他身边。回忆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一)

我认识朱德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的春天。那时昆明学生举行爱国游行，和军警发生冲突，有三个学生被捕。学生联合会推举我和几个同学当代表，到警察厅去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警察厅长就是新上任的朱德同志。由于过去几任厅长都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判断新上任的厅长也不会是好人。几个学生代表在到警察厅之前，商量好了几套对策，一定要警察厅释放被捕同学，否则就斗争到底。到了警察厅见到新上任警察厅长之后，和我们想

象中的形象相反，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文静、和气、面带笑容、约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彬彬有礼地招呼“请坐”，“喝茶”，象对待客人一样和我们谈话。当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他大吃一惊。原来捕人一事，他还不知道。他立即命令放人。片刻功夫，就把三个被捕的同学交给了我们。在交谈中，他还抨击时弊，谈了英帝侵我迤西，法帝强占滇南，日帝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致使云南民生凋蔽。还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等，让我们在混沌的世界中看到了光明和未来。使我顿生敬意。真是幸运得很，没想到，这次见到朱德同志竟成了我步上革命征途的开始，也是我跟随朱德同志戎马征战的起点。

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朱德同志奉党的指示到南昌，创办了南昌军官教育团。我慕朱德之名也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来到南昌，成了军官教育团的一名学员，接受朱德同志的教育。军官教育团编为三个营，我被编在第一营。一九二七年四月，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军官教育团担任副官，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当起义军向广东进发时；我担任朱德同志的书记长，负责处理重大机要工作和他的安全，成为他身边最重要的机要人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少指战员情绪低落。有些人经不起困难的考验，不想革命了。他们或者请长假另走他方，或者故意掉队，或者走到路岔口就不辞而别了。总之，悲观气氛笼罩在大家的心头上。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同志心情沉重，夜不能寐。但是，他不是以消沉悲观的态度来对待面前的严峻形势，而是以坚

强的信念来克服它。为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朱德同志在饶平全德学校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向大家说明，我们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依然有希望，革命的种子一定要保存下来。他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收拢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尽快离开此地，脱离四面围追的敌人，寻找一个适当的落脚点，再图发展壮大。朱德同志提出的所谓“落脚点”，实际上就是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当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设想以后，获得大家的一致拥护。两天以后，我们离开饶平，在麒麟岭告别了东江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出柏松关进入闽粤交界的山区，经云霄西北，绕过平和、南靖、大埔、茶阳、永定等地，穿山向西。这一路行军是非常艰苦紧张的。后面紧跟着尾追之敌，在武平还和敌钟绍奎打了一仗。到达寻乌天心圩时，部队疲劳达到顶点。朱德同志和陈毅、王尔琢等同志商议后，决定在此开个大会，整理一下队伍，鼓鼓部队士气。一天黄昏，部队集合在天心圩小河边的沙滩上，听朱德同志讲话。此时朱德同志虽然面容憔悴，头发很长，精神却很饱满。他站在沙地上大声说：我们二十五师是北伐时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我们要继续发扬叶挺独立团的战斗精神，保持教育团和二十军的战斗荣誉，发扬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顽强作风。现在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革命的旗帜我们紧紧地掌握着，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在此困难的时刻，大家要坚信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中国现在的革命就象一九〇五年俄国的革命。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面临一片

白色恐怖，使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处在极其黑暗的暴政统治之下。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我们面临的失败和困难也是暂时的。中国一定会有俄国一九一七年那样革命的成功。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就回家当个好老百姓吧！

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我终生难忘。在他这番讲话的鼓舞之下，绝大多数人表示要跟他继续干下去。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了大庾。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整编。从饶平出发时我们大约是两千人。到大庾时只剩下了九百人左右。这九百人包括南昌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在三河坝拨给朱德同志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分和潮汕失败后收容的第二十军教导团一部分。这是南昌起义失败以后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朱德同志曾说，只要能保留三百人枪，革命就有胜利的希望，现在有八、九百人，只要坚持斗争，革命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大庾整编，取消了原有的军、师、旅、团称号，改为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等番号。朱德同志为纵队司令，陈毅同志为纵队指导员，王尔琢同志为纵队参谋长。纵队下面，以原第二十五师为基础编为一个步兵大队，辖三个步兵中队；以南昌军官教育团和第二十军的零散人员为基础编为一个特务大队；将现有的两挺重机枪和两挺手提式机枪及一门八二迫击炮合组一个机炮大队；再把编余的干部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我在纵队司令部仍作朱德同志的书记长。与此同时，党的作用也加强了，

在纵队和大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在大庾经过了六、七天的整编之后；朱德同志带领我们到崇义的文英、上堡进行休整。休整时把部队分散到农村去作调查，一方面学习作群众工作，一方面为打土豪作些准备，还进一步整顿了党组织，经过约二十多天的休整，部队指战员的精神大为振奋，服装虽然褴褛不堪，但士气普遍旺盛了。部队得到此次军事政治整顿之后，又以“组织上自立、政治上自主和军事上自由”的三自原则为前提和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在粮弹等方面得到了补充。不久，朱德部队随范石生移驻韶关。十二月上旬，朱德同志和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同志对他说，省委指示：一要你参加特委，二要你率部队南下，参加广州起义。正当朱德部队准备南下广州时，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在北江特委建议下，朱德部队移驻韶关北部犁铺头整训待机。这时，何长工同志奉毛泽东同志令前来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找到朱德部队后，他向朱德同志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不久，我们的行迹被蒋介石发觉。范石生立即密函朱德，说：“统战事已被揭发……望即速行……送上大洋一万元、子弹十箱，以示饯行”。于是，朱德同志便率领部队迅速离开犁铺头，开往莽山。

(二)

一九二八年元月，我们到达了湘粤交界的莽山洞，在此边休整边等待时机。当时，朱德同志看到农民革命热情

很高，斗争勇气不减当年，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说：有这样的革命农民群众作后盾，我们可以在湘南打出红旗，打开局面，大干一场。

时机终于到了。不久，宜章县委派胡世俭、高静山、毛科文等同志前来联系，向朱德同志汇报了宜章城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情况以及城关人民对敌人的愤恨，对革命的期望等等。朱德同志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很有信心地说：“依我看，不需要费一枪一弹就可以收拾他们，拿下宜章。”在场的陈毅同志高声叫好：“对呀，这就是说，我们打宜章，不是强攻，而要智取。”然后拍着胡少海^①的肩膀说，“这恐怕要借重胡家五少爷的大力了。”朱德同志也说：“这出戏要胡少海同志演主角。”胡少海立即站立起来，坚决地说：“二位首长如此看重我，任凭首长差遣，就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胡少海同志率一支部队回到宜章，声称是国民革命军一四〇团的先遣部队，大队明天就到。胡少海到了县城之后，前后两任县长杨孝斌和黄得珍都来拜望这位威风凛凛的胡副团长，並大献殷勤地说：“宜章人民早盼有一支正规军，协助地方防匪，那怕是一个营或一个连来宜章驻防也好。现在却来了一个团，真是宜章绅商的万幸。”

^① 胡少海，宜章人。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受共产党的影响较深，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一些人在粤北山区活动。当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太平杨家寨时，他参加了起义军。胡出身大地主家庭，在他的家乡，从未暴露过革命身份。

在胡少海进到宜章县城以后，朱德同志率领我部主力进到距宜章县城约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里住下来。在这里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朱德同志在会上说：“宜章这一仗意义重大，是我们进入湘南，敲开湘南大门，领导湘南人民实行年关起义的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在湘南地区重新燃起革命烈火。”指战员们听了朱德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鼓舞，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一月十二日晚，我们得到胡少海顺利进入宜章城的消息。次日，朱德同志即率大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宜章县城。入城后，陈毅和王尔琢同志在设营和布防的名义下，查看了民团的分布情况和我们准备围攻民团的路线，按原计划悄悄地包围了伪县政府、伪警察局及反动的团防局，并在各通道上布置了严密的岗哨，作好战斗准备。

当日上午，伪县长杨孝斌亲自来到我军司令部说：“本县拟于正午略备小酌，专为王团长（朱德同志化名王楷）、胡副团长接风洗尘，万望赏光赐驾。”朱、胡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既然杨公盛情相邀，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只好叨扰了。”

中午，杨孝斌在县议会二楼设宴，除朱德、胡少海等主宾外，赴宴作陪的还有全县的官僚、绅士多人。酒过三巡，朱德同志突然宣布说：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威作福，摧残革命，屠杀工农，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应把你们立即逮捕，交人民公审。朱德同志这一宣布，吓得那些官僚、绅士浑身发抖，一个个束手就擒。只有狡猾的县保安队长邝镜明没有出席宴会，

漏网逃掉。我们立即将团防局，公安局四百多名武装缴了械。又打开监狱，释放了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无辜被关押的劳动群众。还打开粮仓，将粮食发给贫苦农民。地下党的同志为我们赶制了几面镰刀斧头大红旗，插在县政府、公安局和县城的各个城门楼上，暴动取得了胜利。

宜章年关暴动是湘南起义的序幕。宜章暴动的胜利，为推动整个湘南地区的起义创造了条件。朱德同志指示要大力宣传宜章暴动的意义，扩大暴动胜利的影响，并派骨干分子或派部队到附近各县、各区去组织和推动暴动。在此之前，湘南地区的工农群众在各县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已发动过一些暴动，但由于力量小，没有革命军队配合，指挥又不统一，因而都遭到敌人镇压。宜章暴动胜利后，附近各县的党员和革命群众都来找我们。在朱德同志领导下，我们一一热情接待，派出人员或发给枪支弹药，协助他们回去重新组织群众暴动。

大约一月二十一日，许克祥率部进犯宜章。敌人以六个团的兵力，攻我一个团，而且敌人武器远胜我们。朱德和陈毅同志商议，不能同敌人硬拼，决定先主动撤走，然后再寻机歼敌。当天晚上，朱德同志便率领我们经梅田、浆水，次日进到埼石。二十三日朱德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支援围攻黄沙堡城的农军。城内敌人一部分挖地洞逃跑，其余全部被歼。二十六日我军离开黄沙经长村水北岸至观音寺，许克祥先头部队一个营与我遭遇，结果被我消灭，敌营长被击毙。三十一日我军配合地方农军两千多人，从圣公坛出发，分三路进攻岩泉圩敌人。朱德同志率我军主

力从新圩向岩泉正面进攻。我先头部队进至距岩泉五、六里的柏树亭时，侦察到敌人正要吃早饭。一个地主将我军即将到来的情况飞报驻岩泉的敌贺团长。贺却不相信，认为他是大惊小怪，扰乱军心，吩咐照常开饭。这时我军迅速向敌人发起进攻，大批农军也从四面包围敌人。贺敌不支，退向栗源渡头河边，企图抢渡浮桥，又被我军消灭一部，其余向武阳司逃窜。当时，许克祥的六个团的兵力摆在从岩泉经栗源堡、武阳司至坪石一线。我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又接连击败栗源堡、武阳司之敌。次日即进至长岗岭，准备直捣许老巢——坪石。许敌企图在长岗岭与我决战。这时胡少海抄小路到此控制了制高点，敌人上下受攻，结果大败，溃不成军。许克祥只身化装藏在武水河的船仓底下才得以逃命。此役我军包括农军在内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之众，缴获枪枝数千、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十余挺，俘虏官兵千余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狠狠打击了猖狂一时的刽子手许克祥。朱德同志在坪石召开的祝捷大会上这样说：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摧残革命、屠杀人民，曾经何等威风，今天却成了“许送枪”，送给我们许多枪炮，这证明革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工农大众。

二月三日朱德同志率部经白石渡向郴州进发，途中在折岭和大步桥粉碎了由郴州出来堵截我军的王东原部。我军顺利占领了郴州城，接着又在各县地下党紧密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永兴、资兴、耒阳等县城。

在朱德同志组织和指挥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湘南

地区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都相继举行了暴动，其他四周邻近地区也受上述暴动的影响，纷纷举行暴动。整个暴动烈火烧遍了大半个湘南。因为这次暴动时间在农历年底，所以被称为湘南年关暴动。

(三)

宜章暴动胜利以后，朱德同志宣布，南昌起义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撕下青天白日的旗帜和帽徽，换上镰刀斧头的旗徽和红布五角星的帽徽及以“红军”字样的袖章。在此期间，大批提高了觉悟的农民纷纷投奔到朱德同志率领的革命部队中来，使这支队伍很快由原来的八、九百人发展到了一千三百余人。它是湘南人民暴动的有力台柱和建党、建政以及开展土地革命的强大后盾。

此后不久，我们还收编了王光佑领导的一支农民自卫军，将其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方营，由王光佑任营长，曹嗣仁为付营长，派出张登源任党代表。后方营的任务是留守后方，救护伤病员，实际上成了一个后方医院。在后方营所在地还办了一个小兵工厂，制造土枪土炮。此外，我们还在耒阳建立了一个兵工厂。此厂能制造一种“大炮”，这种炮是把粗大的松树适当掏空后做炮筒子，威力蛮大，可以杀伤敌人，也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后方医院和兵工厂的建立，可以说是湘南起义的一大特色。

除发展和健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支正规部队外，还组建了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和第七师。宜

章暴动胜利以后，由于许多工农青壮年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于是新组编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后来我们北上郴州、耒阳，这个团奉命留守宜章，并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胡少海任师长。这是湘南最早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全师约八百人。郴州暴动胜利后，先组建了赤色游击队，随后又在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七师，也叫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师长邓允庭。这个师比第二师编制大，人员也多，辖五个团，约六千余人。耒阳暴动胜利后，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邝廓。该师也属于农军性质，平时带着武器搞生产，战时配合主力作战。这个师虽然武器差些，但人数较多，作战很勇敢。除了上述三个师外，还有永兴县的赤色警卫团和资兴县的独立团。

湘南暴动后，不仅扩大了正规部队，组建了地方部队，还组织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各种形式的梭镖队、大刀队，前前后后共有几十万人，参加到了工农革命武装的行列中。

建立、健全和巩固湘南党的组织，也是湘南暴动胜利后的一件大事。当时湘南党的组织大体是这样几种状况：一种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地下党仍在坚持斗争，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二种情况是原来的党组织被破坏，当地组建的临时党组织在坚持斗争。第三种情况是只有工会和农会等群众组织，没有党的组织。

宜章是暴动胜利最早的一个县。暴动胜利后朱德同志亲自参加了该县党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扩大加强了宜章县委组织，决定宜章县委以胡世俭任书记，增补陈东

日、张际春，陈策为委员。湘南暴动部队占领郴州后，新的县委会亦随之组建。该县原来有地下县委，但不很健全。新县委以夏明震为书记。在夏明震同志牺牲后，陈毅同志还代理过郴县县委书记。由于耒阳县委一直在颇有成效地坚持地下工作，所以朱德同志到达耒阳后，耒阳曾一度成为指挥湘南暴动的中心。耒阳县委在朱德同志亲自领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永兴县委则是在工农革命军占领以后正式组建的。县委书记李一鼎是刚从耒阳县调来的干部。安仁县委也是新组建的，县委书记由徐鹤担任。此外资兴等县原来只有党支部，战斗力较弱。暴动胜利后，党的组织也大为增强。其它一些地方，朱德同志也都派人去指导和具体帮助建立了党的组织。

党的领导加强之后，湘南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运动，使湘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最早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是宜章。宜章苏维埃政府是在元宵节那天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毛科文。紧接着郴县、永兴、耒阳、资兴、安仁等县也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宜章、郴县、永兴三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较长。安仁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间较晚，存在的时间也较短。它是朱德同志率部快要离开安仁向井冈山转移时成立的。主席唐天际是由朱德同志亲自提名的。除上述几个县外，其它邻近县的部分乡村也有工农兵政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革命组织建立和出现。朱德同志在湘南起义后的建政工作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他为筹划各县及时

成立苏维埃政府，领导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经常彻夜不眠。

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任务艰巨、工作繁忙。除发布法律、法令、组织宣传队、发行劳动券、组织区、乡各级革命群众组织外，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军事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南昌起义时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未能同工农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很好结合起来。湘南暴动后，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开始通过政权机关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从而造成有深厚民众基础的革命运动。这是湘南起义的历史功绩。

在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开展群众运动的时候，湘南的革命斗争曾受到湘南特委“左”倾盲动错误的严重干扰。当时湘南特委为了还击敌人的屠杀政策，提出了错误的“焦土战略”，命令将广东乐昌通到湖南衡阳的湘粤大道两侧各五里之内的房屋一律烧光，据说这样才能使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而走向革命。湘南各县有的执行了这一错误路线，给广大人民造成很大损失。损失最严重的是湘南特委所在地郴州，几条街道和许多民房都被烧光。郴州的土豪劣绅抓住“左”倾的错误行动，又乘我主力远离郴州，就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公妻，要烧方圆五十里民房”、“工人要杀农民”等等，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在这些谣言的欺骗和蒙蔽下，一些群众便跟着反动分子在郴州闹起事来。他们携带梭镖大刀，闯进正在举行群众大会的会场。当场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妇协主任何善玉等九名干部（内有二名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指挥员）和一部分革命群

众。当时在耒阳指导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暴动成果的朱德同志闻讯后，迅速派陈毅同志带一个营返回郴州，镇压了暴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郴州“反白事件”。

这一事件亦是推行“左”倾错误的直接后果。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再度发生，肃清“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朱德同志首先派陈毅同志兼任郴州县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陈毅同志到任后，积极采取措施，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并向群众说明烧房子是错误的。朱德同志还利用“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性和损失，教育部队的党员、干部和战士，严禁部队再烧毁民房，命令各县解散“放火队”、“杀人队”等各种推行“左”倾错误的组织。他亲自向地方干部宣传说：房屋是人民造的，烧了可惜，革命胜利了、房子可以住穷人，也可以办公。还说反革命分子是要惩办的，但要分清首恶和协从，不能一概皆杀。由于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努力工作，“左”倾错误逐渐得到纠正，群众重新开始相信和拥护我们。后来该县有六千余人的农军，跟随朱德同志一起上了井冈山。

湘南暴动的胜利，给反动派以极大的打击，引起了敌人的严重恐慌。但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使我们的斗争受到了挫折；也由于湘粤桂军阀混战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暂时结束，反动派开始以优势兵力发动对湘南起义部队的围攻。为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决战，朱德、陈毅同志于四月上旬果断地率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

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共一万余人，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岗砦市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大起义部队在宁岗砦市举行会师大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下辖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师，共三师八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第一支主力红军的诞生。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是坚决维护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生。我仅就湘南起义作些回忆，以表示对我最敬爱的启蒙人朱德同志的缅怀和纪念。

红军长征以后

袁血卒

(一)

一九三四年十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当时，我在红二十四师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保卫苏区。这样，我也被留在中央苏区了。

红二十四师师长是周建屏，政委黎林。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师长仍然是周建屏，政委由杨英接任，我继续代理政治部主任。全师三个建制团，即七十团、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七十团政委游士雄，七十一团政委姓钟，七十二团政委姓张。这三个团都是大团，每团有三个营，人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从指挥员到战斗员，大部分是一、三、五、八、九军团留在中央苏区的伤病员，伤愈病好归队补充进来的，因此，战斗力并不强。

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由项英兼任，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后叛变，很坏）。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贺昌同志。政治部下设组织部，负责人史犹生；宣传部，部长李翔吾；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破坏部，这两部的工作由我负责（我从红二十四师政治部调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还设有秘书处，负责人是林中伯。

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在党的长江局工作过。到了中央苏区后，他曾任兴国县委书记，把兴国创造成模范县。初见他时，他给人的印象好似个只会板着脸孔、根本不会笑的人。其实，他待人很诚恳。由于操劳过度，营养不足，他的脸色焦黄，显得更严肃。我第一次到政治部开会，只见他躺在椅子上，合着眼象睡熟了。待大家汇报完，他扼要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却是那样的深刻而明确。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很好。陈毅同志的腿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伤，这时还没有完全好。贺昌同志的腿也负了伤。他们俩常在一起。我那时年轻，精力足，便在他们俩中间跑腿，有时给他们弄些吃的。中央军区政治部的一般日常事务工作，也主要是我处理。他们两人待我都很好，常叫我“小袁”，或叫我“丘八”（因为我原来一直在军队工作）。政治部开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由刘梦槐同志主办。后来他被肃反肃掉了，这个训练班就由我兼管。贺昌、陈毅有时到训练

班讲讲课。

(二)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原在东线作战的红九军团撤离长汀南部，往瑞金、会昌方向集结。红二十四师奉令接替九军团防守阵地，阻击东路敌人前进。十月间，红二十四师一直在福建与东路敌人作战，掩护主力突围转移。十一月一日，敌人占领了长汀县城。十一月十日，敌人又占领了瑞金县城。红二十四师这时已撤退至瑞金的九堡一带待机。

敌人占领瑞金城后，趾高气扬，继续向会昌推进。二十四师的指战员们，眼看着“红都”瑞金遭受着敌人的蹂躏，气得直跺脚，纷纷要求狠狠打击敌人，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根据敌人的行动情况，师部领导进行了讨论，意见是一致的，都主张打一个伏击战。项英也极力主张打一个大胜仗。根据侦察，我们获悉进攻会昌的敌人是东路第三师，师长李玉堂。在九月初的温坊战斗中，我们二十四师配合红一军团，曾痛击该敌，歼灭其第八旅两个团，俘虏近两千人。温坊战斗后，该师撤至后方进行补充整顿。现在，敌东路司令蒋鼎文又将它调来进攻会昌。十一月二十二日，李玉堂这个红军手下的败将、红二十四师的老对手，率领全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赶到谢坊附近的湾塘岗埋伏。湾塘岗距会昌县城二十里，其右侧是起伏的山岗，左侧是瑞金河，中间一条大道直通会昌城，

是设伏的理想战场。中央军区命令二十四师三个团埋伏在湾塘岗右侧山丘后面，命福建独立团在瑞金河左岸阻击敌人前进。敌全师三个旅分成三个梯队，各相距十余里沿大路前进，同时派有一个营沿瑞金河左侧与主力平行前进，以作掩护。中午时分，敌先头旅大摇大摆地进入红军埋伏圈。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朝敌人猛扑过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顿时晕头转向，不到半个钟头，敌人一个旅便被歼一半。但是，由于红军兵力不足，福建独立团又未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加上周建屏未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下令部队突击，结果将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马牲口。

“谢坊战斗”后，还有一个“洋陂战斗”。这次战斗也是二十四师打的，没有打好。这次战斗我没有参加。

自“谢坊战斗”后，敌人发现我中央苏区仍然留有主力红军，便不再象原来那样长驱直入，而是一方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对中央苏区实行分割包围，同时寻找红二十四师决战。这样，形势越来越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分局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当时听到一点情况，知道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项英同志为代表。他认为主力红军突围到湖

南后，必定会打几个大胜仗，那时“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就会撤退，中央苏区就可恢复，因而主张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另一种是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他认为敌人对中央苏区重重包围，我们要面对现实，转变战略思想，分散打游击，保存有生力量，保存骨干，待机而动。当时我们都认为陈毅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贺昌同志也支持陈毅同志的意见。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下旬或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中央分局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但我不是以分局委员的身份，我是政治部工作人员，有工作任务要我承担，就是决定我兼任地方游击政治部工作。这次会议是陈潭秋同志主持的，陈毅同志作中心发言，主要内容是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问题。会议结束时，陈潭秋同志征询瞿秋白同志的意见，瞿秋白同志说没有意见了。这次会议召开前后，中央军区政治部经过部务会讨论，连续发出了几个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一个是《节省子弹和收集子弹壳》的“五分钟报告大纲”和为此发出的《通令》；一个是政治课教材《巩固我们的部队》。这几个文件都是由贺昌同志和李翔吾同志起草的。他们俩天天工作到深夜，眼睛熬得血红血红，真够辛苦。我这个壮小伙子，就给他们端水、搞夜饭。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有时能搞一点牛肉就是最好的了。

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区政治部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广大军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

一天早晨，还不到六点钟，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同志，就来到我面前，对我说：“剧团的小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去告诉他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过分乐观的宣传脱离实际，没有好处。告诉他们，要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确实，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胜利归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紧张和严重。

剧团和政治部各住一个小山头。如果吹一声哨子，他们都可以听到，但如果要往返一次，最少要费几个钟头。贺昌同志将这任务分配给我，也有关怀我的意思，他知道我爱人在剧团工作。我遵照贺昌同志的吩咐来到剧团，传达了贺昌同志的指示。同时，我也见到了在剧团工作的爱人。

我还奉命到医院去动员伤病员疏散转移。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七千名伤病员，经过治疗，有一半左右出了院，补充到了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剩下几千名。由于环境险恶，形势严重，这些伤病员不能集中在医院里，需要疏散到群众家中去，有些还要转移到外地

隐蔽。为此，中央军区政治部和卫生部制定了疏散方案，还逐个地确定了伤病员中一些负责干部的疏散名单。我去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几百名伤病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的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儿，伤病员们要我转交给政治部的意见就有几百件，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病员也表示：“死也不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示一个共同的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观形势相矛盾，也直接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相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将道理说清，能够做通工作。于是，我首先找到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中包括医院的院长和政委，周副团长排在第三名），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且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的思想通了。就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这期间，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了。谢然之原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又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秘书长。他有病，被安排在瑞金农村养病。后来他就叛变了，还发表了反党的宣言。谢然之叛变后，贺昌同志要李翔吾写一篇社论，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李

翔吾奋笔疾书，写了《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红色中华》报为此发了专版。我也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比粪臭，比蛆脏，比狼狠，比蛇毒，真正的两脚兽，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拍来电报，指示要改变斗争方式，化整为零，分散队伍，分散机关，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在驻地井塘村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分局大部分领导同志都参加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都在。会议主要是研究部署突围，将中央分局、办事处和军区人员，疏散到各地去打游击。

分局紧急会议后，在分局机关驻地，由工农剧社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会演。会演在晚上进行，戏台搭在一个山窝里，用松柴点火照明。分局和办事处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演出的节目中，有《牺牲》、《王大嫂》等。《王大嫂》这个剧本，是石联星同志写的，我给她修改了。石联星同志说是我写的，她这是谦虚。

这次会演后，机关人员开始分头疏散到各地打游击。因为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山、工农剧社的石联星和其他演员同志，都被安排到赣南军区打游击，因此，我便到赣

南军区驻地黎板桥去，与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进行具体安排。黎板桥是当时赣南省的一个比较大的圩镇，也是中央苏区剩下的最后一个比较大的圩镇，省、县领导机关都驻在这里。我骑着一匹骡子往黎板桥走去，沿途看到的是一派紧张的游击战争的气氛。背枪的、拿梭镖的、挑担的大人、小孩们，在大路小路上穿梭般的匆匆来去。人们的表情是严肃的，又是镇静的。这一切都表明：在战火中生活的苏区人民，经受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赣南军区政治部驻地在离圩镇几里路的一个村子里。我来到军区政治部办公的地方，刘主任很热情地招呼着我：“好快呀，刚听说你们要来，你马上就来了。”不等我开口，他又说：“中央军区政治部的动员报告和贺主任的指示，我们已经照着执行了。我觉得还应加上一条群众性的对敌宣传。”我坐到刘伯坚同志面前，好象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说不出。我和刘伯坚同志早就相识。我们谈完了工农剧社演员的疏散问题后，刘主任关切地询问贺昌同志的伤腿好了没有？我说：“还是那样，一颠一跛，看来走路是有困难。”刘主任很为贺昌同志担心。我提出想为贺昌同志选一匹好骡子。刘主任满口答应，说他们有好几匹，让我挑。于是，我挑选了一匹较好的，告别刘伯坚同志，回到了中央军区政治部驻地。

(四)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形势紧张到了极点。根据中央

的指示和中央分局的部署，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和机关人员，陆续出发，分头突围。

当时，龚楚、史犹生和石衡中率七十一团到湘南去打游击；李天柱、孙发力带七十二团的大部分，往闽粤赣边打游击。毛泽覃、张凯等同志，都分别带了部队去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三月上旬，各路突围部队都走了，最后剩下项英、陈毅、贺昌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部穿过会昌封锁线，往福建长汀地区突围。突围前，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四个大队（红七十团番号同时取消）。贺昌、周建屏、杨英、郭如岳等编在第三大队。我和李翔吾等编为第四大队，我任大队政委。我们大队的任务是掩护其他大队突围。项英、陈毅等携带电台，分别编在另外两个大队。这是中央苏区战斗到最后的全部“财产”。

突围前夕，陈毅同志打算加强我们的队伍，将会昌独立营也归我指挥。一天，陈毅同志找到我，说：“老袁，广东敌人经常到小溪一带来骚扰，气焰嚣张，你看打它一家伙，行不行？”我说：“行！”我率部队来到小溪，准备在拂晓前给敌人一个痛击，打了后马上往回撤。天亮前，战斗正准备打响，项英就通知我们说不要打。于是，我们只好将部队撤回到原阵地的一座高山上。

在这座高山一间老百姓用来放香菇的破烂棚子里，贺昌同志向我们布置了突围的任务，作了突围的动员。当时，我们突围的方向和路线，是经乱石圩（原属会昌县，一九

三四年春后属苏区登贤县，现属于都县），渡过安远河（濂江），越过会昌的天门嶂山脉，到福建长汀地区去。军区给我们分发了到白区去的活动经费——白洋和钞票。贺昌同志扶着他那残废的右腿，翘在长凳上，向大家说：“同志们！主力红军已经胜利地进入贵州的第二个大城市，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中央在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给了我们今后斗争的指示。现在，我们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弹缺粮缺，特别在这深山之中，孤军作战，形势是严重的。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对党对人民忠心的时候，也是考验每个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的时候……”。

三月九日下午三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领第四大队随后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等同志突围。我们出发时，项英正在向中央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远河，到达天门嶂。我们过河后，由于当地的“铲共团”报告，敌人已发觉我们的突围行动，当晚从仁风开来一个团，将安远河封锁了。这时，天下大雨，河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一阵，但一直没有同项英、陈毅他们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我们受到敌人包围合击。战斗打得很激烈，部队全被打散了。贺昌同志在晓龙的归庄被敌人包围。他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做了壮烈的自我牺

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其他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吾、何侠（即周子桢）、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和钟伟生七人。我们七人藏在水沟的深处，敌人就在附近搜索，他们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李翔吾说：“每个人都顶上子弹，准备万一。”我补充说：“如果被敌人发觉，就一齐冲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就这样，我们在水沟中从天亮坚持到天黑。当晚，我们踏着月光，顺山沟摸着前进。这时，白军和“铲共团”在大路小路都布满岗哨。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下，商量了三条办法：一是与闽西红军取联系；二是返过安远河，找中央分局的领导机关；三是万不得已时，到上海找党的关系。为了避开敌人，我们专找没有路的地方走。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肚子饿得很。两个小同志饿得走不动了。我们只好冒险向一幢残破的屋子里摸去。幸运得很，找到了一些充饥的食物。就这样，我们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摸着向前走。摸呀摸，一次，摸进敌人哨所，敌兵鬼叫一声，我们马上缩回来绕道走了。又一次，陈松林同志走前面，摸进敌人的驻地，被敌人抓住牺牲了。

敌人更残暴了，漫山遍野放起火来。我们分析了情况，决定到上海去。于是，我们又冒着春雨摸黑前进。由于过分疲劳和紧张，我们都想休息一下再走。顺着山脚走了一段路，看见路边有一间标准的江西式的房子，房子有两层，上层是搁东西的楼房，低矮得进出都要低头，下层好象长期没人住过。我们关着门，烧火烤衣服。天快亮了，我们爬上楼去，准备歇到天黑再上路。

大约上午九点钟，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但是，我们已被敌人发现，被二百多“铲共团”包围了。敌人嚣张得很，嚎叫着要我们“缴枪”。是时候了，犹豫就等于死亡！我向廖得标同志，也是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吧！”廖同志第一个冲下去，放了一梭子弹。他背心中了一弹，仆倒在地上。唐继章同志向敌群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我放了半梭子弹，冲了下去。李翔吾也冲下去，接着都冲下去了，一直向对山冲过去。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等冲到对山的棱线上，我也赶上了，李翔吾却负了伤。这里地势较高，我们停下来，掩护李翔吾同志的到来。李翔吾同志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他就这样在伤势沉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他的鲜血，在我们心中留下沉痛的记忆。

包围我们的是广东敌人。他们兵力众多，企图将我们搜捕干净，彻底消灭。为了避开敌人，我们既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走小路，专门走那些深山老林。没有向导，没有指北针，只好在朦胧的月色下，大体估计着方向，向南走去，因为南方敌人较少，到海边乘船去上海较方便。一路上，我们忍着寒冷，忍着饥饿，爬过敌人放火烧过的山岭，钻过敌人设置的鹿砦和铁丝网，趟过冰凉的河水，衣裳被撕烂了，手脚也被挂破了，脸上也有条条伤痕。何侠同志的脚被竹签戮穿，拄着半截树枝一拐一拐的。这样昼伏夜行，整整经过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相互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一双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得象挖煤的炭古佬一样。

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我们这四个人（我和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早晨到了上海。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红军长征中的任弼时

章学新

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贺龙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是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的三大主力之一，它是以红二、六军团为基础，在长征途中发展起来的一支劲旅。在历时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先后与红三军及红四方面军会师，策应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且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任弼时同志是二方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方面军能够在长征中发展和坚持下来，他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先遣西征，会合红三军，以坚决积极的战斗行动牵制敌人，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反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遭到重大挫折。为了调动和分散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

中央电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建立联系。党中央指派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八月七日下午，全军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江西遂川的横石西行，进入湘中，渡潇水，过湘江，在湘黔桂三省边界迂回转战。十月二十四日，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于贵州印江县之木黄胜利会师。两军会合后，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二、六军团合成一个战略单位，统一行动。

红六军团的西征，跨越了赣、湘、桂、黔四省，长驱五千多里，历时七十八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大转移先遣探路的任务。

十月中，中央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意图是渡过湘江，进入湖南，“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①。蒋介石发觉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急调重兵四十万，力阻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指挥下，付出巨大代价，强渡了湘江。这时，红军人数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敌人又设重兵于湘南，企图围歼红军，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西进贵州，二、六军团在敌人的侧后发动了强大的湘西攻

^① 刘伯承：《回忆长征》，《八一杂志》1959年第20期。

势，于永顺县的龙家寨首战告捷，歼灭敌两个旅大部，击溃一个旅又一个团，俘敌参谋长以下两千余人；接着乘胜连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包围湘西水陆交通枢纽常德，威胁长沙、岳阳。迫使蒋介石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出三个师兼程北上，阻止二、六军团的活动，又令鄂敌三个师两个旅停止入川，防守长江；黔敌两个纵队四个师，急转到湘黔边境。当时，二、六军团会合不久，部队极需休息和整顿，但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黔，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二、六军团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在一个半月的凌厉攻势中，先后歼灭了敌一个师、一个旅的大部，调动牵制了敌十一个师两个旅的兵力，减轻了敌对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突围作战。

在湘西攻势进展的同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宣告成立，任弼时任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为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中央电示，省委为这个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这块革命根据地东西长四百多里，南北宽二百四五十里，人口约有四、五十万，它东慑长沙武汉，西瞰川黔，地处中央红军进军路线的右侧，象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追剿”中央红军的敌人后背，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使蒋介石不得不时刻提防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汇合，从而吸引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一方面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中央军”共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对红军进行“追剿”；另一方面则以六个纵队分进合击湘鄂

川黔根据地，企图巩固其侧后，消灭二、六军团于孤立地区。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再占遵义，在忽东忽西的转战中甩开追敌，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团则利用广阔的游击区域，在敌人分路进攻中，抓住其弱点，各个击破，从而牵制和吸引了大量的敌人，策应了中央红军向四川转移。从一九三五年二月至八月，半年之内二、六军团历经大小战斗三十次，与敌八十六个团直接作战，毙伤敌一万以上，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人，师参谋长二人，击毙师长一人，旅长二人。英勇顽强、连续奋战的二、六军团在任弼时和贺龙率领下，不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而且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年轻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而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消除王明路线的危害，努力加强红军的建设

二、六军团会合后，两军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亲密团结，无分彼此。六十年代初，贺龙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二、六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总之，二、六军团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①

^①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

两军会合后，力量壮大了，但部队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六军团从湘赣到黔东，劳师远征，部队十分疲惫，特别是甘溪一战，与桂军仓促遭遇，一度陷入湘桂黔敌二十四个团的包围，在乌江东梵净山区的崇山峻岭里转战数百里，减员很大，他们迫切需要休息和整顿。而红二军团则由于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积极执行王明路线，自一九三二年离开洪湖根据地后，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战略上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取消了省苏维埃的名义”，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干部遭受不应有的打击，甚至“解散了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政治系统完全破坏”，“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完全停顿”，虽经贺龙、关向应等不懈的斗争，但是在部队的整顿和建设方面，仍存在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两军会师后，在中央代表、省委书记任弼时的主持下，经两军领导会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批判了夏曦的错误。应当说，对于王明路线的系统认识和批判，包括任弼时本人在内，是后来经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之后才完成的，但是，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任弼时在担任湘赣省委书记时就有所抵制，保护过一些好同志。为了消除历史遗留的肃反扩大化在二军团中的恶劣影响，任弼时等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报告，并建议由贺龙担任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为副主席。同时着手进行整顿，平反错案，恢复了一些同志的党籍，重新使用一些被撤职的干部。湘西攻势告一段落后，又在大庸县的丁家溶召开两军主要干部会议。任弼时根据当时的认识，批评了夏曦的错误。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来电，肯定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应该的”，指出“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些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夏曦后来曾担任过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省革命委员会付主席、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在正确处理党内犯路线错误同志的问题上，任弼时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践了后来经毛泽东概括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原则。

二是迅速恢复和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政治工作。经向周恩来请示后，“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又从红六军团抽调四十多名有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充实二军团师团政治机关，使二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在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在总结会师三个月来加强红军政治建设的主要收获时指出：会师以前，红三军的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经过整顿，除十一、十七两团外，已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党团员增加了四倍，各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会合以前，红三军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经过整顿，各级政治机关系统地恢复起来了。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

战斗力有了增强。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指出，那种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的言行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强调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是努力提高战士的军事技术素质。任弼时根据实际战斗中的教训，强调要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求每个战士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投手榴弹、刺枪、射击、对空射击等基本技术，要求干部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在长征途中，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所以能够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的团结，克服千难万险，战胜强敌追堵，其力量的源泉在于革命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深入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

三、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遵义会议召开时，任弼时和贺龙正面临着两项中心任务：一是建设新成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二是抗击敌人对根据地的大举进攻。由于战争的分割，他和贺龙都没有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贺龙曾经说：“我们在湘鄂川

黔根据地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逐步转变的。……对毛主席的思想是逐步认识的，并不是遵义会议的决议一来就马上接受了，这其中有个过程。”^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底，敌人以六个纵队十一万兵力联合向根据地进攻。二、六军团集结主力准备在根据地内箝制和吸引敌人，击破敌人的“围剿”。当时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思想还是从正面迎击敌人，没有摆脱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二月十一日，中革军委得知湘鄂敌人联合进攻二、六军团的计划后，电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②显然，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提出的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新的指导方法，根本改变了遵义会议前在军事上单纯防御的消极思想。任弼时等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立即电询中央。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③。任弼时等方才知道遵义会议的基本精神。

这时，敌郭汝栋纵队一个旅已从东面威胁根据地的基

①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 《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电》，转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③ 《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本地区大庸，大敌当前，二、六军团即先后于三月八日和三月二十日投入谿口战斗和后坪战斗。由于单纯防御，正面迎敌，战斗效果并不理想。四月上旬，二、六军团收到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任弼时立即向团以上干部传达。四月十二日决定撤离省委所在地塔卧及龙家寨根据地，进行外线作战，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相继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战斗的胜利，改变了被动局面。接着二、六军团利用掌握之主动权，主力远出向东进到敌人侧后，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进而北渡长江之势。这一行动，迷惑了敌人，威胁了敌后方交通，迫使敌人一部分掉头东返慈利、石门，一部分北上防堵红军渡江。这就从全局上调动了敌人，使敌原来分进合击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经忠堡战斗、板栗园战斗和芭蕉坨战斗的胜利，敌六个纵队均被击败，歼灭了大量有生力量，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锐气。任弼时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经验：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一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和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分散敌力，以配合主力进

行决战。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

此后，任弼时等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越来越自觉，而且不断地总结战斗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四、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发动群众建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随着湘西攻势的胜利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建立后，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在战斗的紧张状态下，同时展开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和党的发展等工作，并且制定了各项基本政策，这些政策恢复和发扬了井冈山的革命传统。

在土地政策方面，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在苏区“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有的还把地主富农驱赶出苏区，“使革命势力被孤立，红军运动受挫折”。湘鄂川黔的土地政策恢复了井冈山时期的传统，注意了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虽然还保留了共产国际规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内容，但是在三个方面是有进步的：一是更加强调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规定在平分土地时“中农的土地是否平分，必须特别集合中农，征求大多数中农的意见，由中农表决”；选举土地委员会时“应注意吸收中农参加”，

“巩固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联盟”。二是取消了反对富农、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主张，强调要“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行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倾向”。三是保护工商业，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这些新的规定，特别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政策，和一年以后中央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任弼时从实际出发，主动地纠正“左”的错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在地方党的建设方面，省委把迅速发展建立党组织看成是“城市与农村的革命斗争，游击战争与临时革命政权胜利的保障”，要求立即在新区开展征收党员的运动，反对不相信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在详细审查的前提下“大批吸收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强固无产阶级基础”；为保证党的质量，规定“对于革命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党员比非党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并要大胆提拔“阶级意识坚强，成份好，工作积极”，“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当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中的领袖”，担任指导机关工作。

在政权建设方面，强调“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建立起来，党不能去代替包办政权的日常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培养政权独立工作的能力，决定了的问题大胆交给政府工作人员去做，建立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认识政权是自己的权力机关。”任弼时认为，要健全政权的组织机能，使它成为坚决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清洗革命委员会里面的消极怠工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对党政领导机关的作风，任弼时提倡“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及时地了解群众中的实际问题，给以及时的适当的满足，指出“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

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省委和省军区指示各级地方党委和当地红军政治机关，“立即派遣最强的共产党员去担任游击队政委”。在游击队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讲授《红军读本》、土地法令等，“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下行动”，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群众武装，成为“红军的最好的助手和后备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当时，二、六军团已告别湘西进入黔东。部队到了石阡，任弼时在活动分子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新精神，并广泛宣传，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这时，敌营垒中矛盾重重，各怀鬼胎。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派嫡系部队入贵州，迫使贵州军阀王家烈交出政权、军权，演了一出“假途灭虢”的丑剧。于是参加“追剿”的各路军阀人人自危，力图保存实力，而王家烈的残部及反蒋的民变武装在抗日反蒋的号召下，主动与二、六军团靠拢，相约共取毕节。在有利的形势下，二、六军团轻取毕节。发动群众，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上层民主人士。这时，有一位老人要求见二、六军团最高领导人，任弼时派夏曦走访。这位老人叫周素园，曾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国民党贵州省长官公署秘书长，赋闲后

读过些马列的书，红军进毕节时，他没有跟随国民党撤走。周素园和夏曦交谈后，表示赞成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任弼时会见了，并请他出任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又请他写信给“追剿”红军的滇军纵队司令孙渡，告以红军的抗日主张，并指出蒋介石派嫡系万耀煌、樊嵩甫入云贵，实为假途灭虢，王家烈的下场，已前车有鉴，要孙渡给北上抗日的二、六军团让路。当时龙云对蒋军入滇戒心颇重，周的信切中要害。后来，孙渡虽然没有让道，但他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使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得以休息二十天，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临时政权，组织抗日救国军、抗日联军，扩大红军五千多人，这是任弼时等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收获。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时，周素园跟红军一起行动，过雪山草地，直走到延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五、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反对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推动红军三 大主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留在长江以南的二、六军团和党中央中断了联系，任弼时独挡一面，处理军政要务。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情况。任弼时即用密码复电，翌日收到了朱德、张国焘的联名电，内称：“二十九日电收到，一、四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张国焘

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①。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六军团又收到朱德、张国焘联名来电，要他们在“旧历三月中水涨之前设法渡金沙江，到雅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三十日又电，说最好“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二、六军团遂于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通过藏民区，于七月二日齐集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军会师之前，任弼时对张国焘对抗中央，反对北上，甚至另立中央，发布“大军南下令”，攻击污蔑中央红军，“反对毛周张博”等恶劣行径，是完全不知道的，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材料，真假莫辨。

到甘孜后，任弼时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及刘伯承等，同他们作了详细交谈。朱德将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告诉了任弼时，指出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合。刘伯承也说，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任弼时对张国焘其人是有早有所知的，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避免分裂，任弼时和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等站在一起，一面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一面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和张国焘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污蔑。两军先头部队会合后，张国焘即派人向二、六军团送来一批《干部必读》等文件材料，污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① 《朱德、张国焘复任弼时同志电》，转引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并竭力拉拢二、六军团，说什么“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两军会合“将要更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①，“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等^②。任弼时发现后，立即告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能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不准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一方面军，文件材料一律不准下发。又指示将文件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

二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分化拉拢二、六军团。六军团抵稻城时，张国焘派人拉拢，要六军团快走，“六军交给他指挥”；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又要任弼时离开二、六军团，“另派政委”，“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均被任弼时顶了回去。七月初，奉中共中央命令，二、六军团改称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使张国焘分化拉拢二、六军团的阴谋破产。

三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召开两军联席会议的提议。张国焘派人对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并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以求所谓“一致”。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鲜明表示，“唯有在党中央十二月决议^③的基础上才能一致”。任弼时说：至于召开联席会议，报告由谁来做？如果发生

① 张国焘《在五五纪念节上的报告》，《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2页。

②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③ 指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意见分歧，结论谁来做？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如果二、四方面军意见不一致，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

七月二日，二、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庆祝会，朱德、贺龙、刘伯承在讲话时一再强调团结北上。任弼时在讲话时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迫于形势，不得不表示北上的愿望。

在此期间，任弼时多次和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交谈。过草地时任弼时会见了徐向前，徐向前拥护北上，明确表示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倡议“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①。任弼时很高兴，表示一定要为党的团结作出努力。七月十日，任弼时电中央：“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任弼时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会议。”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任弼时为副书记。此后任弼时在西北局的会议上又多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和斗争。当张国焘提出西绕青海，北出甘北的计划后，九月十八日，西北局举行会议，会上否定了张国焘的计划，决定北上，向静宁、会宁进军。但过了岷州，张国焘又违反决定，准备从洮州过河西去。对此，朱德连夜通知西北局委员到漳县集合商议，决定予以制止。九月二十七日中央连电制止，张国焘被迫只好北上。十月十日，三军先头部队终于在甘肃境内会合。

六、坚定的革命意志，科学的工作方法，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

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伟大的长征当中，从湘赣到陕北，行程二万四千多里，转战两年另一个月，在三大主力中是历时最长的一支队伍。二、六军团会师时，两军子弟兵八千，离开桑植时，人员增加到两万一千，北上后，经雪山草地，气候恶劣，给养困难，人员补充不易，但是抵达陕北时，仍保存了一万四千三百多人，是三大主力中减员最少的一支队伍。在敌人强大，党内斗争复杂，物质极端菲薄和中央联系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丰富的革命智慧，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部属同甘共苦，兄弟般地体贴同志，谆谆的言教，严以律己的身教，无不产生极大的政治凝聚力，成为无声的命令。任弼时在长征中的优良作风是有口皆碑的。

一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遵义会议前，当时中央军委的错误领导，竟批评刚刚会师的二、六军团联合行动“是

绝对错误的”。但任弼时和贺龙等认为合则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力量单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于是郑重决策，一再向军委申述理由。实践证明，两军统一行动，才取得龙家寨初战胜利，打开了立足湘鄂川黔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发布后，根据中央精神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任弼时宣布，对愿意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只要接受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部队可以不收编。一时地方的抗日反蒋武装纷纷来归，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任弼时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实事求是决策的伟大气魄是创造新局面，获得不断胜利的保障。

二是认真注意调查研究。指挥员的智慧和正确决策，来源于对敌情、地形和群众情况的周密调查，精心研究。当时红军的技术装备十分简陋，六军团入黔时，连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图也没有；进入藏区时，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紧紧依靠群众，依靠当地向导，向群众调查，找向导谈话，从中汲取智慧。另外，就是利用仅有的电台。部队宿营时，任弼时经常和报务人员一起，了解分析电讯，他还关照报务人员，设立侦察电台，详细收抄敌人的电码，亲自和报务人员一起破译敌码。板栗园战斗时，由于破译了敌码，准确掌握了敌情，因此他敢于命令部队向敌纵深楔入，提前在敌必经之地设伏，由于掌握了先机之利，奇兵突击取得了胜利。

三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长征途中，任弼时军务、政务十分繁忙，生活又十分紧张艰苦，但他仍坚持经常做总结。既有战略阶段的总结，又有具体战役战斗的总结；既

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利的教训。他亲手写下的《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等文稿,就是他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戎马倥偬中亲手记录下来的不可多得的文献。

四是对同志对下属关怀体贴,言传身教。任弼时平易近人,待人以诚,每逢下级的向他报告工作时,他总是认真倾听,不轻易打断,直到对方把话讲完,才言简意赅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律己严格,待人宽厚,即使部属工作中有问题,只要对方工作态度是勤恳的,他总是宽容谅解。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地区时,任弼时通知何辉把一支由游散武装收编成的抗日联军带出来一起北上,但这支队伍的司令对何辉说:请转告贺老总,我们对不起他,后会有期。何辉心情紧张地回到指挥部,准备接受处分,但任弼时没有责备,只是说:还算好,没有把你收拾了,连武器都没有被下走。贺龙说:给了多少光洋,人还是跑了。要不是政策,该收拾他们。任弼时说:人家不是说对不起老总么,就算交个朋友吧,来日方长!

在二方面军中,在长征沿途群众中,关于任弼时的故事留传很多,比如他在行军中打着摆子,却把马匹让给别人骑;他拄着拐棍过草地,在飘动的篝火前给战士们讲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他规定给电台的报务人员发夜餐费,但他自己和他的爱人陈琼英译电到深夜,却从不领取夜餐费,等等。

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

长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战斗对象、战斗方式和五十年前红军长征时不同了，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伟大长征中的光辉业绩，他们的革命精神，革命风格，革命传统，永远是我们新的长征中需要继承发扬的。

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 办事处的成立及其活动

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未能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进行长征。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简称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坚持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群众，同侵占苏区的敌人斗争了五个多月，直到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才根据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指示，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红军部队突出重围，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在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中，他们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近二十万军队，为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突围转移、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作出了贡献。

(一)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长征出发前决定成立的。中央分局以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邓子恢、瞿秋白、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书记项英，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瞿秋白。李才莲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后叛变)。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设机构与主力红军长征前中央政府所设的机构一样，到十一月以后，才作了调整，如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和红军供给部合并，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军区是中革军委于十月二十二日决定成立的，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破坏部、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秘书处，史犹生任组织部长，李翔吾任宣传部长，袁血卒任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林中伯任秘书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下设两个科：作战科，科长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严重。中央军区还设有卫生部，部长王立中。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于十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在瑞金梅坑宣布成立。中央军区则是在于都宽田成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原驻在瑞金梅坑，十月中旬末迁到了于都宽田的石含村和龙泉村，同年十二月底又迁到于都黄龙(今黄麟乡)井塘村。

除决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外，

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是博古）还决定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高级干部名单。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委、省苏机关留在中央苏区的人员，事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留人的原则，属于省委、省苏机关的干部，由各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党中央机关、政府、共青团、工会等单位的干部，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批准；红军部队留人，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决定报中央批准。

在军事力量方面，留下了红二十四师（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全师约二千人枪）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此外，还有江西军区红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独立六团和军区教导营，杨赣军分区独立十三团，福建军区的独立八团、九团，闽赣军区的独立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团和各县独立营（团）、保卫队等，人数共约三万。

中央规定中央分局除领导中央苏区外，同时领导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和闽北苏区的游击战争。行动方针和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在湘西取得胜利后回师反攻，然后恢复和发展苏区。为此，中革军委于十月间发出了长达二万六千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苏区游击队的组织、任务、游击战术、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中

央当时还规定，必须等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了湖南以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下午，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等部门组成），分别从瑞金的梅坑、九堡等地出发，向于都集结。十月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八万七千人，胜利地突破了粤敌设在信丰、安远间及王母渡一带的第一道封锁线，向湖南方向前进。

中央机关离开九堡、梅坑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采取了有力措施，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红二十四师奉命在长汀之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所属独立团阻击北路之敌前进。十月十六日独立三团赶到兴国南部接替五军团防务，与独立十三团一起，阻击兴国之敌；独立七团阻滞石城之敌；以赣南独立六团配备一部分工作人员随红军主力后跟进，保证红军主力在突围转移时的伤病员安置和后方运输工作，并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恢复和发展赣粤边广大区域的工作。同时，严格保守秘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都被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仍然保持原来的名称；被留下来的各

部门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的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仍照旧执行。《红色中华》报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是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对外也没有公开宣布成立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敌人。至十月底，北路敌人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到十一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仍在中央苏区。蒋介石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彻底弄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

十月下旬，敌人得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转移，便加紧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当时，北路、西路、东路的敌人，除薛岳、周浑元纵队调去追击主力红军，南路粤军撤退到广东边境外，大部分兵力仍留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从北、东、西三面向中央苏区紧缩。敌人进攻的步骤和手段是：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各个城市和交通要点。十月十四日，北路敌第六路军第八纵队侵占兴国县城；十月二十六日，北路敌第三路军侵占宁都县城；十一月一日，东路敌第九、十师侵占长汀县城；十一月十日，东路敌第十师侵占瑞金县城；十一月十七日，北路敌七十九师侵占于都县城；十一月二十三日，东路敌李玉堂部侵占会昌县城。福建的宁化、清流、归化等县城也相继失守。敌人侵占这些县城及交通要道后，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中央苏区截成几大块，然后在每大块内又构筑纵横的封锁线，企图将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围困在狭小地区内，实行瓮中捉鳖，进而分区“清剿”，消灭苏区。敌人在政治上制造“红军逃跑，已

被消灭”的谣言，妄图削弱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同时，敌人每侵占一地，就大肆烧杀、抢掠，网罗豪绅地主，组织“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反动武装，建立保甲制度，并诱迫不坚定的分子办理“自首自新”手续。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为“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以期待野战军到达湘西以后，争取胜利的开展，以便配合野战军进行反攻”^①，中央分局放弃了阵地防御战术，转为运动战。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东路第三师孤军冒进，趾高气扬地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集结在瑞金九堡的红二十四师指战员纷纷请战。中央分局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瑞金谢坊的湾塘岗埋伏，并命令瑞金和会昌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制，福建军区所属独立团在瑞金河(绵水)东岸阻击牵制敌人增援。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猛攻。战斗结果，歼灭敌人半个旅，击溃半个旅，取得了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战斗的第一个大胜利。这次战斗，使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敌人从此由急进改为缓进，延缓了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步伐。但是，这次战斗也暴露了红军主力，促使敌人对中央苏区更严密地进行包围分割。

为了坚持“三角地区”的斗争，等待时机“配合野战军进行反攻”，十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原西江、瑞金、于都三县划出九个区，以中央分局驻地宽田为中心，设立了瑞西县，调原西江县委书记马德明任瑞西县委书记。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瑞西县直属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十一月间，又成立了中共信康赣雄临时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同年十二月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由原在赣粤边地区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原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原少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新潮（刘建华）任少共赣粤边特委书记。中央分局要求赣粤边特委充分利用广东军阀撤退后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赣粤边地区斗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并与湘赣边、湘粤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联系，为今后主力红军胜利反攻、恢复中央苏区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舆论宣传，以增强苏区军民的斗志。《红色中华》改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报，继续出刊。教育部设立艺术局，由原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任局长。艺术局将中央工农剧社分成三个剧团，巡回前线 and 红军医院以及农村去，演出《牺牲》、《女英雄》等鼓舞苏区军民“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的节目。对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加强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布告》，其内容就是鼓动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各地还组织火线喊话队，向敌人喊话宣传。中央分局委员李才莲亲自到火线上向敌人喊话。中央分局还在中央苏区内部开展了反对退却逃跑和失败主义的斗争。闽浙赣（赣东北）省委书记曾洪易在随红十军团北上开赴皖浙边途中，面对敌人的

进攻，由恐慌而至动摇，散布悲观失败论调。中央分局得到红十军团电报后，立即领导开展反“洪易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曾洪易的闽浙赣省委书记职务，并将中央分局的决议用无线电传达到赣东北、闽北、闽西及中央苏区各省。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阻止敌人向“三角地区”进攻，也没有破坏敌人构筑的堡垒封锁线。主力红军到了湖南以后，并没有象原来设想的那样打几个大胜仗，反而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受到重大损失。到了十二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北面敌第三路军已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将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及两个独立团（另两个团已由曾山率领转移到东固一带）围困在宁都小布一带狭小地区内。南面，广东军阀余汉谋部四个师，已由广东边境回防，在赣州、信丰、安远、会昌一线驻有重兵。中央分局坚持的“三角地区”，南北长仅百里东西宽仅六、七十里，敌人在这一地区周围，至少部署有十二个师的重兵。他们即将对这一狭小地区进行“清剿”。

面对上述严重形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召开了会议。会上，陈毅等同志提出，应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有力措施粉碎敌人的“清剿”。项英这时也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接受了陈毅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会后，中央分局立即在苏区军民中，公开地、深入地宣传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重大意义，与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和任务。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区

政治部编写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发给排以上干部学习讨论。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印发了供红军部队和游击队用的政治课教材——《巩固我们的部队》，动员和号召部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决粉碎敌人的“清剿”。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分局召开了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粉碎敌人“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八条措施：一、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二、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三、进行坚壁清野，准备持久战斗；四、镇压反革命；五、开展反叛徒斗争；六、加紧被占领区工作；七、瓦解白军工作；八、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派出了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十二月底，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资格，回到（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将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闽赣省，任省委书记；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从中央分局调赣南省，任省委书记；土地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成立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任书记；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后又调公略县）；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西地区，成立中共瑞西特委，任书记。并抽调部分武装组成特委独立营；并将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派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

中央分局为加强对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和领导，要求“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部队……独立营扩大到四百至五百

人，区游击队扩大到一百至一百五十人”^①，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来抵制与吸引敌人”，以“迷惑敌人，疲惫敌人，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②。通过举办游击训练班，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水平也有所提高。中央分局还布置在各被占领区“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县区党组织都应有专人管理被占区工作”，建立若干条通往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线。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还认真组织各地群众搞好坚壁清野。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央苏区将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多余机械设备，隐蔽埋藏在瑞西县宽田上堡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又指定专人在会昌白鹅一带隐蔽了一批机器设备。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也开始疏散转移。在农村，群众还将水源破坏，将粮食和做米用的砬、碓、风车等用具分散隐蔽。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七千名伤病员。经过几个月治疗，还有三、四千名未出院。为粉碎敌人“清剿”，保护好伤病员，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将这些伤病员就地安置在于都、瑞西、瑞金、会昌等县群众家中。赣南省和于都、瑞西等县党、政机关，对妥善安置这些伤病员非常重视。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瑞西县委就安置伤病员问题给各区乡写了一封信，要求各区乡做到：“（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洗（衣服）的借衣裳给他换；（四）每三天洗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

① 项英：《目前敌人“清剿”的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

② 项英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电报（1935年1月）。

两次；（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主席支部（书记）参加；（八）每个休养员要（备）一副担架，准备四个人抬，无论任何环境不使伤病员受危险；（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伤病员在群众家中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此外，中央政府办事处还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发布了“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的《紧急命令》，在苏区内部开展了反叛徒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活动，以巩固内部。

然而，中央分局在十二月会议后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只是在战略指导上的局部转变，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仍然留在“三角地区”周围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没有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仍然是苏区时代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进攻驻宁（都）瑞（金）边洋陂敌六十七师一个团，以图阻止敌人构筑碉堡。经过两天一晚激战，不仅未破坏敌人的堡垒封锁线，红二十四师反而伤亡四百余人。一月二十八日，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共五个团五千余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驻守牛岭（赣县属）的粤敌第二师一个营。由于部队布置失当，未按战斗队形展开，在激战中红军被敌人冲垮（敌人包括增援部队仅四个营），伤亡达五、六百人之多，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亦负伤。这次战斗的失败，使中央苏区红军部队的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这时，敌人加紧对苏区进行分区“清剿”。于（都）会（昌）河两头的敌人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及红军主力，封

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之间的狭小地区内，一举而消灭之。而赣南省机关部队，也被余汉谋部三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中央苏区的物资供给和财政越来越困难，粮食只够吃到三月中旬，经费只能维持到二月间，弹药也供应不上。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苏区的电报联系已中断。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二千余人，已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遭到失败。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部队如不迅速突围，亦可能遭到全军覆没。

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从中央苏区突围。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的井塘村召开会议，就如何突围的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一带另图发展；另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项英只好在二月四日、五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请示，要求中央决定。

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接到项英的电报后，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并作出了决议。二月五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

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告知项英“决议详情续告”^①。由于敌情紧急，为不致被敌封锁在于会河北岸，中央分局决定不等中央关于“决议详情”的电报，先行转移到于都南部。于是，项英、陈毅等先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张亮五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于二月上旬末离开分局驻地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长汀转移。随后，项英、陈毅、贺昌等也率众离开井塘村，向于都南部转移。

在于南禾丰地区，中央分局接到了中央书记处于二月十三日签发的关于中央苏区斗争“决议详情”的电报。中央的决议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韧）的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对中央苏区在游击战争中应该采取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决议作了详细指示，指出：“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

^①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

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斗”。“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接到中央的这一决议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部队突围作出了部署。二月十九日，项英拍电报给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决议的情况。二月二十一日，项英再次用电报向朱德、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二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军区，对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部队及地方干部的分散突围，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再次作了具体部署。根据中央指示，项英、陈毅等对分散突围人员作了个别调整，然后率领分局、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少数人员，从于南禾丰地区转移到上坪山区。二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军区，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项英、陈毅等同志得知遵义会议批判了中央在军事领导上单纯防御的错误，异常兴奋，增强了坚持斗争的胜利

信心。

(三)

被围困在中央苏区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从二月中旬开始，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围。突围情况如下：

赣南省苏副主席王孚善，率领“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挺进营四百余人，于二月中旬离开于南禾丰地区，经会昌、安远边界向寻邬方向突围。二月十九日在安、寻交界之分水垭，遭粤军独四师一个团截击，队伍被打散，王孚善突围至广东梅县地区（后下落不明）。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四个连，于二月底突围到达闽西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后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山等地，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四月到达永定，与张鼎丞、邓子恢会合。接着，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

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任务是到寻邬南部和蕉岭、平远、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李天柱和孙发力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任务是依靠寻邬南部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从于都南部出发，插过安（远）会（昌）边界，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安、寻间的清溪一带，遇粤敌独四师堵击。部队与敌激战三日，损失重大，汪金祥、李天柱等率所剩二、三十人突出重围，月底到达寻邬南部。

龚楚（兼红七十一团团长）、石衡中（红七十一团政委）、史犹生率领的红七十一团，任务是到湘南，收容红二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湘南发展游击区。他们从于都南部出发，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地区，被粤敌余汉谋部第二师发觉。敌派教导团两个营随后追击，并派一个营经万隆、罗塘出崇仙堵截。二十五日，红七十一团与追堵之敌在极富地区激战后，突围至油山地区，后即转至湘南（龚楚后来叛变投敌）。

徐洪（独立三团团长）、张凯（独立三团政委）率领的独立三团，任务是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传达中央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从于都南部小溪地区出发，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桃江王母渡渡河。部队刚渡过一半，即被敌人发觉，截为两半。张凯率余部约六七百人，在杨雅附近与堵击之敌激战后，即根据项英的命令，转回于都南部，再沿安远、信丰边界向信丰南部突围。三月四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遇敌堵击，折而向安远冈头前进，再次被粤军独四师截击、封锁。三月上旬末，张凯和随同独三团一起突围的原江西省苏副主席陈正人，率一百余人到达安远，寻邬南部山区，在此与周建屏、李天柱等会合。独三团团团长徐洪在突围途中牺牲。三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的原粤赣省苏政府副主席罗屏汉，率游击队六、七十人来到安、寻地区，与张凯等会合。五月间，陈正人、周建屏离开寻邬南部，由汕头转赴香港。李天柱在此期间牺牲。

毛泽覃率一个连的突围部队，任务是到闽赣边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

省委万永诚等会合。四月二十六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地区英勇牺牲。

李才莲率领独立七团，任务是到闽赣省和博生(宁都)县北部，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于二月下旬开始从瑞金铜钵山区出发突围，行至九堡与敌激战，独立七团被打散。李才莲率剩下的部队转移至闽赣边，因情况变化，未与闽赣省委取得联系，只好回到瑞金铜钵山区，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等会合。赖昌祚、李才莲率瑞西独立营一部，在瑞金观音岫一带活动，后来被敌人包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李才莲壮烈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在汀瑞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冬，赖昌祚在瑞金壬田罗汉岩英勇牺牲。

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率领独立六团及省委、省苏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二千余人，按原定计划，在于都南部禾丰、黎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三月上旬，他们根据敌情变化，决定部队和机关突围到三南(定南、龙南、全南)与信丰活动。三月三日，全体突围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发了生活费。四日早，三个支队成一路纵队，从于都南部的上坪山区出发。上午十时许，蔡会文和阮啸仙发现部队集中成一路纵队行进，立即命令改变队形，“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①。但是，为时已晚，部队来不及分散，即在畚岭(原登贤县属，现于都县祁禄山乡)的罗坑、金沙

^① 蔡会文、阮啸仙：《突围命令》(1935年3月4日)。

一带与敌遭遇，激战数小时，突围部队被敌冲散。三月五日和六日两天，驻牛岭和驻仁风粤军各一团，在“铲共团”的带领下，将畚岭地区封锁。畚岭地区山高林密，除仅有的几条林间小道通往安远、信丰外，其他地方难以穿越通行。被打散后再度集中起来的一、三支队，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指挥，与堵截的敌人激战，遭受重大伤亡。三月七日凌晨，刘伯坚在鸭婆坑（安远、于都交界处一高山村子，属安远塘村）附近山头指挥部队突围受伤，不幸被俘。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会昌县贸易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不幸受伤被俘。刘伯坚、廖昔昆等五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在大余被粤敌第一军（余汉谋部）杀害。梁柏台在突围中受伤，亦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余（梁柏台的牺牲地点待查）。其余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少数突出重围。第二支队大部在蔡会文、阮啸仙和陈丕显（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率领下，于三月六日冲破敌马岭、牛岭间的封锁线。突围中，阮啸仙在上小埂（信丰属）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蔡会文、陈丕显继续率领突围部队到达信丰安息一带，在此又与粤军第二师激战。随后，他们转向定南，再转至信丰，于四月上旬到达油山。

三月上旬末，各路突围部队全部离开于南地区。项英、陈毅、贺昌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率领红七十团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红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进行整编，共编为四个大队（红七十团番号同时取消）。贺昌、周建屏、杨英编在第三大队，周建屏

任大队长，李翔吾、袁血卒编在第四大队，袁血卒任大队长^①，担任掩护任务。项英、陈毅等编在另外的两个大队。三月九日下午三时许，贺昌带领第三大队，从于南上坪的一座高山出发，先行突围。袁血卒率第四大队随后跟进掩护。当晚，他们安全渡过濂江（安远河），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遇北路敌第八十九师阻击。第四大队在掩护战斗中大部分牺牲，仅剩袁血卒、唐继章、周子祯等数人突出重围，后辗转到达上海。十日凌晨，在战斗中受伤的贺昌行至归庄（会昌晓龙境内），被敌包围，他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着“红军万岁”的口号，举枪自尽，壮烈殉职。杨英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周建屏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达安远、寻邬南部，与张凯、李天柱、罗屏汉等会合。

当贺昌、周建屏、袁血卒等率领部队出发时，项英正在向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情况。直到下午五时，电报才发完。项英命令将电台埋掉，同陈毅一起率领剩下的两个大队，离开上坪山区，向长汀突围。当晚正在下雨，天黑路滑，他们未能赶上贺昌、周建屏等。此时，安远河水猛涨，敌人已将河两岸严密封锁，突围部队渡河受阻。陈毅只好率部队返回上坪山区。黑夜中，项英带着一部分队伍与陈毅失去了联系，走错道路，来到安远天心圩，遭敌截击，部队被打散。天亮后，项英收集部队也回到上坪山区，与陈毅会合。这时，陈毅认为赣粤边地区有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群众基础好；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特委

^① 据袁血卒回忆，是任大队政委——编者注。

和武装又在这一带活动；加上这一带地形复杂，便于与敌周旋；自己对这一带地理民情也熟悉；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经过这一带，影响较大，而且还有一些掉队失散人员。因此，他向项英建议向赣粤边油山一带突围。此时，他们刚好巧遇曾纪财^①。为缩小目标，减轻部队压力，项英、陈毅安排剩下的部队（一百余人）分散向赣粤边突围，同时将十余名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中隐蔽。他们化装成当地逃难的老百姓，在曾纪财的带领下，从上坪山区出发，在王母渡偷渡桃江，经过近二十天夜行晓宿辗转周折，于四月初到达信丰油山的廖地村，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不久，蔡会文、陈丕显等也与他们会合在一起。

（四）

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同敌人展开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受到了严重挫折，革命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作了错误的布置。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突围转移时犯有错误。他们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斗争的布置上，也犯有错误。他们对于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

^① 曾纪财，江西信丰人。先后任过江西信丰、福建代英县委书记等职。1936年3月，由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区“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①，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具有何种重要的意义，应采取何种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斗争的前途如何等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为了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在一定时间内保守秘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该对党、政、军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保密，尤其不应该对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领导人员保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使得中央苏区军民对红军主力转移后突然到来的严重形势，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因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同时，他们划定宁都、瑞金、会昌、于都四座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必须最后坚守的地区，要求中央分局执行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师反攻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划地为牢”，严重束缚中央苏区军民的手脚，使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面临敌人封锁围困的严重形势时，不能迅速及时跳出“三角地区”，去广泛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的机动性灵活性不能发挥出来。

二、客观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强我弱。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包括中央苏区所属江西、赣南、福建、闽赣省）仍然布置有二十多个正规师的兵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蒋介石又将江西、福建两省划分为十二个绥靖区，限期“分区清剿”。与此同时，敌人每侵占一地，又搜罗地主豪绅、流氓地痞组织“义勇队”、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铲共团”等反动武装，大肆烧杀抢掠，实行保甲连坐的法西斯统治。而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仅有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留下的伤病员归队人员。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虽约有三万人，但战斗力不强。同时，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时，留下一批老弱、病残人员和干部家属，这些人员都要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疏散安置。由于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敌人的封锁，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消耗，补充困难。敌我力量对比，显然是敌强我弱。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前，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错误领导下，尚且不能“保卫”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后，要“保卫”住中央苏区，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三、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没有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采取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

项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中央苏区的困难时刻，顾全大局，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和陈毅等同志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打击了进犯苏区的敌人。遵义会议后，他又坚决执行了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指示，组织和领导机关部队从中央苏区突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后来又在赣粤边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他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这些都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他身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红军主

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对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作了空洞乐观的错误估计，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不切实际地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在湘西的胜利上面，因而没有及时地将部队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将苏区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与游击战争相适应的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左”的错误。应该说，这也是导致中央苏区斗争严重受挫的原因之一。

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中央苏区军民所进行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业绩永垂青史。

(凌步机执笔)

国统区妇女 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妇女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日民族战争阶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号召：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党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由邓颖超、孟庆树等组成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同时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简称陕甘宁边区妇联）常驻武汉。长江局撤销后，一九三九年初，党又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南方局的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南方局成员邓颖超负责。后来，南方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下设妇女工作组（简称妇女组），邓颖超兼任组长，张晓梅任付组长。长江局妇委和南方局妇女组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发展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工作的指导

方针，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前，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为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日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被誉为是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一）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是一九三四年在南昌成立的，后迁南京。蒋介石建立这个组织提倡“新生活运动”，原是为了反对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三六年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任指导长。

一九三八年，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宋美龄以她个人的名义，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庐山召开了一个妇女谈话会。邀请了各党派、各界、各地妇女知名人士共四十八人参加，其中中共方面有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有沈慧莲、唐国禛、陈逸云、庄静等，救国会方面有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基督教女青年会方面有张蔼真、邓裕志、陈纪彝、刘玉霞，还有社会名流学者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曾葆荪、劳君展等。庐山妇女谈话会上，宋美龄提出以新运妇指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过酝酿，到会人士同意宋美龄这个意见，但建议对新运妇指会加以改组扩大，以适应战时妇女工作的需要。中共方面代表邓颖超、孟庆树在会上联合发言，除作了《关于陕甘

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外，还着重讲了《我们对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全面阐述了中共对战时妇女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中心任务。关于建立全国性的妇女组织问题，她们强调指出：这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不管名称如何，应是代表包括各界、各党派、各省、各地区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组织。它的产生，要采取民主方式，可以由现有的各妇女团体的代表和各界妇女先进人士共同筹备，然后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领导机构。当时她们考虑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间紧迫，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确有困难，但开展抗日工作又刻不容缓，因此赞同以新运妇指会为全国妇女统一机构。但必须切实加以改组扩大，加强民主协商，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妇女参加这个机构，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从事抗日建国工作。

会议还拟定和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沈兹九被推选为起草人，邓颖超参加了定稿工作。这是一个动员全国妇女团结抗战的共同纲领。绪言中说：“占国民半数的妇女，极应赶快制定具体的动员方案，有计划地组织起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这种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而要动员全国妇女，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并联合其他原有的妇女团体，分工合作，以便增加抗战建国的效率。”大纲提出了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是：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汉奸及从事工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这个大纲基本符合我党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妇女界联合抗日的政治思想

基础，对改组、扩大后的新运妇指会的工作起了指导、推动和约束作用。

改组扩大后的新运妇指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在汉口正式组成。它改变了这个组织原来的宗旨和任务，形成了新的阵营，有了新的工作内容。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李德全进入了常委会，委员由原来的七名增加到三十六名，其中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新运妇指会分设八个组和一个委员会。由国民党方面担任工作的有：慰劳组组长唐国禛，战地服务组组长陈逸云，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其中唐、陈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救国会方面的有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训练组组长刘清扬，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无党派人士俞庆棠担任生产事业组组长。天主教徒纽珉华担任儿童保育组组长（后由陈纪彝担任）。总务组由谢兰郁担任组长。这些人选的安排是庐山妇女谈话会后，各方面代表共同酝酿、协商确定的。

联络委员会和八个组大都是新建立的，都需要增添和安排工作人员。邓颖超和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对人选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首先选拔了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有群众基础、有斗争经验和政治修养又有一定学历的同志，如上海妇女救国会骨干陆慧年、北平“一二·九”运动骨干郭见恩（郭建）、原在上海后去广州的知名妇女工作者罗叔章、王汝琪等（她们都是中共党员），分别配备到联络委员会、训练组、文化事业组担任

股长或训练班教导主任等职。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又先后在各部门调进了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如联络委员会有左岫泉、余梅青、树扬（戈扬）、杜子明，训练组有李植青、张韵之、刘英京等，文化事业组有罗琼、夏英喆、魏郁（何文）、郑还因（郑炜）、徐培影等。国民党员黄佩兰领导的生活指导组绝大部分也是爱国青年，还有个别是中央党员。儿童保育组的付组长是中共党员徐镜平，这个组的进步力量也占了主导地位。一些下属单位，如训练组办的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及由训练班学员组成的几十个战时乡村服务队，儿童保育组下属的十几个保育院，生活指导组下属的几个工厂服务队，文化事业组办的女工学校、生产事业组办的生产事业单位等，都有很多爱国进步青年和一些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新运妇指会先后在广东、湖南、河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建立了分会。它们的名称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某某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新运妇工会。这些组织里也有中共党员和进步力量，如广东省新运妇工会，是邓颖超推荐。区白霜（区梦觉）协助国民党省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建立的；河南省新运妇工会，由中共党员郭霁云和当时中共河南省委妇委书记吴应先（吴平）协助当地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夫人朱韵珩组织起来的；广西新运妇工会，由中共党员李应芬等协助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成立的，直到一九四三年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先后还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该会工作。

新运妇指会还在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院、会建立了新

运妇女工作队。在这些妇女工作队中也有一部分进步力量、如军政部妇工队一度曾由爱国进步人士郑英担任实际领导工作，重庆市政府的新运妇工队，是由爱国进步人士倪斐君领导的。

(二)

在新运妇指会中、联络委员会、训练组和文化事业组是进步力量的核心。

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是以新运妇指会的名义组织、发动和统一领导妇女界的抗战活动。它横向联络在武汉，重庆的各妇女团体、纵向联络各省新运妇工会和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院、会的新运妇工队，并且可以新运妇指会的名义对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各项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

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自三十年代初就和中共上海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和中国共产党一直紧密合作，并肩战斗；她在社会上和妇女界有相当高的威望，同宋氏三姊妹也有较好的关系；她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这使得她领导下的联络委员会在新运妇指会中发挥了承上启下、团结各界妇女、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等重要作用，成为新运妇指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联络委员会经常召开各妇女团体的联席会议。这是采纳了邓颖超、孟庆树在庐山谈话会上的建议，从武汉开始实行到重庆便作为固定形式保留下来。通过联席会议邀集各妇女团体研讨和布置工作。在这些妇女团体中，有不少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的进

步组织，如《妇女生活》社（沈兹九任主编，党员寄洪为专职编辑）、难民妇女服务团（由倪斐君、黄静文、胡绣枫、张启凡等组织领导，胡、黄均为中共党员）、重庆妇女慰劳分会（由中共党员陈奇雪、陈玉和、周健负责）、回民救国协会妇女组（由中共党员温式一领导）等。以邓颖超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也参加联席会议。代表团团员是卢竞如、廖似光、张晓梅和张玉琴，她们在联席会议上不仅行使合法的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各方人士接触，这样就使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开合法的统战工作阵地。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南方局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都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及时传达到各个妇女团体中去。因此，联席会议实际上起着比新运妇指会本身更为广阔的作用。

训练组的任务主要是办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为组织和训练广大妇女群众，培养建立一支妇女青年干部队伍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〇年，训练组共举办了五期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近千人，学员有小学教师、社会青年、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军委战干团的女生。其中高级妇女干部训练班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和省市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保送来的人，其中也有少数中共党员和公开招考的。课程设置理论课有：“三民主义研究”、“抗战建国纲领”、“论持久战”、“新生活运动要义”等，业务课有：“救护常识”、“农村服务”、“妇女组训”等。第一期训练班，周恩来同志被邀请去作过题为“抗战何以必胜”的讲演、张爱萍同志去讲过“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邓颖超、阎宝航、

戴白韬、钱俊瑞、陶行知、张友渔、黄薇等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也曾先后在各期训练班受聘讲课。

各期学员结业后，训练组征得妇指会领导同意，除高干班学员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要先到农村去实习，编成战时乡村服务队，分别到各县、区、乡、镇做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少数分到生活指导组所属的工厂服务队及慰劳组所属的伤兵服务队工作。乡村服务队仍归训练组领导，直到一九四〇年妇指会增设了战时乡村服务组，由谢伟鹏担任组长。分到乡村服务队的学员，曾先后到湖北四个县、湖南十个县和四川五十六个县下乡服务：宣传团结抗日，动员、训练、组织妇女参加慰劳驻军、抗属、扶助伤兵、抢救被日本飞机轰炸受伤的群众、难童等抗日工作；开展识字、扫盲、唱歌、演剧等文化活动及举办生产事业等。她们到了乡镇后，使一向沉寂的乡镇不同程度地掀起了抗日群众运动的热潮。许多学员为抗战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一部份还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文化事业组主要是根据庐山谈话会制订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向广大妇女进行团结抗日、妇女解放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方法多种多样，如：出版刊物、丛书，编写宣传提纲和资料，开办女工学校、妇女问题研究班，进行社会调查和开展妇女文学作品的征集、评奖等。在武汉时期，文化组把工作重点放在办女工学校上，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由担任股长的罗叔章负责，有大批大、中学生、教师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参加在武汉的工厂区办了廿几所女工学校，教员大部分是爱国进步青年、

其中有中共党员陈光宇、林袁（林立）等。学校以坚持进行抗日救国，提高女工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觉悟的政治教育为主，附带学习文化。武汉撤退前，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不能让我们的工业落入敌手。罗叔章等同志通过女工学校动员了两千多名女工迁往内地，从而保存了我国民族工业的部分生产力和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在撤退中有二十多名女工要求去了延安。

在重庆时期，文化事业组的工作重点放在办好妇女刊物上。由党员夏英喆负责编辑的《妇女新运通讯》半月刊，主要面向新运妇指会的乡村、工厂服务队员和妇女团体成员，刊载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的论述，并推荐一些进步书目，从理论思想上武装妇女工作者。由郑还因编的《新运妇女》月刊，主要是介绍妇指会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由魏郁负责编辑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付刊的《妇女新运》周刊是个很难编的刊物，既不能太进步，又不能宣传反动思想，主要只能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编发文章。上述刊物都是以新运妇指会的名义编辑出版的，邓颖超等曾为其撰文。此外，由党员徐培影编辑的壁报资料，内容充实，图文并茂，专供乡村、工厂、伤兵服务队和各妇女团体出壁报用，传播广泛，起了正式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

新运妇指会的其他各组也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儿童保育组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先后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陈纪彝、纽珉华、熊芷兼任组长，由其常务理事徐镜平任保育股长。但保育会仍保持其独立性、它共有十四个分会，至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

三月结束工作止，全国先后建立了五十三个保育院，抢救抚育了二万九千多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童。保育会每月开例会一次，凡属保育会方面的重要事项，均由该会常务理事会商议决定。在抢救儿童和创办儿童保育院的工作中，中共党员曹孟君、徐镜平、罗叔章、杜子明、冯光灌（她是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期间入党的）等都率先亲临战区，在军队和群众已经撤离的街头巷尾、抢救被遗下的难童，并排除千难万险，把他们护送到大后方或较安全的地带。在各保育院中，有一批成绩卓著的优秀院长是共产党员。如武汉临时第一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先后任重庆万寿宫临时保育院和泸州第七保育院院长的杜君慧、先后任重庆歌乐山保育院院长的曹孟君、刘尊一，保育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罗叔章、杜贵文，第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等。还有被尊为“伤兵之母”的蒋鉴，也是优秀院长之一。在她们和广大保育工作者的精心培养下，不少当年的保育生，全国解放后当了国家干部，成为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生活指导组及其所属的工厂服务队、北碚妇女生活改善实验区等，也都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其中工作。如生活指导组的股长由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左诵芬担任。工厂服务队和试验区等单位的队长、指导员大多数是进步力量，其中有党员李冰洁、沈纪云、胡文经、姚汝安、丁洁如、刘肃宴等。她们分别在几个工厂服务队中，办女工识字班，成立救护队、歌咏队、话剧团等；还在厂内进行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此外，还帮助女工向厂方争取改善

生活的合理斗争。

我党和进步人士还积极参加了慰劳组主持的募捐、慰劳伤兵、慰问军属等活动，宣传坚持抗战，提高士气。仅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重庆举行的妇女献金会一次就获得了六十三万多元的成绩。邓颖超曾到医院参加慰问伤兵的活动。

生产事业组的组长先后由社会知名人士俞庆棠、张惠文担任，也有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参加该组工作。生产事业组在四川建立了乐山蚕丝试验区、松溉纺织试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等生产事业单位，这样既能提供部份军需用品，又解决了部分抗属和难民的就业问题，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共有几万人。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加紧迫害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不少人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在南方局领导下妇女组帮助她们先后从新运妇指会撤离。但仍留下个别没有暴露的党员如：冯光灌、胡文经等一直坚持工作到上海解放前夕。

(三)

改组扩大后的新运妇指会，在皖南事变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是我党在国统区动员组织各界妇女参加抗日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的胜利。是妇女组邓颖超等同志坚决贯彻、正确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妇女组的工作围绕“为争取千百万妇女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目的，结合当时的特殊环境，始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妇女组十分注意依靠妇指会内的中共党员，团结广泛的进步力量，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在新运妇指会的各个部门，各基层单位以及有关的妇女团体中，都有为数不多但比较精干的党员。这些党员有的是经过邓颖超亲自选定的，有的是由妇女组提出条件由地方党组织推荐的。除个别部门短期成立过党小组外，党组织对这些党员都采取单线领导的方式。因此妇女组同志的工作是十分具体的，也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邓颖超，直接联系领导的党员最多。她亲自找这些党员谈话，交待党的政策和工作任务，对一些嫌做统战工作麻烦，不愿意干的同志，还要进行教育，提高她们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党员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问题时，邓颖超总是亲自找来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处境和政治水平给予具体的、细微的指导和帮助。对党员既十分爱护，又严格要求，使她们能正确地了解党的决议和指示，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邓颖超等妇女组领导人同爱国民主人士、先进妇女领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他们来贯彻党的主张。早在武汉时期，邓颖超等经常邀集少数知名妇女，对如何开展妇女抗日工作交换意见。后来逐渐形成了在妇女界里有影响人物的核心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妇女组领导同志及少

数党员干部外，多数是救国会的人士，主要有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杜君慧、曹孟君、罗叔章、韩幽桐等。这个核心座谈会起着沟通意见，统一思想，加强联系，协调行动的作用。自史良、沈兹九、刘清扬进入新运妇指会以后，妇女核心座谈会推动新运妇指会统战工作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凡是重大政治问题或要在各妇女团体联席会上讨论的问题，大都先在妇女核心座谈会上讨论，集思广益，共同商量。这样就能及时宣传贯彻我党的主张，有力地促进新运妇指会的工作。

妇女核心座谈会的时间不定期，也不拘形式，不同时期参加会的人员也不尽相同，根据讨论问题的需要，有时也吸收新运妇指会中的党员和非党骨干及参加妇女团体联席会议的各进步团体负责人参加。

妇女组邓颖超等还善于通过公开方式和合法斗争，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扩大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一九三七年在庐山妇女谈话会上，邓颖超以陕甘宁边区妇联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对新运妇指会的工作起了强有力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一九三八年，武汉进步妇女团体准备热烈庆祝三八节，但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和特务等多方阻挠、破坏。妇女组领导进步势力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并邀请宋美龄主持这次集会，终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内开了个规模虽小但群众情绪十分热烈的纪念会。会后群众还冒雨举行了游行宣传活动，顽固势力的阴谋并未能完全得逞。

一九三九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是新运妇指会改组、

扩大后的第一个妇女节。南方局妇女组通过新运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发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空前热烈的有各界妇女群众四、五千人参加的纪念活动。三八节那天各机关、工厂、学校妇女都一律休假半天、电影院免费招待妇女。

节日前，联络委员会召开各妇女团体的联席会议，讨论筹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工作，邓颖超在会上讲了话。她讲的主要精神是：当前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将抗战动员切实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去，以打破妇女运动的狭隘范围。提交会议讨论的纪念三八节工作纲要，主要是根据邓颖超的讲话拟定的。虽遭到国民党方面陈逸云、唐国桢等的反对，但终以出席的多数代表赞成获得通过，并决定把这个纲要发到国统区各省新运妇工会等单位中去，以统一纪念活动部署。于是，今年三八节，不但在重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而且在四十多个城市同时举行了纪念会，就连一些农村乡镇、沦陷的孤岛上海及港澳地区，在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也召开了规模不同的纪念会。这次三八节纪念活动宣传动员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一九四〇年的三八节，正值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不久，当时国民党方面提出，纪念三八节要以发动妇女献金为中心任务；我党中央则指示要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声讨汪精卫叛国和促进宪政运动为纪念三八节的中心任务。南方局妇女组根据中央指示，就这个问题先后在党内外进行了讨论酝酿。在作好了准备以后，张晓梅以陕甘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新运妇指会召开的筹备纪念三八节的妇女团体联席会议。在会上她建议各妇女

团体以反汪肃奸、开展宪政运动为纪念三八节的中心内容，对国民党提出的宪金问题也没表示反对。她的建议得到了到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于是，会后重庆、广州、桂林、香港等地，分别举行了三八纪念大会，以反汪肃奸和促进宪政活动为中心内容，同时发动献金活动，仅在重庆一地，就有各界妇女近万人参加纪念大会。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党中央提出开展民主宪政运动，要求早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法，以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专制的反动本质。南方局妇女组根据党的指示，把发动妇女参加宪政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这一运动中，同时还要争取妇女参政的民主权利。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四〇年四月，通过新运妇指会联络委员会，组织重庆各妇女团体联合召开了七次妇女宪政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数每次由一百多人逐渐扩大到三百多人。座谈会分别由史良、刘清扬、罗叔章、韩幽桐等进步人士或中共党员主持，先后讨论了“宪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参政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促进宪政运动和争取妇女参政问题”等。张晓梅、廖似光、曹孟君、胡子婴等都在座谈会上作过发言。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参加了妇女界宪政运动的集会，并在各妇女团体联合举行的女参政员招待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苏联妇女参政的情况。

两次大规模的“三八”纪念活动和妇女宪政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反映了以进步力量为主导的国统区妇女统战工作是和党的斗争任务紧密结合的。

南方局妇女组为团结抗日力量，反对顽固势力，坚持抗日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

邓颖超和爱国进步人士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除经常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保持着密切的个别联系，同她们交心谈心，肝胆相照。当进言时总是以大局为重，直言不讳。邓颖超这种坦荡胸怀，使她们心悦诚服，真心实意拥护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支持党的事业，保护我党同志。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特务搞了一份“共产党危险人物”的黑名单，准备分批逮捕，其中有一部份还要秘密处死。一位党外朋友得到情报后，立即设法转告邓颖超、张晓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妇女组对黑名单上的党与非党干部，逐一研究了转移方案，经过周密安排，在地方党组织和进步朋友的帮助下，使她们安全撤离了妇指会，转移到新的战斗岗位。

妇女组与新运妇指会以及其他妇女团体中的非党进步人士和青年女干部，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广泛接触。邓颖超、张晓梅等不辞辛苦，经常采取各种方式和她们保持联系，关心她们的成长，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困难，注意保护她们的安全，彼此结下了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革命情谊。新运妇指会的一些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以“小姑”这个称呼作为邓颖超的代号，把到曾家岩五十号或到红岩与妇女组同志见面当作“回娘家”。她们中间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

南方局妇女组也十分注意团结、争取新运妇指会中所

有赞成抗日、热心妇女工作的中间人士，包括一些国民党员。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陈纪彝是基督教徒，她们作风比较正派、热心抗日和社会工作、富于实干精神，她们内心对国民党是不满的。妇女组指示党员和进步青年尽力帮助她们搞好工作，如进步青年冯光灌在总干事室任秘书，在党的教育下，工作认真负责，又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受妇指会工作人员和总干事张蔼真本人的赞赏，成了张的得力助手。又如党员徐镜平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真心实意协助组长陈纪彝开展工作，配合默契，也受到陈的欢迎。邓颖超本人还亲自做过张、陈的工作。由于重视对她们的争取团结、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她们对共产党往往能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新运妇指会的中、上层工作人员有不少人逃往台湾。张蔼真没有去台湾而去香港。之行前还叮嘱妇指会中愿留在大陆的原总务组长谢兰郁等工作人员留守，保护财产账目、等待共产党的妇女机构来接管。

妇指会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是国民党员，她爱国、有事业心，重视人才。妇女组对她采取支持、团结的态度，安排了一批爱国青年和少数党员到生活指导组及其所属的工厂服务队工作，和她合作得比较好。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她对进步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曾起到掩护作用。

即使对国民党反共分子唐国桢，党员和进步力量也以大局为重，对她分管的慰劳组的工作，一般采取合作的态度、尽可能地帮助她们开展募捐、慰劳抗日军队、扶助伤兵等工作。

对宋美龄，党也是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抗战初期，根据她表示愿意和各方面人士合作抗日，考虑到她是蒋夫人的身份，认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和她合作推动妇女抗日救国工作，对于发展扩大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是有利的，因此，赞同她继续担任改组、扩大后的新运妇指会的指导长。宋对邓颖超等公开的共产党的代表和妇女界爱国知名人士，如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表示尊重，对新运妇指会所进行的各项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基本是支持的，对进步力量有时在客观上还能起到某些保护作用。但是，基于其阶级立场和家族关系，她对抗日的态度，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态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蒋介石的总体部署。所以妇女组在工作中与进步人士一起，在联合她抗日的同时，对她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行则进行抵制和斗争。如宋美龄曾以优厚待遇为诱饵、企图使沈兹九停办《妇女生活》，被沈坚决拒绝了。陈逸云送给《新运妇女》编辑部一篇工作报告，其中一段有诬蔑：“共产党制造磨擦”的内容，沈兹九在刊登这篇稿子时，删去了这段文字，为此陈逸云到宋美龄面前“告状”。沈兹九理直气壮地申辩：我们遵循的正是在庐山谈话会上通过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的精神，作为编辑的，有权对违反共同纲领的言论进行删节。宋美龄也无可奈何。一九四〇年三月底，宋庆龄自港抵渝，渝市妇女以极高的热情表示欢迎，宋美龄自任欢迎委员会主任，但是她却外热内冷，以保护孙夫人为借口，不许记者采访，不许开群众欢迎大会。由于妇女界强烈要求隆重欢迎孙夫人，宋美

龄迫不得已才同意在嘉陵宾馆举行一次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人，以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的高级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为主，企图由她来左右会场。招待会开始后，东道主宋美龄和宋蔼龄都讲了话，却不安排主宾宋庆龄讲话，当场引起群众极大不满，但宋美龄却装作若无其事，站在凳子上教大家使用西餐刀叉的方法。这样一来，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感。经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的带动，大家高喊：“欢迎孙夫人讲话！”宋美龄出于无奈，只好请孙夫人讲话。宋庆龄在讲话中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指出：她在外国看到许多人也不会用刀叉，因为民生问题没解决。含蓄地批评了宋美龄。

在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强迫妇指会工作人员参加国民党、宋美龄亲自出马，动员史良、沈兹九、刘清扬、郭见恩等参加国民党，声称要吸收她们作特别党员。她们坚决拒绝了，并且当面对宋美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特务政策等。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越来越暴露，新运妇指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妇女组高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旗帜，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同国民党顽固势力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妇指会中顽固势力的代表之一是陈逸云。陈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三青团负责人之一，在新运妇指会任战地服务组长，但她根本没有组织过什么战地服务队，也从未领导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而她的主要活动

是同会内外国民党顽固势力一起，反对新运妇指会的进步势力，破坏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她在联络委员会召开的妇女团体联席会上经常和进步人士唱反调。在文化事业组主办的各种刊物上，她千方百计企图塞进反共言论。她对进步人士进行监视、造谣诬蔑，常到宋美龄那里“告状”，以排斥打击进步人士。

陈逸云还勾结国民党顽固势力，阴谋控制妇指会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她有计划成批调派三青团员和革委会战干团学员到训练班受训，并向训练班派遣特务，妄图发展特务组织。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阴谋、妇女组强调指出：在训练班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关键问题在于争取青年，因此，在课程安排，聘请教员，组织辅导学员学习等方面，决不放弃领导；而对三青团员和军委战干团的学员则不应歧视，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热情抗日的，所以对她们必须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至于对个别特务，则发动学员予以揭露，并公开批判国民党利用特务镇压群众的政策。事实证明妇女组的指示是正确的，这些学员后来分配到战时乡村服务队后，大多数能刻苦耐劳、勤奋工作，在宣传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如：三期训练班的战干团女生蒋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

武汉失守后，新运妇指会迁往重庆，第一、二期训练班学员编成乡村服务队则撤退到湖南，宋美龄指定由刘清扬，陈逸云共同负责领导。一九三九年夏，陈逸云趁刘清扬去重庆工作之机，在服务队中肆无忌惮地造谣中伤，挑

拨离间，制造分裂，压制破坏服务队的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时，由于当时物资条件差，队员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陈逸云等漠不关心，不予解决，因而，引起队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思想波动。有人要求离队，有人不告而别，造成服务队大量减员。一九三九年冬这批服务队调回重庆，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中共党员团结进步力量，对陈逸云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大量揭发。由于有切身感受，她们发言时甚至声泪俱下，形成了对陈的控诉。这完全出乎陈的意料，感到下不了台，不久她只好辞职离开了妇指会，她的阴谋，终于彻底失败了。

我党通过新运妇指会开展的活动，扩大了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为抗战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为开展妇女统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皖南事变以后，进步力量大部分撤出了新运妇指会。南方局妇女组又开辟了新的阵地，继续开展妇女统战工作。这期间，除通过一九四〇年春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及其他进步妇女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外，还先后创办了《现代妇女》、《职业妇女》等杂志，作为宣传阵地，并组织了许多小型的妇女读书会和座谈会。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和在抗战前夕的民主运动高潮中，成立了中国妇女联合会，并先后在各地建立了分会。南方局妇女组通过这些组织更广泛深入地团结了各界妇女，扩大了统一战线。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迎接全国解放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西北解放战争大事记

吴序光

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日 日本政府要求投降。

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抗战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飞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十月十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一日，毛泽东回到延安。

九月二日 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十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张垣绥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驻扎安边、宁条梁地区的新编第十一旅宣布起义，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仍称新编第十一旅。

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三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

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日 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连同五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三十一日闭幕。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四月 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教导第一旅和教导第二旅全编为教导旅，第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全区有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和新编第十一旅共五个旅，二万八千余人。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

六月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起来，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

六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我军实行突围。从此全面内战爆发。中原突围部队以后创建了陕南和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七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

七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等，询问能否攻取汾城、襄陵、稷山等八县及建立根据地，牵制胡宗南部兵力。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日 为接应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警一旅、警三旅和新四旅等三个旅出击陇东，八月二十九日在屯子镇与三五九旅胜利会师。出击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后，于九月二日撤回原防区。三五九旅转山西归晋绥军区建制。

九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十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 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乘南线胡宗南集团主力进行休整之时，为反击北线邓宝珊部的袭扰，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总指挥部和二十二军各一部的起义，发起了榆（林）横（山）战役。解放了十二万人口、五千平方公里的地区。起义部队两千一百多人改编为骑兵第六师。

十月十九日 中央军委致电贺龙、李井泉等，指出胡宗南部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此阴谋，积极发展吕梁山区，造成威胁关中，开辟黄龙山，保卫延安之有利条件。令张宗逊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向延安。

十月二十一日 中央军委致电太岳部队陈赓、谢富治，望晋南地方兵团在三角地区加紧活动，寻机消灭胡宗南分散之小部队，牵制推迟其进攻延安。

十一月上旬 蒋介石在宜川，洛川地区集结十个旅的兵力，准备偷袭延安。

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召集干部大会，动员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军民加强战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边区南线检查防务返回延安后对记者说：此次保卫边区、保卫延安，我军是必胜的。号召边区人民做好坚壁清野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 粉碎敌军偷袭延安计划。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和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在晋西南发动强大攻势，歼敌五千多人，迫使胡宗南之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撤返黄河以东。随后在大宁、蒲城地区歼敌四千余人，从而粉碎了胡宗南集团与马鸿逵集团相互配合偷袭延安的计划。

十二月一日 晋绥军区张宗逊、廖汉生领导的第一纵队（辖

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王震领导的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和独立第四旅)组成。

十二月十六日 党中央派彭德怀、习仲勋到山西省离石县高家沟,召开陕甘宁与晋绥军区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两大解放区联防和配合作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

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解放区插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胡宗南为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集中四个旅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进犯我关中分区。我驻防部队掩护党、政机关于二月十七日主动撤离。

一九四七年

二月十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署命令,成立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纵队、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共二万八千余人。

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分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布署,对我边区主力保卫延安作了部署。

三月二日 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根据敌之调度,进攻延安之战可能在三月七、八日开始。指示电提出了保卫延安的几个作战方案供考虑。

三月二日至五日 西华池战斗。二月二十八日,胡宗南以五个旅进犯我陇东分区,三月二日占领庆阳、会水。我野战集团军五日进击西华池,给敌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毙敌旅长何奇。

三月六日 中央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等指示电,令主力

由现地东进，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

三月七日 中央军委致电野战集团军首长，重新区分了防御地带。

三月八日 延安各界一万多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邓颖超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同日 中央军委致电王震并告贺龙、李井泉，令王震率独四旅和三五九旅从延水关西渡，集中延长附近。

三月十日至十二日 彭德怀到边区南线检查防务，传达中央军委指示。在郿（富）县茶坊召集第一纵队及新四旅营以上干部会，并同教导旅首长商量的部署。

三月十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决定成立“前进指挥所”，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

三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延安保卫战。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到西安同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中两个整编军、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旅共十四万人的兵力，在董钊、刘戡指挥下，从洛川、宜川地区北犯，直攻延安。连同西、北马鸿逵、邓宝珊两部，敌军使用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妄图消灭西北野战集团军，迫使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西北我军经过六天抗击，歼敌一千五百多人，完成掩护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安全转移及群众的疏散任务后，于十九日撤出延安。

三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命令，将边区部队分编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共六个旅二万六千人，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编为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命令“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

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三月十七日 第二纵队从山西省西渡黄河抵延川。

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

三月二十日 野战军指挥机构正式组成，张文舟、王政柱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后勤司令员。

三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指示。

三月二十三日 宁夏马鸿逵集团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三边分区。

三月二十五日 青化砭伏击战。敌占延安后异常骄横，急于找我主力决战。以五个旅溯延河于二十四日进占安塞，以三十一旅到青化砭担任侧翼掩护。本日该旅旅部率一个团进入野战军的伏击圈内，二千九百多人被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三月二十六日 枣林沟会议。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并告诉他：“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三月二十八日 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三边地委、军分区首长并报军委，强调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困扰、封锁城市，寻机歼敌。

三月二十九日 西北野战军召集旅以上干部会，总结青化砭作战经验，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

四月一日 彭德怀、习仲勋、徐立清联名致电各纵队、各

旅，强调亲密军民关系，扰、疲、困、饿敌人，寻机各个歼敌。

四月四日至五月九日 太岳部队反攻晋南，歼敌一万八千多人，彻底粉碎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作战，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作战。

四月六日 野战军在永坪伏击敌二十九军，毙伤敌第十二旅六百余人。

四月八日 青海马步芳集团占我庆阳。马鸿逵集团占我安边。榆林邓宝珊部占我横山。

四月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留在陕北和成立中央工委的通知，强调“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四月十日 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并报军委，通报边区敌军分布情况，说“边区主力正尽力吸引胡军，使你放手歼敌”。

同日 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永坪伏击的经验教训。

四月十一日 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准备抽一批主力和干部，发展与加强延属游击部队的主力。

四月十四日 设伏于瓦窑堡、蟠龙大道东西地区的野战军四个旅，在羊马河一带全歼由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俘代旅长麦宗禹。

四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是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使敌达到十分疲劳与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

同日 中央关于歼灭一三五旅给各战略区的通报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四月十九日 野战军再次在永坪镇重创敌整编二十九军。

四月二十日 彭德怀、习仲勋报告中央军委，拟组织第二

支队，由阎揆要率领至宜川、韩城及白水、蒲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四月二十七日 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董钊、刘戡两军二十七日进抵瓦窑堡，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

五月二日至四日 蟠龙攻坚战。敌主力北进绥德后，野战军于四月三十日包围了蟠龙。经二日至四日战斗，攻克敌军这一重要补给基地，歼敌一六七旅及一保安总队共六千七百多人，俘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物资和武器弹药，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一个半月，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多人，打下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础。

五月十四日 真武洞祝捷大会。打蟠龙后，野战军在安塞、龙安镇地区休整。本日，五万军民在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祝贺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宣布：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彭德怀、习仲勋都在会上讲了话。

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六日 野战军进行陇东战役，歼敌三千余人，予敌整编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

六月十四日 胡宗南电蒋介石请准予另编新军，以挽救危机。

六月十七日 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对董、刘两部及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师皆宜避开不打，专打各方分散之敌。

六月三十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三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随后于八月七日，千里跃进大别山。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七日 野战军进行三边战役，三边全境收复。

七月十二日 野战军移至宁条梁、张家畔地区休整。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中央前委在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有关领导同志研究，确定太岳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主力经略中原，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了一年来的解放战争，阐述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会议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七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就疏散、转移后勤人员、物资及教育群众实行两面政策等问题作了指示。

七月三十一日 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同意组成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小河会议后，习仲勋离开野战军，留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

八月六日至十二日 野战军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有力配合了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出豫西的战略行动。

同日 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辖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五旅）在许光达率领下，由晋西北西渡黄河，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八月七日 蒋介石飞抵延安，召集胡宗南、裴昌会部署救援榆林和在榆林、米脂、葭（佳）县之间三角地区“围剿”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的精锐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俘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二十一日，党中央指出：“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二十二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在晋南平陆至豫北孟县之间强渡黄河。

八月二十三日 野战军在前东元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战斗经验与研究部署下一战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自

到会，向指战员祝贺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第二天，毛泽东致电贺龙、习仲勋，要求派几批得力人员大力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七日 野战军进行关庄、岔口追击战，对沿咸榆公路南撤的敌军展开平行追击、侧击和拦头阻击，迟滞了胡宗南迅速抽兵东顾潼关、豫西的行动。

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

八月三十一日 野战军前委作出《关于在蒋管区作战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为：关于筹措粮秣资财，采用接收、没收、征发、征借四种办法；规定了对罪大恶极之恶霸和蒋管区之地方武装的政策；强调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党组织，注意群众纪律，大力发动群众。党中央九月一日复电同意，并转其他野战军参考。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规定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在内线继续歼敌，收复失地。

九月十日 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下次战役计划。

九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骑兵第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九月二十三日 野战军在延长西北之安家渠召开纵队首长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主力留内线歼灭延安以北孤立据点之敌，决定二、四纵队南下开辟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

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王震、王世泰指挥的二纵队和四纵队，进行黄龙战役，歼敌三千余人，一度解放白水、韩城、宜川等县城。因陕甘宁解放区粮食困难，战后四纵队撤

至固临地区，二纵队掩护弹药物资东渡黄河。

十月一日至十一日 野战军进行延清战役，收复延长、延川和清涧，歼敌八千多人，俘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等。

十月七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安杀害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第二年十月七日，陕甘宁解放区各界在延安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宣布我党、我军的八项基本政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同日 解放军总部发表训令，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

十月十一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

同日 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与作战经验的通报，指出，西北全军共四万余人，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二十四个旅和杂牌十个旅的攻势，使我转入了反攻。要求各地研究这一经验。

十月十二日 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提出就地寻机打刘戡；打榆林；南出洛（川）宜（川）三个作战方案，供考虑。

十月十九日 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于本日到职。

十月二十一日 绥德召开军民祝捷大会，庆贺绥德分区全部收复。彭德怀在讲话中号召扩大战果。

同日 野战军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彭德怀总结了七个月来的作战经验。

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 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歼敌七千余人。因宁夏军阀马鸿逵部增援，我久攻未克，加上部队严重缺粮，于十一月十六日从榆林撤围，主力集结响水堡、鱼河堡休整待机。

十一月二十九日 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一、三、六纵队旅以上干部会，检讨总结榆林、元大滩战斗，确定部队整训计划。

十一月间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即义合会议），讨论边区如何贯彻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工作。会议揭发、批判了八个月来边区党、政府、军队中存在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不良倾向。

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旬 野战军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地区（第二纵队在山西曲沃地区）进行冬季整训。在整训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解放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

十二月一日 在山东组建的独立第六旅在张仲翰率领下开抵晋南，归还第二纵队建制。

十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其中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十二月二十八日 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之独立第三旅，配合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攻克运城、安邑，歼敌一万三千多人。至此，晋南除临汾外全部解放。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上、中旬 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

十二月会议精神，研究打到国统区去，大力歼灭敌军，扩大解放区，以及有关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等问题。会议通过《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规定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

前委扩大会议之前，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汇报交流各纵、旅冬季整训经验。

一月十一日 周恩来在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分析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号召西北野战军坚决打到外线去，要求广大指战员严格掌握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

同日 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回顾从延安以南抗击战到二次打榆林的作战，分析打败敌人的原因，总结了主要的作战经验。

一月十二日 任弼时在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论述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巩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保护开明绅士和坚决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

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规定执行各项政策的步骤和方法。随后召开边区级干部大会，进一步传达和贯彻中央会议精神。

一月二十九日 野战军召集高干会议，讨论南下行动方案，决定宜川战役计划。

二月六日 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并为前委委员。

二月十二日 野战军由绥德、米脂、安塞南进，计划包围攻击宜川守敌，并吸引敌人增援，于运动中消灭之。十六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域集结待机。

二月十七日 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和进入蒋管区的政策。

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三日 野战军进行宜川、瓦子街战役。二月二十四日，我军包围宜川城后，胡宗南令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四个旅，于二十六日从洛川、黄陵增援宜川，二十七日进至瓦子街地区。野战军集中九个旅的兵力，二十九日在瓦子街以东之南北高地将敌包围。经过激战，到三月一日下午将援敌全部歼灭。三月三日攻克宜川。宜川、瓦子街战役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两万八千多人，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兵败自杀，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等被俘。宜、瓦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三月七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分析了胜利的原因，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

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二日 野战军乘宜川大捷向南扩张战果，发起黄龙山麓战役，先后攻克白水、黄陵、宜君、韩城、合(郃)阳、澄城等城，歼敌三千余人。但洛川久围未克，裴昌会所率之敌第五兵团吸取刘戡惨败的教训，行动谨慎，我未达围洛打援之目的。

三月二十三日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四、五月间相继到达晋察冀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会合。

四月一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讲话，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工作总路线。

四月十一日 绥德军分区部队攻克准噶尔旗王府所在地旗山，解放东胜县以东地区。

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二日 野战军进行西府、陇东战役，于二十六日攻占胡宗南之补给基地宝鸡，击毙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由于胡宗南集中十一个半旅驰援宝鸡，马步芳部密切

配合，我军于二十八日撤离宝鸡，转向陇东，随后粉碎胡宗南、马步芳的联合反击。西府、陇东战役歼敌二万一千多人，迫使孤悬延安、洛川之敌南逃，并一度解放宝鸡、凤翔等十四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四月二十二日 西北我军收复延安，被敌侵占一年零三十天的民主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里。中共中央于二十四日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

四月二十七日 第三纵队追击由延安、洛川南逃之敌，歼敌一千六百余人。

四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四月下旬 彭德怀致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建议以延属和黄龙分区的几个团合编成黄龙区兵团，以替换三纵队西调。

五月上旬 以黄龙分区的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组成警备第四旅，暂归第四纵队指挥。

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研究部署夏季整训计划，确定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扩大新的解放区。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通过的《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的决定，于六月十九日下发。根据这个决定，野战军于六、七月间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

六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野战军司令部在黄龙召开参谋长会议，研究健全参谋长工作，加强军队建设。

六月中、下旬 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加强干部理论学习，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在野战军高级干部中组织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七月一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文件。

七月七日 野战军与驻地黄龙山民主政府及群众，联合举行“七七”抗战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彭德怀讲话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把仗打得更好，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七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计划，规定歼敌正规军一百二十八个旅（师）左右，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指示全国各战场发起秋季攻势以完成上述任务。

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总结义合会议以来的工作，研究确定关于土地问题、整党、生产、军事工作、新区工作和加强领导等方面的任务与工作步骤。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在会上做了有关报告和讲话。

八月八日至十三日 野战军进行澄（城）合（郃阳）战役在黄龙山麓壶梯山、冯原镇、王庄镇地区歼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整个战役歼敌近万，收复韩城、合（郃）阳、澄城三城。

八月十一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扣留胡部在陕不向中原进犯是一大利益。故目前一个较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

八月十六日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军委报告：遵电示整训一个月，主要是争取俘虏，总结经验，完成攻坚演习。

八月二十一日 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报告制度的决定，指出前委今后要做到及时地总结工作，向上报告，向下普及。并要求各纵、旅党委及各级军政机关，按时将军事、政治工作，执行政策，各个战役等情况，分别向前委报告，以便

前委向中央及时报告。

八月三十日 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报送六、七两月的军事整训报告。

九月上旬 野战军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进行调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做好民运工作。

九月上旬 晋绥军区骑兵第二旅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野战军前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等问题，并研究了秋季作战方针及新区工作、新区政策等事项，决定了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进攻的作战方针。根据中央关于新区实行合理负担的财经政策，确定取消粮食征发和征借制，实行预借制。

九月二十四日 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增加阎揆要、廖汉生、许光达、王世泰、徐立清五同志为前委委员。二十六日军委批示同意。

同日 前委向中央汇报关于新区预借粮草办法。党中央认为西北野战军的借粮办法是比较好的，在十月一日通告各战略区和野战军。

十月五日至十八日 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即秋季攻势作战），歼灭敌整编六十五师、十七师、三十八师等部二万五千多人，有效地配合中原、太原两地作战。

十月二十七日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西北野战军十一个月来推荐干部和党员的情况，说明由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挑选干部的方法，是比较全面的。

十月三十日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争取俘虏兵的工作。俘虏兵百分之八十补入部队。由于他们绝大部分出身贫农和中农，所以诉苦是帮助教育，提高他们觉悟的重要方式。

十月三十一日 野战军司令部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八月至十

月间部队的秋季整训工作。

十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将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野战部队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个野战军。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原来的旅改称为师。一级军区有中原、华北、东北、华东军区和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

十一月四日 野战军前委向毛泽东并西北局送上《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报告》，汇报九月前委扩大会议以来执行报告制度的情况，决定西北野战军今冬的两大任务。十一日，毛泽东将此报告转给各野战军、各战略区，请“注意采用他们的经验”。

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为配合淮海战役的战略决战，抑留胡宗南集团于西北地区，不使其抽走一兵一卒，野战军发动了冬季战役，在陕中洛河地区三战三捷，歼敌两万四千多人，俘敌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十七师师长王作栋被击毙。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防御计划（按：国民党于十月下旬，将其整编军改为兵团，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

十一月二十九日 野战军发出冬季整训指示，并布置做地方工作。

十二月四日 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今后作战方针及开展冬季群众工作等问题。

十二月六日 野战军前委向各纵、旅党委、黄龙地、县委发出关于今年冬季群众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年关逼债和反恶霸、反特务的斗争，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大力培养当地干部。

十二月上、中旬 中央军委连电彭德怀，要密切注意胡宗南部动向，牵制胡军不使其增援杜聿明。

上旬 绥德分区警备第四团、第六团编成警备第二旅。

十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蒋介石决定放弃西安的有关情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以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似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江南及西南各省。为这个估计符合情况，胡宗南也就暂时不会放弃西安。但西北野战军须抓住胡宗南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布置工作。

一九四九年

一月一日 新华社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同日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要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提出了保存反动势力的五项条件。

上旬 晋绥军区独立第七旅编入第一纵队。陕甘宁解放区的警四旅编入第四纵队。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西北野战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贺龙传达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个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对过去一年的作战情况、三查运动、推荐干部与党员，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强调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四九年和五〇年要争取西北的胜利和全国的胜利。习仲勋作城市政策与工作的报告，甘泗淇作加强纪律的报告，张宗逊作关于党委制的报告，张德生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一月八日的决定和毛泽东一月十四日的声明，通过了总决议，对提高自觉纪律及地方群众工作等也作了决议。

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文告的反动性，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军委一月十五日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

任副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野战军辖一、二、三、四、六、七等六个军，总兵力十一万六千余人。

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七日 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歼敌七千余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党的基本任务与基本政策。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 第一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王震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的报告与结论。

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四月二十三日 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令，到太原前线同总前委负责同志一道，指挥了太原战役后期作战。本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甚速，二十四日拂晓攻城，当日可能攻下。拟于五月初回陕。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复电同意，提出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二十四日太原解放。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即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五月四日至六月十七日 第一野战军进行陕中战役，于五月二十日解放了胡宗南盘踞十多年的西安与陕中广大地区，并于咸阳等地击退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联合反扑，歼敌三万多人。

上旬 陕南第十九军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

五月二十三日 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令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

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五月二十四日 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

同日 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动员令。

六月一日 榆林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接受我和平条件，该部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榆林和平解放。

六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通知各地委、工委、陕北、陕南区党委和晋绥分局：中央决定西北局委员会由彭德怀等二十三人组成，并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芳、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等九人为常委。彭为第一书记，贺为第二书记，习为第三书记。

六月中旬 第一野战军以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编成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

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辖第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辖第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及原在山西作战的第七军、第一军之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第三军之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西北战场上我军的力量已超过了敌军。

七月一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消灭敌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军队的战役指示。

七月六日 第一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迅速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三省，次年春夏占领新疆的指示，研究了野战军的战略进攻计划。决定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在解决胡宗南主力后，歼灭青、宁两马。

七月十日至十四日 野战军进行扶（风）眉（县）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部及所属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

第九十军、第一一九军等部四万三千余人，控制了秦岭及其以北广大地区，造成野战军西进消灭青、宁二马的有利态势，开始了向大西北进军。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一日 野战军进行陇东追击战，在固关镇、任山河地区歼敌一万多人，前进千里，克天水、平凉控制六盘山，解放陇东全部和陇南一部。马步芳部逃向兰州、西宁地区，马鸿逵部逃向银川及其以南地区。这就为进军兰州、宁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打下胜利基础。

七月三十一日 第六军第十八师由晋南开抵西安归还建制。

八月四日 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等野战军首长向各兵团发出攻击兰州的预备命令，即以一部钳制宁夏马鸿逵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海马步芳军。六日，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等，提醒注意深入青海马步芳老巢寻其主力决战，必须谨慎从事，望以此意告王震。

八月六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西北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解决。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八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野战军从十二日起，经过九天追击，于二十日抵兰州城郊。二十一日试攻兰州外围。二十五日发起总攻，至二十六日中午攻占甘肃省会兰州，青马主力大部被歼灭，基本消灭了马步芳集团。

同日 兰州市军管会成立，张宗逊为主任、张德生、韩练成为副主任。

八月二十三日 西北军区召开建军会议。

八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兵团向盘踞秦岭之敌发起进攻，先头部队于九月三日进抵凤县。

九月五日 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

五日至二十三日 第十九兵团挥戈北上，进行宁夏战役。

先克中宁,再战吴忠、灵武。敌八十一军起义,接受和平改编;第一二八军、贺兰军投诚。二十三日银川解放。宁夏马鸿逵集团覆灭。

五日至二十八日 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军进行河西战役。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进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北越祁连山,二十三日在张掖与二兵团会师。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残部于二十四日在酒泉起义。随后野战军占玉门,抵安西,紧扣新疆大门。

九月十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向新疆进军。陶峙岳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第二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

九月十一日 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等率五个团在岷县起义。

九月十八日 彭德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青海现状及对藏民工作意见。

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九月二十三日 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到酒泉、兰州同解放军谈判,接受我和平条件。

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十月一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月五日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六军举行进驻新疆的隆重典礼，彭德怀、王震讲了话。

十月七日 彭德怀、王震、许光达同陶峙岳、鲍尔汉、屈武等，在酒泉会谈新疆起义部队和平改编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问题。

十月十日 解放军先头部队从酒泉向新疆进发，于二十日到达新疆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为工作方便，野战军司令部于十月二十六日将第六军拨归第一兵团建制，第七军改属第二兵团建制。

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对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永）、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担任西北任务的西北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不担任地方工作，作国防机动力量，以备不虞。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十月三十日 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疆情况和组织机构问题。

十一月六日 王震率第一兵团指挥部飞抵乌鲁木齐。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就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季整训、地方工作、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统一战线工作、财经建设工作和干部教育等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治中由北京到达兰州。

十一月二十六日 陕南第十九军及第二兵团的第七军，本日起暂归西南军区首长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二月五日至二十五日，配合第十八兵团（已拨归第二野战军建制）进行

了陕南、陇南战役，全部解放陕南和陇南。

十一月三十日 第一野战军奉命兼西北军区，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军区政治委员。

十二月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王震等四十一人为委员。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正式成立。

十二月十七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鲍尔汉为主席。

同日 新疆省军区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委，王震、陶峙岳、赛福鼎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

十二月二十三日 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潘自力为主席。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讨论组成陕西省人民政府等问题。随后，青海、陕西、甘肃省人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初成立，赵寿山、马明方、邓宝珊分别担任三省主席。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发出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指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增加国家财富，发展经济，我西北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新给予的任务，积极地参加生产建设。

十二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兵团司令，王震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为副司令员。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长期在伊犁、塔城、阿山（承化）三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疆民族军，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 办事处几个问题的调查和考证

中共于都县委党史办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长征以后，以项英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中央苏区坚持了五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由于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加上当时所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致使这段党史中仍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搞清。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调查核实。现将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 由瑞金迁往于都的时间

有的著作说，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迁至于都宽田地区的（见战士出版社《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第134页）。我们调查的情况是：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前后迁至于都的。

1.从当时的敌情看：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东路第十师，于十一月一日侵占长汀县城，十一月十日侵占瑞金县城。

据当时侵占瑞金的敌第十师特别党部编印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收复瑞金纪事》一书记载，敌占瑞金后，一方面加紧构筑城防工事，一方面不断派兵四出搜剿骚乱。十一月十八日，敌一个营夜袭黄柏；十九日，敌六十八团夜袭九堡。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原驻在瑞金城与九堡之间的梅坑。梅坑离县城仅四十华里。在这样严重的敌情面前，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是不可能等到十一月中旬才离开梅坑地区的。

2. 当时任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事务长的杨久庆同志和当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县裁判部长的邱世桂同志都回忆说，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下旬间离开瑞金迁到于都宽田地区。在中央红军供给部及所属的卫生材料厂、被服厂、印刷厂驻地会昌白鹅的梓坑，红军兵工厂驻地于都黄龙（今黄麟）的湖山村的老同志们回忆都认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单位，是一九三四年冬采摘油茶的时候迁来的。这些地区采摘油茶的时间，一般是在“寒露”至“霜降”期间。一九三四年的“寒露”在十月九日，“霜降”在十月二十四日。这也说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各机关是在十月二十日前后离开梅坑迁至于都的。

3. 据当时《红色中华》报编委委员韩进同志回忆说：当时为了保守秘密，迷惑敌人，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外没有公开宣布成立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直到十一月上旬，敌人一直把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当成是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报道我中央机关“已移往于都”；十一月十三日，再次报道我中央机关“已于十月皓（十九）日迁往于都”。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由瑞金迁往于都宽田的时间，应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前后，而不是在十一月中旬。

二、关于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转移至于都南部禾丰地区的时间

对于这个问题，现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退守于都仁风山区（孔永松、林天乙《闽赣路千里》所附《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另种说法：“十一月底，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随即退至于南整理部队”（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分册）；

第三种说法：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已经退至仁风山区并被敌人包围在那里（《献身革命志如钢——刘伯坚传略》，《不屈的共产党人》第三辑，人民出版社版）。

我们查证的情况是：项英、陈毅、贺昌同志率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是在二月上旬离开驻地井塘村，于二月十日前后到达于南禾丰地区的。

1.据项英当年的房东谢招娣回忆说：大年初一这一天（即二月四日），她请项英夫妇吃米糕共度佳节。为了表示感谢，项英夫妇当场送给谢招娣一顶蚊帐、几支棉纱线和一件上海兰女上衣。又据当年任教育部艺术局长的赵品三和工农剧社演员石联星等同志回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在向于南禾丰地区转移前，在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因井塘村与小密仅一山之隔，且当年属瑞西县小密区，故有些老同志回忆说是在小密附近的一个山村），由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长瞿秋白主持“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举进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汇演。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领导同志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邓子恢、毛泽覃、何叔衡等都观看了演出。而这次会演的时间，所有当事人都回忆说是在春节以后，即在二月四日以后。再者，在二月四日和二月五日，中央分局对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还争论不休，项英只好连续发电报给中央，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在二月四日的电报中说：“粤敌有企图以三个团配合瑞会之右路向我围攻”，要求中央对“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又说，分局对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仍有两个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了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饶和浦闽赣，分区（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并要中央立即答复。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

关在二月初并未离开井塘村退至于南禾丰地区。

2.二月五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明确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指出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电报结尾特意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由于敌情严重，项英未等中央传达“决议详情”的电报到来，遂率中央机关退至于南。几天后，便接到中央书记处于二月十三日发来的传达“决议详情”的电报。这一情况，见之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和报告中。项英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发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敌及八十九师之一部于七、八、九三日急占于会沿河地区，企图将我封锁于河北岸。但我们前几日已移至河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项英向政治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中说：“我们退至于南即整理部队，等候中央的回电，经过几天之久，中央始有电来”。上述历史文献资料说明，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末离开原驻地井塘村，而于二月十日前后到达于南禾丰地区的。

三、关于项英、陈毅、贺昌同志从于都南部突围的出发地点

现在党史界较普遍的说法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是从于都南部的“仁风山区”（或者说是“仁风地区”“仁风山”）出发突围的。经过调查核实，我们认为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当时出发突围的确切地

点，不是在于都南部的“仁风山区”或“仁风山”，而是在于都南部的上坪。

1. 项英、陈毅同志的多次回忆中，都没有说到他们是从“仁风山区”或“仁风山”突围，而是说从“于都南部”（或称“于南地区”）突围。如项英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说：“自各部队出动以来，已使敌人发觉我们的企图，南部粤敌进行严密的堵截、截击，北面之敌由北而南压迫，使我们不能久留在于南狭小地区，于是我们决定率70团穿过会昌的封锁线，首先转至长汀地区，然后依情况决定以后的行动，或向闽西或转向江西地区。”“我与陈毅分散，这时粤敌正以几团兵在安远河两岸截击，遥闻河东有严密的枪声，大概周建平（屏）渡河后，与敌人激战，不能继续前进，于是我们带领所集中的一部分人只有倒转赣南军区找陈毅同志，走到半途会合陈毅，当时决定我们只有依靠赣南军区，但到了赣南军区以后，敌人正四面进攻，渐渐逼近，于南地区已无巩固地区了……我们决定要抽一部分部队去进行游击战，不宜集中一切人员在于南敌人集中进攻的狭小地区，我与陈毅同志遂与赣南军区分开，迅速转至油山”。又据陈毅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讲话录音整理的回忆录《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版），也是这样说的。项英、陈毅同志所指的“于南地区”是于都南部的禾丰（亦称黎邦桥）和上坪，而没有包括仁风地区。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冬以前，仁风地区（包括茶梓）属安远县

管辖，仁风北面的乱石区（今靖石乡）属会昌县管辖，禾丰、上坪则归于都县管辖。一九三四年春起，乱石区、茶梓区（包括仁风地区），畚岭区（即今祁禄山乡）以及小溪区，均划归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管辖，唯有禾丰区和黎村区的上坪乡属于都县管辖。项英同志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四年曾在于都工作数个月，对于这一情况应该是清楚的。陈毅同志亦曾在于都工作过，对此也是清楚的。况且，项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给朱德、洛甫的电报中说：“赣南目前仅剩禾丰、黎村两个全区”。这就是说，这时整个赣南省除于都南部的禾丰和黎村（包括上坪乡）两个全区外，其余区乡全部被敌人占领了，而禾丰区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亦被敌人占领，仅仅剩下黎村区的上坪乡未被敌人占领、很明显，项英、陈毅同志所说的“于南地区”，就是禾丰和上坪两个地方，而不能包括仁风地区。

2.从当时的敌情看，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也不可能从仁风地区出发突围。因为早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粤军一个团就侵占了仁风，并将团部驻扎于此，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仍未撤走，这个团的敌人经常从仁风出发四出“清剿”。既然如此，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机关部队数千人从这里出发突围的可能性很小。

3.根据陈毅同志在《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回忆，在他们突围前夕，中央苏区仍然保留最后一个村庄。这个坚持最后的红色村庄，就是上坪乡，上坪乡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被敌人占领的，上坪乡苏维埃政府一直坚持到

三月十一日。而茶梓区（包括仁风在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由于敌人的进攻，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即离开家乡，转移至会昌的洛口、白鹅和于都的禾丰等地活动。正因为如此，茶梓区（包括仁风地区）的老人都不清楚陈毅、项英等同志及赣南省机关部队的情况。相反，上坪的许多老人对此却很清楚。我们在上坪调查访问时，有的同志还向我们提供了项英、陈毅等同志化装突围的线索。

4.据我们调查，当时侵占上坪的是北路中央军，而占领仁风和畚岭（包括牛岭和马岭地区）的是南路粤军。我们查阅了一九三五年的《中央日报》和上海《新闻报》，只看到《中央日报》三月十四日报道说：“贺昌已于十日晨在会昌归庄经第八师（注：第八师系北路中央军罗卓英部）击毙，尸首当晚界至会昌城，十二日运解宁都总部”；三月十六日又报道说：“罗卓英顷电绥署告捷，连日所部进剿伪中央军区股匪斩获甚多，匪首陈毅周建屏项英等，均化装潜逃……”。而粤军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或报告。由此也可证明，项英、陈毅等同志是在上坪突围的。

四、关于项英、陈毅、贺昌同志的突围方向

目前多数党史论著认为，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在接到中央电报指示后，即决定向西突围到油山去。通过查阅资料和访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我们认为这也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当时的情况是：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先向东突围到福建长汀地区去，突围受阻后才化装突围到赣粤边去。

项英同志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说，中央分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突围。根据当时的部署，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率红七十团，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根据地取得联系，指导工作。项英、陈毅、贺昌随红七十团活动。各路突围部队出发后，红七十团便从于都南部向信丰南部挺进。项英、陈毅、贺昌同志继续留在于南地区。但是，各路突围部队都受到阻击，红七十团向信南挺进有困难。于是，项英、陈毅等便调回红七十团，决定和周建屏、杨英、袁血卒等率红七十团穿过会昌封锁线，首先转至福建长汀地区，而后再依情况决定以后的行动，或向闽西，或转向江西地区。《中央日报》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也报道了在会昌县境阻击贺昌等突围的消息。很明显，项英、陈毅同志先是东向长汀地区突围，受阻后返回于南上坪地区，这时项英才接受陈毅的意见，转而突围到油山去。

五、关于项英、陈毅、贺昌同志最后突围的出发时间以及贺昌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较普通的说法是：项英、陈毅、贺昌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下午开始出发突围，贺昌同志当晚（三日）牺牲于会昌河边（见人民出版社《不屈的共产党人》第二辑《元啸仙传略》）也有的说是在二月中旬开始突围。还有的说陈毅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与项英率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突围受阻返回仁风山区”，“三月三日向中央报告了突围计划后，再度突围，被打散。

四日，由王母渡偷渡桃江突围成功。”（见《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而我们调查的结果是：项英、贺昌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下午出发突围的，十日晨贺昌同志牺牲于会昌的归庄（在晓龙乡境内）。这可见之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新闻报》三月十四日的报道（前文已引述）以及项英、陈毅同志的回忆。至于项英陈毅同志经王母渡偷渡桃江，最早也只能在三月十五日前后。

六、关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称谓

对中央分局的称谓，现在党史论著中有三种：一是称之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共党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99页）；二是称之为“中共江西分局”（徐元冬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70页）。三是称之为“中共中央分局”（《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版）。我们在查阅资料中看到，中央分局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这可见之于项英所著、题为《目前敌人“清剿”的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一九三五年一月铅印出版的，小册子封面写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出版”。

关于“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称谓，现在有两种：一是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简称“中央办事处”（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另一种则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见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通过查阅资料，我们未看到前一称谓（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 见之于历史文献记载。后一称谓(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是准确的,因为它见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署名的第一号《布告》,《布告》衔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发布的第三号《布告》,其衔头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了关于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的《紧急命令》,这份文件的署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我们查阅了一九三四年的《红色中华》报,看到从“二苏大会”以后的二月十六日起,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均未使用“临时中央政府”的称呼,而是用“中央政府”的称呼,《红色中华》报原标明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自二月十六日起亦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因此,若称“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也是不确切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